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
MAOZEDONG
南方出版社
毛泽东秘书手记
MAOZEDONGMISHUSHOUJI
李锐文集

Liruiwenji

李锐文集

【卷二】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

南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唐建福
责任编辑：庄　豪
封面设计：郭　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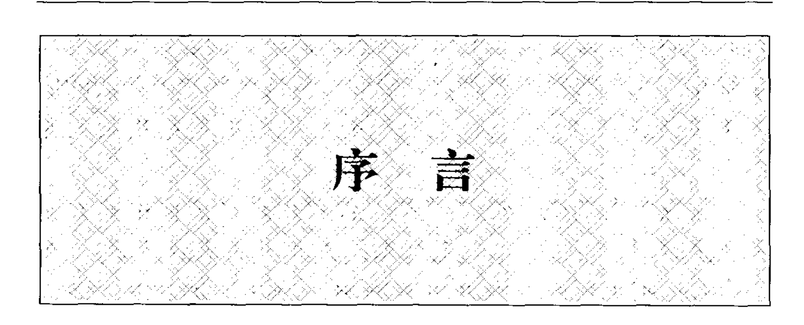
李锐文集

（卷二）毛泽东的晚年悲剧

李锐　著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12楼）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0.5印张　16插页　130万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80609－673－6/Z·23
全套定价：106.80元



序　言

收入本书的十二篇文章，短者几千言，长者几万言，除两三篇为旧作的改写外，都是近年新作。80年代初，我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是说，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实践，同早年思想性格也是很有关系的。这种明显或不明显的渊源，细心的读者自会感到。

当代中国和每一个大陆的中国人，同毛泽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后退，欢乐与痛苦，乃至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等，都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真是荣辱相关、生死与共。毛泽东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辉—毛泽东思想仍照耀着我们，可是他的阴影—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也还笼罩着我们。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说，我们主要还是防“左”，“左”是根深蒂固的。过去从反右到“文革”二十年的“左”，同毛泽东直接相关，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因此，中国要前进，要现代化，要搞有自身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同根深蒂固的“左”一刀两断，永远告别，否则就难以顺利前进，甚至可能倒退。毫无疑问，这就需要在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彻底弄清楚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根源，从这个笼罩着我们的阴影中完全解脱出来。这就是我写这些文章并集结出版的原因。

就我个人来说，50年代初，曾利用自己工作中的方便和业余时间，写过一本《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在国内有过很大影响，国外也有影响；1980年此书出过增订再版；今年又出增订三版（改名《早年毛泽东》），与此同时还出了一本“姊妹篇”—《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所以可以说，我对毛泽东的早年是有研究的。至于晚年，一种“百载难逢”的机遇，使我在“大跃进”时期一直生活在大风大浪的漩涡之中，有许多切身体会，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尝“左”害二十年（我写有《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于1989年出版）。所以可以说，对毛泽东的晚年，我比一般人多一些亲身感受。我们都生活在20世纪，行逢其辰，何等幸运，饱经风雨，历尽沧桑。可以说，本世纪的前五十年是战争与革命，后五十年是冷战与发展，世界如此，中国亦如此。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自己的种种亲历，包括所见所闻，总应不再如入五里雾中，而应当心明如镜才好，否则，岂不糊里糊涂过一辈子或半辈子！何况也只有这样，才能鉴往知来，有所趋避，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和心情，来了解毛泽东的晚年，并对其“左”的错误思想作些探讨的。在《关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系《晚年毛泽东》一书序言）中，我说过，“在毛泽东的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而且是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思想与活动（主要晚年“左”的错误思想）

的研究。因为这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关于毛泽东尤其是他的晚年，国外有许多学者正在进行研究，而且起步比国内还要早一些。对比之下，我们确有某种惭愧之感；对于这位巨人的研究，难道我们反而落在外国人的后面吗?"

也算以身作则吧，于是有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这篇长文。它的产生过程简单说几句。1998 年尾，一批中青年党史研究者邀我座谈晚年毛泽东，后来将录音记录给了我。直到去年，我才断断续续整理成文，先后五稿，越整越长。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加了个帽子，最后定稿。生平为文谨慎，这篇长文当然更是慎之又慎。定稿曾请几十位友好、学者专家和我敬重的前辈审阅，有十多位同志除随手修正文字外，还另写了意见与我，有的长达三四千字，使我十分感激。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应尽快发表出来，这就使我决心将此文编入集中。

李　锐

一九九二年七月于北京医院



1966年10月1日，林彪和江青紧紧的握手

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和华国锋握手。毛曾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1〕57号

★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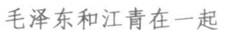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

— 13 —

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林彪死亡的中共中央通知





毛泽东和江青在一起

毛泽东等接见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
姚登山(当时称为"红色的外交战士")
左起:周恩来.江青.姚登山.林彪



以宣传毛泽东.林彪为中心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特辑



目　录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纠正多年来根深蒂固“左”的错误，使全党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1979年11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时要对他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对过去30年的重大事件作出基本总结，1980年10月到11月，中央组织全国党政军经4000干部讨论《决议》草案（《决议》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讨论中，我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10组（能源组包括能委和煤炭、电力、石油三部），任组长。以下是我在小组讨论会上的两次发言的速记稿和我起草的本组讨论总结性意见。

一[1]

《决议》评价毛泽东一生，功第一位，过第二位，这个结论正确。毛泽东在前28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27年，在1956年以前，路线正确，但“左”的东西已经露头；从1957年到1976年，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一套“左”的东西，逐渐成为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对党、对人民和他自己，这都是一场大悲剧。弄清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悲剧，是《决议》必须完成的一项主要任务。

建国前的28年，历尽艰辛、曲折，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从早年起，他的革命实践家的品质就高于理论家的品质。长期的战争环境、经典著作译本的贫乏（他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马克思、列宁一样，在理论上深下功夫。他一生的兴趣，似乎主要也在实践方面。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取得革命胜利，确实难而又难。毛泽东的伟大，还特别表现在长期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这方面（这方面人们知道较少）。

1949年以后，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民大国的根本问题，即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人

① 1980年10月25日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才很缺，人民文化素质低，地区间自然条件差异极大，等等客观条件照旧存在。而从我党的主观条件看：干部多出身农民，进城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央也缺乏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经验等等，更是突出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力，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人才）。可是一方面，对于主观条件的不利（苏联工农干部一直是进正规学校培训，取得学历）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又长期摇摆不定，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搞四化）何者为重，摇摆不已，最后走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条绝路。西柏坡二中全会的报告，对于开国之后阶级斗争与发展经济何者为主，没有说得很清楚。搞三反、五反、肃反以及反右派等运动时，感到是前者为主；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是后者为主。总之，思想、理论、实践，没有一根主线。不像抗日战争尤其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那样，得心应手，有板有眼，循序前进。回顾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马克思以毕生精力写《资本论》，列宁在革命之前就精读过《资本论》，毛泽东大概没有通读过《资本论》），他在理论上没有这个准备，基础不够雄厚，因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于是，发动大跃进，经济上大乱套（“文化大革命”则是政治上大乱套）。

建国后头七年，国内外敌对势力有待解决，他的思想和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很好；但也潜伏着并已有不少“左”的东西露头（主要是农业以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太急，没有吸取苏联教训，也没有根据中国农

村和社会具体情况办事)。八大开得很好，思想、理论、政治、经济和组织等方面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已经解决了，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中央和领导的成熟。但是毛泽东个人对八大不满意，尤其对反了他的“冒进”等等不满意，加上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使他认为中国要走另一条道路，要采取另外更高明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反右派运动，整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质是不懂得资本主义有用遗产之可贵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南宁会议批判周总理和陈云，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于是发明了三面红旗、以钢为纲等（也有客观原因，如上上下下有一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奉承迎合的人，党的威信高，群众容易盲从等等)。看到“大跃进”出现许多一时的假象，便认为很快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庐山会议之前，对“左”的东西，有所察觉，有所纠正，但思想上并没有认输，勉强上山反“左”。彭总一封信，正好转而反右，而且从理论上提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听，不能不（不敢不）盲目紧跟的道路。

庐山会议之后，我看不到文件，变成“局外人”，但许多感受和认识同大家是一样的。照常理说，“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应该“回头是岸”了，“为人民服务”到哪里去了呢！（记得1950年，广西一个地区征了过头粮，饿死1000多人，省委一把手便被撤职。）七千人大会不认真总结，反而对刘少奇报告不满，而林彪被保护过了关。随即就

阶级斗争步步升级。一边让人家煞费苦心搞调整，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一边退居“二线”，准备重整旗鼓。直到1966年，硬是一意孤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彻底换上一个能紧跟的新班子，更加不择手段，不顾常识，什么党纪国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要了，换了一套开始还有点迷人的“反修防修”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如果把那十年的“语录”全部收集拢来，下述说法并不过分：“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否定十七年是“政治大革命”，“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结果，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

喜欢读古书也是一个问题。毛泽东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但“古为今用”要非常小心。故居我去过，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中央开会时，他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瞄。晚年“深挖洞”，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哲学思想讲辩证法归结为一个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变为“一分为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也是古书上来的）。于是创造出“共产党就是讲斗争的”，要永远斗下去，一分为二永远不息的理论，将辩证法弄成形而上学。古书上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一说，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不然，为什么开国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干部和群众无日安宁，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为什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应当怎样理解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性格气质，是互相影响，分不开的。毛也不能例外。

“左”的思想也可以向早期追溯。毛泽东早年接受过主观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他对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陈独秀等都佩服过，当学生时，受唯心主义影响，精心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强调主观意志作用。从思想上总观毛泽东的一生，后期的“左”倾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一个潜伏、发生、生长、发展，最后到登峰造极的过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方向完全正确，但“矫枉必须过正”，反对洋学堂，支持和赞扬（与承认不同）农民群众的过火和落后行为，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收入《毛选》时修改了），等等，不能不说有某些“左”的思想。(20年代农民对地主的过火行为，成为60年代红卫兵对革命干部的“革命行动”的合法根据，真是历史的悲剧。）十年内战时，敌人太强大，毛泽东很能实事求是。但延安的整风发展到“抢救运动”，完全是“左”倾过火，却没有从思想上认真总结，让康生滑了过去，使这个阴谋家得以隐藏下来，拼命迎合，窃据高位。开国之后，基本上一直轻敌（不是指“三座大山”，而是指轻视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是早年的“返祖现象”。

从工作作风、方法上分析，毛泽东一向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一直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李代耕插

话：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回事，《决议》应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后再不要“运动”群众了)。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开国以后的运动，似乎是接受了教训，但也总要搞个5%，几亿人口的大国，右派就五六十万。大炼钢铁，9000万人上山，树木砍光，至今还难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党内党外、全国遍地几万几十万地整特务。这种搞运动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坏国家经济，毁灭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责任)，听不得批评。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开国之前，除开“富田事变”前后打AB团外，事实上毛泽东确实一贯正确，但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中，也还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绩，不能全归功于己。至于后27年中的错误，不能说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完全听不得批评。1958年，田家英跟我谈过，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毛身边十多年，对这种听不得批评感触极深，如果说，毛泽东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要保护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泽东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搞《海瑞罢

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从客观上分析，前28年，由于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因此，毛泽东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言决战。开国之后，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1957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至于民主党派，更不在话下；群众闹事，没有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必然难免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然决没有准备搞10年，也许只准备搞一、二年，但“水也可以覆舟”；直到武斗之后不好收拾，才搞两派联合、工宣队、部队支左等等办法。但这种制约也没有起作用，最后还说“七八年要来一次”。

毛泽东后27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说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一个一意孤行的独断专行者这个历史悲剧，《决议》应当很好地总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成为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决议》当然不能像我上面讲的这样来写。不过，为什么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后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应当从思想到作风等方面说清楚，能有一个粗略的交代也好。

这个《决议》确实难写，写成这个样子已很不容易，经

过大家讨论，相信会写得更好。《决议》必将进一步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有利于四化的实现，从而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可是，没有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就还有可能犯类似的错误。

二①

关于庐山会议我有一个记录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谈得比较清楚一些。

庐山会议之前

庐山会议前有一系列会议，除郑州会议外，我都参加了。先简要介绍一下几次会议。

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大家都知道。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这次会前，柯庆施曾在毛泽东面前攻击过陈云。我是为三峡问题去南宁的，会议已近尾声。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意见，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把我们两个人都找去。我到的时候，大家为我捏把汗。可是，听到我们两人当场的说明，又各写一篇长文之后，便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我作他的兼职秘书。

① 1980年10月30日在小组讨论会上，应大家的要求，概述1959年庐山会议情况。

接着3月成都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写了如何大跃进的报告，通过了30多个决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成都街上有群众锣鼓声……“大跃进”已经开始。会中我去汇报过一次小组会情况（胡乔木在座）。我进去时，毛泽东指着我说，“这也是一个不知世事的人”。我反映了对柯庆施、陶铸两人发言时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颇不以为然。毛说，“他们是有所指而言的”。我还反映了少奇发言时的感想：“跟主席比，我们差一大截”。所谓“不知世事”，胡乔木告诉我，毛泽东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意，说“几十个部，不知都干些什么”（后来提出“以钢为纲”带动全局）。回到北京后，毛找我谈过两次。主要谈粮产如何倍增的问题。有次先同谭震林谈淮北如何水利比，批评了水利部领导。

4月广州会议，各主要工业部参加了，地方同志很少。讨论15年超英国时，第一个汇报的是地质部刘景范，还没听十分钟，毛泽东听不进去，中止了刘的发言。大家颇紧张。

6月上旬，有天毛泽东找我到游泳池谈话，讲到钢要翻一番。第二天碰到王鹤寿，告知此事，他很感突然。

6月下锂，各大区开计划会，定1959年指标。各主要工业部和富春在上海帮助订华东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华东1959年要生产600万吨钢。开会期间，六大区互通电话，指标节节拔高。华东会上考虑的二五钢铁指标上限竟达1亿吨，这时一机与冶金两部矛盾已尖锐暴露。参加会的各部1959年都照600万吨安排，唯独我没有接受电力指标。柯庆施因此对我极为不满，让人带我去参观江南造船厂等三

个“跃进厂”。我走时留一封信，仍坚持电力无法满足。7月7日我给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忧心忡忡，反映华东会议高指标情况，以及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我从用电“你碰我挤”出发，提出“必须坚决排队，坚决分轻重缓急”。我说“这次还碰到好大喜功，而对其目标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却又茫然无知的事例。有些事情需要时也可以‘霸蛮’（湖南土语，难搞而硬搞），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

8月北戴河会议。钢翻一番，只好背水作战，登报。这些情况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找我谈话，我知道那封长信他看不进去。

12月武昌会议，通过公社决议，粮食产量公布7000亿斤。毛泽东找我谈过一次话，讲到钢铁翻番之不易，问题复杂。会上1959年钢指标降到2000万吨。我斗胆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于是，毛泽东提到7月那封长信，说我“写得不明朗”（我心中想：你没看进去）。陈云不同意公布7000亿斤，跟乔木说了。王稼祥不同意搞公社决议，同少奇谈了，少奇要他去反映，王不敢。后来少奇反映了，结果毛大为反感。

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我感到形势严峻。陈云在抓配套，抓薄弱环节。交电公司已抢购一空。一季度计划完成很差。从计委廖季立处得悉，钢的计划无法完成，问题极多。新安江缺水泥，我只好带总工程师去找总理解决。于是我又写了封信，反映2000万吨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意见。这封信交周太和

并转陈云看了。周让我将副本寄富春一阅（以免有背后放冷箭之嫌）。上海会议之初，毛泽东找我去谈过一次（乔木先在座）。我一进门，他便指着我说："此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说我给他的信为什么要给富春看。这次谈得很融洽，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乔木谈了陈云不赞成公布粮产等。回来后我又写了一封信，提几点意见：1959 年计划涨六次、降两次，上下摆动，工作全面被动；人们不敢大胆怀疑，怕被批评"离开总路线"；二五计划盘子要快定；要重视苏联和西方的经验；大家忘记了主席在成都会议讲过的"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的话。两天后，开中央全会，毛泽东讲了十来个问题。首先鼓励大家学海瑞，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六怕：怕带机会主义帽子、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批评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乔木事后说，他这是保护陈，否则陈不能恢复名誉。）还讲了一条"李锐怕鬼"（意指我不该将信寄富春），指着坐在最后排的我，大声说："我很感谢你呀！为什么只给我几根骨头，不给肉吃？"（这两封信都写得简明，是接受第一封信"不明朗"的教训）此外，还说"我当主帅，你小平当副帅"，大家感觉突然，不解。这次会议小平主持压指标，压到 1400 万吨。

经过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总之，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左"倾后果都很严重。农村问题虽已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的情况。广东边境县有到湖南抢粮。会前，毛泽东视察

了两河、两湖四个省。

神仙会阶段

6月30日，彭真召集在北京被通知上山的人，说是开神仙会，讨论13个问题。后来改为18或19个问题。毛泽东6月29日在船上，7月2日在山上，两次讲话所谈问题的简要内容如下（在山上又作了一次传达）：

1. 读书。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地委以上干部应读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下卷。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1957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8月份读一个月。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者；"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者，各省找几个例子；从去年到现在中央的各种指示文件。三本书十万字，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大家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2. 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程度。八大一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对！要坚持。湖南说的巧妙：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经验，实际是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主要是综合平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现在盲目性减少，形势在好转。何时能彻底好转，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弄不清，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怪话让人说。

3. 任务。今年钢1300万吨，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

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每年增加 1000 亿斤，1964 年搞到 1 万亿斤。钢明后年都只能增加 400 万吨。确保质量。15 年赶英要坚持。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这几年农业第一，成立农机部。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过得舒服，才有利于建设。两种积极性：盲目和实事求是。

4. 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下放，现在要适当收回，强调集权，统一领导。

5. 食堂。自愿参加，节余归己。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 30% 也是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6. 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 4800 亿斤标准过日子。

7. 恢复三定。产、购、销，三年不变。增产征四留六。

8.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9. 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包括：农业本身；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10.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11. 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不管党，生产队长代替了。

12. 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四大指标定高了（指 1959 年），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

13. 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铁的含硫超过标

准，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14. 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个指头问题。许多问题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15. 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16. 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协作区搞些调查研究。

17. 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 120 万基层干部，40 万犯错误，3000 受处分，是个分裂。

18. 国际问题。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

开会的人都上了山后，7 月 3 日开始，分 6 个组开座谈会，按照 18 个问题摆情况，谈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跳舞。《到韶山》、《登庐山》两诗（寄周小舟与乔木求订正）传开后，大家游山赋诗，很是轻松。我参加中南组。少奇和朱总都参加过这个组，各有一次发言。7 月 4 日会上，王任重作了沉痛检讨：比 1954 年水灾更困难，500 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吴芝圃一边向全国道歉，一边说食堂一个不垮。

7 月 4 日少奇作了下述发言：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使人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领导看好的多，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好。红旗队低产，白旗队高产。十一二月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大家挨饿，给武汉调粮。去年的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粮食好转才能解决副食。手工业要恢复。工厂

财务混乱。纱厂炼钢，用掉流动资金。22 万吨铁，至少赔5000 万，成本高的要停产。各县盲目办工厂。1958 年有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要充分估计；但怕说错误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右倾”也不怕。今年 4 月份报告，还有点发热，不全实际（指平衡亩产 450 到 500 斤）；1962 年达到 450 斤，没作结论。赞成恢复四十条。说大话，吃大亏，粮食部不满，脑子发热，很少看到不利；困难时，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1958 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也证明确可大跃进，另一面又出这么多乱子，有破坏作用。斯大林似乎说过，平衡要破坏了，才知其重要。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争取不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错误非犯不可，有好处。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确领导。立三路线，短促突击，损失完了，还不知转弯，要让历史学家总结。当前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认识大大提高一步。半成品还有用。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铧犁教训。设备达到设计能力要时间，欲速则不达。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难免，不泄为好。不要责备下面，省地县，责任主要由省委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

7 月 6 日中南组会上，朱总的发言：农民还有私有性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很大。食堂在生产上对，在消费上吃了大亏。工人还得发工资，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自负盈亏，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否则，干什么？有了钱就吃光。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食堂要吃好，吃饱，有烧的，这样人心才稳定。农民想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

线，是关系五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陈云多年来对粮食抓得多紧。北戴河一时高兴起来，从粮食多了出发。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农轻重安排好。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生产越来越多。要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蛋出口，换回东西。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工业方向要讲。

从北京到浦口的专车上，胡乔木找我谈过对 1958 年的总看法，认为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他以太阳系运行为例，说得星与太阳之间的关系，轨道运行，都是平衡关系；又说火车、汽车的行驶，也不能离开轨道与公路，否则就会出轨。在火车上，富春主持开了一次工交各部部长的计划会。会上我多嘴，讲了乔木同我的谈话。刚上山的 7 月 3 日夜，乔木又找我谈了一次，陶铸在座（后来富春也来了）〉他谈到：共产风是从北戴河刮起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张春桥参加过郑州会议），毛泽东转得较快；毛很欣赏徐水群众那种干劲，有废除家庭的思想；虽然多次提起海瑞，目的却在不要出海瑞。钢铁翻一番的想法，大概是从粮食问题引起的。成都会议有些人受宠，因此发展了迎合之风（指柯庆施等人）。乔木怀疑“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的说法，认为许多自然现象都是平衡的（又谈到太阳系），不能套用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矛盾的两个方面，已矛盾即无所谓平衡。因此，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不论如何政治挂帅，必须遵从经济规律，要尊重和懂得前人（包括苏联）的经验。我们也谈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论战争规律的道理，以为佐证。7 月 6 日夜，我又在乔木、田家

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他们四人住在一处）处作过一次长谈。大家又研究了平衡问题。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规律，因此，常受破坏。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要保持平衡。谈到公社问题之由来，七里坪、嵖岈山、徐水成万人去参观，供给制也来源于此。在北戴河提出公社等问题，无人有精神准备。乔木还谈到：报纸一反常规，党和中同的活动、言论，都要及时报道。(为什么南宁、成都会议都没有报道?）王稼祥应当受表扬。整风、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都感觉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使人很难伺候。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提法，违反按比例规律；元帅是可以下命令，要绝对服从的。富春提"运动中求平衡"，也是遁词，办不到的。

这之后的几天，我还去看周小舟和周惠，他们谈以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3万个小土炉没有点火，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注意到粮食问题等。1958年韶山吃偏饭，也只增产14%。小舟特别谈到他同彭总的交谈（上庐山之前，彭到过湖南)，议论了主席。彭说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小舟的话是：二公（刘）不要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毛泽东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不愿转弯或回头。我们当时都感觉会议还有压力，缺点、问题还不敢彻底暴露，大家还不能畅所欲言。其间周小舟同乔木也有接触和交谈。

7月11日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即不能团结。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天津局、科长议论，"得不偿失"。上海一党委书记否认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信。对这些同志

要讲清道理。去年四件事：钢翻番，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公社，缺乏综合平衡。引起各方不满，缺点都承认。有人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不会错。有这么些中国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连月亮也好。如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一个。但他的诗（指黄万里填的一首词《贺新郎》，是歌颂百花齐放的）还想读。通过合作化、公社化、农业总增产了，苏联则否。没哪个将军不打败仗，三仗一败二胜，就有威信。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一个、最多三个指头，彭老总说一个多一点（可见此时对彭毫无戒心），成绩还是主要的。公社要整顿。对干部要有分析。北戴河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不公布为好。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庐山，这几次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腰杆才硬。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斯大林讲过：客观规律，人们适应时不感觉，破坏时才感觉。去年破坏一部分规律，才有了认识。经验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打仗的经验既从胜仗，也从败仗来；建设亦如此，要接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产。我们要快一点，要找正确道路。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长短腿几十年未解决。我们有两条腿，五个并举。

张奚若说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枸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

北戴河以来的一年，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了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有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训、走过场、签字。

毛泽东找我们两次谈话

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谈话。毛泽东说，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哄堂大笑，毛本人也大笑了一阵。）关于钢翻一番，不料王鹤寿当成了法律，及时登报则是一波和乔木建议。又批评王鹤寿1958年只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忘了，本末倒置。（谈完话之后，我找鹤寿谈了，动员他在小组会作了检查。）关于农业高指标的由来，我问为什么就相信亩产万斤。毛泽东说受了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一篇文章的影响，钱说太阳能只要多利用一点点，即可亩产万斤或更多。毛说1958年粮食是否增产了三成，他还怀疑，从而讲了填平补齐的道理：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增产三成很不容易。谈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小舟于是讲，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毛泽东也听进去了。我谈到陈云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出来主管为好。毛同意让陈当总指挥，说陈有长处，也有短处，重复谈了上海会议时对陈的称赞。由此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又谈起自己40岁以胶肝火大，总觉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说毛泽覃在江西时，有次他大发脾气（或者是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为此我们又笑了一阵。关于公社问题，毛泽东

说："在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我们认为会议还有压力，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揭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关于讲假话的问题，毛说，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说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意思是指客观规律不易弄清）。我们又说到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这句话也带点影射味道）；反对"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口号，说这些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我将当年第9期《宣教动态》送上，请他翻翻。这一期辑录了一些斯大林的语录：如果社会主义发生经济失调，其危机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等等。

谈完话出来之后，小舟比较得意，将"国乱思良将"这些话传了出去，并说自己这次把话讲完了。这当然引起当时"左派"的议论和谋划对策。我将全部谈话情况同田家英谈了，没同其他人谈。这时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毛泽东的思路还比较偏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我鼓励田将罗世发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点（田是四川人）刚回来，在下面饿过肚子。过分密植，农民反对，为此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罗的高产都是上面压，虚报的。田领导的工作组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材料。田同我谈的事情很多。说有些问题书记讨论后，小平常让乔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谭老板在毛泽东处谈话，毛拍桌而起："就只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他怕毛再激动下去，就促谭一起离开了。田过去同我讲得多的是关于毛的任性：有时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见）变化太

快，易生反复；你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就批；还喜欢让别人写检讨。反右之前，为鼓励鸣放，毛泽东当时批发一个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中），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即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并非个别。关于废除家庭的想法，这都属于胡思乱想，我们都感到忧虑、不安。这也是朱总在小组会上反复讲要巩固家庭的原因。在庐山时，关于1958年的问题，我同田谈的最多。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7月14日印发的，上面只批了"传阅"二字。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都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10点，毛泽东又找小舟、周惠、乔木、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毛谈得多，也谈得比较融恰，还议论了韶山、庐山那两首诗，留我们吃晚饭，喝茅台。以下是毛谈的要点：

关于总路线，真有70%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直干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1957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

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

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敌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7月11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8万多人，到吴起镇剩7000，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还是指1958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

反复讲1300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1959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泽东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11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5%，一般水平是95%，而我们只能立足

于95%。全国年增产30%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泽东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

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这是7月17日，彭的信还刚刚传阅。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谈到洛川会议，是让我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他的，也是启发我们不要倒向彭一边。同11日夜间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要找“左派”朋友谈了。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正式找哪些人谈过话。田家英有内线（警卫副官、英文秘书林克、机要秘书等，都同他关系较密切），有什么动静，他会知道。当时都知道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大家都想探问，摸摸风向。我是守口如瓶的，怕惹出麻烦来。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泽东这时找各大区头头谈话时，还说要印发《阿Q正传》，让大家受点启发，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

彭总的信和《会议纪要》

在座谈19个问题时，毛泽即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

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和我几个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由乔木当组长。各人分写一或两个问题。我负责写“综合平衡”，乔木写总结性的一段。（1988年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查清，《纪要》共12个问题，正式名称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我还写了“加强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当时还是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纠“左”的文件，谭、曾不是主要起草人。神仙会原来不准备开很长，十天半月结束，通过这个《纪要》，大家下山各奔前程。可是这个《纪要》和彭总的信先后发出之后，形势就逐渐起变化了。《纪要》在各个小组中引起程度不同的非难，非难大都集中在乔木写的总结性那一部分，又特别攻击其中不要忘记苏联经验那一段。我在小组会上（组长是林铁，这已是7月18日以后）就听见有人说，总结1958年经验的说法，看不下去，今天的缺点是否“左”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非难，我们几个起草人都在各自的小组会上为《纪要》辩护。

这个时候，发生周惠闲话事件。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1958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总理为此在7月20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评了周惠。黄克诚在这次会上同谭老板有过争执。黄是7月17日上山的，第二天早晨二周与我三人去过黄。黄同情我们的观点，说他在书记处会上说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总还算是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讲话了。所谓有压力，在神仙会阶段就存在的。

彭总的信出来后，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许多人都

赞成彭总的观点。记得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几乎全部赞成（这在《简报》上都有反映的）。自从参加中央会议以来，由于自己工作人员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过言。关于人民日报1958年浮夸风的报道，吴冷西似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有天我们两人一起散步，他鼓励我发言。我大概是7月21日发的言，指出1959年高指标来自1958年的华东计划会议，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柯庆施（发言刊《简报》，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7月20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也作了长篇发言，也谈到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在山上，彭同张住得靠近，他们两人有过交谈。从7月3日到10日彭在西北小组共发过好几次言，当时并未引起很大议论。

围绕彭信和《纪要》，所谓"左"和"右"两方面的意见和分歧，才逐渐明朗。我参加的小组会上，浙江同志说形势很容易好转，如绍兴一抓，鸡和鸡蛋都供过于求。这个发言引起叶季壮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外贸很困难。

刘澜波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住在一栋楼），但当时所有内情我都没有同他谈。有天他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谈到，毛泽东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跟他一起20年，还是一介书生。使我想起广州会议时，毛谈到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过：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这次会乔木等没有参加）。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说，毛泽东对乔木，是既爱之又恶之。田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和李井泉挂帅，他们攻《会议纪要》，攻彭总的信，也攻周惠，这些都是由他们发动的。正在这几天紧张交锋之中，一天吃午饭时，陈正人将彭的信指给我看："小资产阶级狂

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陈对我说这些，也许是好意，怕我陷得太深。我心中明白，我的发言得罪了柯庆施。这时许多说法都传出来了，说彭的信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书记处的人，“左”、“右”一半对一半；等等。彭在西北小组发言，说了“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话；彭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也传出来了。

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外，还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人怎样在他面前攻击彭总（以及我们这些“右派”)，详情不得而知。毛同中央常委同志，这时肯定没有交换过意见。有以下二事为证：

7月20日左右，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我问周：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周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我的记录本上，7月20日记有少奇提的三个问题：1.（1958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2.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1300万吨是否右倾？3000万吨是否“左”倾？

此外，以下情况也是最好的证明：从7月12日到22日，周恩来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即补了15亿。周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冶金部今年24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19个亿；从而提出问题：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杆上？基建到底

铺多大摊子？由于毛 7 月 23 日的讲话，周主持的会议当然中断了。

去年听黄克诚说，彭本不准备上庐山的，是他催促彭上山的。在湖南视察时，小舟陪着彭总，谈得比较融洽，许多观点一致。上山之后，小舟动员彭写的信，信中有些材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毛泽东 7 月 23 日讲话

下面 7 月 23 日毛泽东的讲话，是根据本人当时记录本的详细摘要，内容如下：

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听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劝这些同志听坏话。党内外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修长城倒台；我们修天安门，一塌胡涂。党内有许多动摇分子，看得不完全，有火气，有的人历史有问题，挨过批评（广东军区）。江西党校有集中反映，党内代表也是右派，可以辩论，三四年再转过来。这回会内会外结合，地方太小，不然把右派都请来开会。越讲得一塌胡涂越好，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这一名词。顶一个月，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原因是做了一些好事。现在腰杆子不真正硬，多数派要硬起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工农商交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什么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公社运动，嵖岈山书记告诉我，七八九这三个月，每天 3000 人参观；徐水、七营里也是这么多人，到那里去取经，其中也有县、社队和省地委干部。大概是出

了真理，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有一些，只想搞多搞快。三个地方三个月90万人朝山进香，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你们心是好的，事实难于办到，要有步骤，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农民一个时期有狂热性。春节前后，两个多月不高兴，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稀饭、蕃薯。因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群众不欢迎。说服这些干部。三四月风即压下去了。现在听说大多数转过来，留恋共产主义的是少数。平调东西要收回，几亿人受到教育，不能你的就是我的。没读政治经济学，不知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公社一级不懂一点不好。不识字，可以给他们讲课。北齐斛律金作《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非斛律金作。）斛律金一字不识，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齐左丞相是斛律光，不是斛律金。）柯老讲15年全民进大学。农民、工人不是也学哲学吗？同他们讲课，比知识分子易懂。

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我们作过多次检讨，他们没有听到。有些问题这次不会解决，有些同志不会放弃观点。要养成习惯，听得进坏话。我少年时代也是一股火气：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还不放弃，硬着头皮顶住，学会这一条。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一些同志是摇摆的，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历史上四条路线，现在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蒋帮谓我"秧歌王朝"）。这部分同志扭秧歌，忧心如焚，想把国家

搞好。对动摇分子不赞成戴帽子。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则是资产阶级泄气性、悲观性。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就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 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陈云和小平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失有得"，失放在前，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帽子：资产阶级动摇性或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70万个生产队，70万条错误，都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完蛋。帝国主义不来，人民要起来革命。专办讲坏话的报纸，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他们不是右派，像中间派，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还有30公里。现在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有益、有害？有害。

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赞成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保持三分之一即好，1.5亿人。坚持下来了不起。希望达到一半左右，2.5亿人。《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不仅节省劳力，还节省物资。有的用上了自来水。建议河南为食堂搞一套机械化。科学院到昌黎县调查，有右派出来说，无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如计委是计划机关，却不会管计划。各个部、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原谅。

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真没有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为自己开脱一下，因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对建设根本外行。没有领导，哪来英明。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当说在我（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堆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柯讲600万吨。我6月讲1070万吨。北戴河发公报，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补贴8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即由此而来。浪费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好铁奋斗。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有话就讲，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触不得；一部分方向危险。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070万吨，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公社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如获至宝，记者问我，我说“好”，便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推不掉。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总路线是个虚的，见之于农业、工业。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分担一点。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列宁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列宁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一国可胜利，可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

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起来后，马克思赞成，估计会失败。但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当然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1927年失败了？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富春、鹤寿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柯老要搞600万吨，那第一个责任是我。屎都拉出来，人就舒服了。

“不仅对事，也要对人”

毛泽东讲话完了，即散会，彭总在门口挡着毛泽东，说他的信是向主席个人写的，并没有让大家来讨论。

我的心情很沉重，与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四个人走出会场，散步了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都感到沉重之至。走到一个石亭中，田用木炭枝在石柱上写了这首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处，大家都不能接受毛的讲话，觉得再无处可诉了，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小舟特别激愤，建议到黄克诚处谈谈，我不赞成，怕有人看见犯嫌疑。小舟坚持去，于是给黄打电话，黄不赞成去，他不愿来，但拗不过小舟的坚持，只好同意我们三人去。小舟和我都有点火气。小舟谈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意指毛泽东偏听偏信。我说，这不是钓鱼吗？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说：“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黄比较冷静，劝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我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谈话

之间，彭总走进来了（他住在黄的对面房）。房中无多余椅子，我忙站起让座，心中觉得不大好，示意小舟辞去。我们三人即起身出来，各自归去。但出来后，被人碰见了。随即毛泽东知道了此事。于是7月26日传令：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大概第三天起，我们在小组中即开始挨批斗。小组会批评我的第一天，习仲勋说我还算是中间偏左的。可是有人受柯庆施的指使，说我在火车上讲1958年出了轨。柯之不放过我，原因就在我曾在小组会发言批评了他。康生不放过我，说我是中央的“间谍”，在延安挨过抢救，住过保安处，因而对党怀恨。还散播谣言，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我的父亲死于1922年）。别的小组也传出，有“文班子”，也有“武班子”。

7月23日到29日之间，田家英还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他来住处告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还告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后来的“决议”，我被列入“追随者”）。这期间田还告我二事：在毛泽东居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就是纳吉。毛泽东一人在房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对人”之后，批斗升级，小组会上提出“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转告乔木的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日夜间的疑心。我于是向毛写了一信，说明23日夜间是怎样去黄克诚处的，谈了些有关湖南的情况（那夜也确谈了湖南形势），黄劝我们有问题找主席谈。特别说明彭总进来后，我们立即离去，当然隐瞒了“斯大林晚年”之说这些要害。信晚上送去，第

二天（30 日）大早，毛泽东就找我们四人去谈话。毛泽东说，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谈了一军团、三军团的问题，提出（传说彭黄）“父子关系”问题。黄说明在江西被打成 AB 团时，是彭救了他，因此同彭的感情关系始终很好；但在某些政治、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就说：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他并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了解彭黄关系）；随后又说，同我们几个人不通心，同小舟尤格格不入。我们反映会议空气太紧张。毛说，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他还跟我们谈到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我们提出“湖南集团”的问题，希望能予澄清。毛说，这是一种误会。

谈完出来后，遇见田家英，我将“解疙瘩”之语告他，田说，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

这时，田还告诉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批斗，太不应当了。慨叹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还担心周恩来也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纪要》同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

8 月 1 日常委会及最后阶段

（常委会开了两次，第一次是 7 月 31 日，第二次才是 8 月 1 日。当时我那个记录本只摘记下 8 月 1 日的会议情况。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找到 7 月 31 日记录的原件。）

8 月 1 日上午 10 点到下午 5 点（中间没有休息，吃的包子），由毛泽东主持，开中央常委会。参加的有少奇、总理、

朱总、林彪、彭真，以及彭总和贺龙。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我四个旁听，彭真让我做记录。(记录本今年找到了，铅笔字迹了草、模糊，尚无时间整理出来。)

林彪大概是 17 日以后才上山的，他当然是搬来的主要“救兵”；可能担心军权旁落，已决定让林接管国防部。但在会上并没有同意彭辞职。这个会议是算彭的历史总帐。一多半时间由毛泽东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苏联教训，等等。彭在谈到一些历史等方面情节时，有不少对话。总理只问过他与彭总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斯大林送彭出门说过什么话这一件事。少奇也只问过长征时在三军团一件不关紧要的事。彭真解释过延安整风时，平江暴动士兵委员会人员受审查事。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总，内容比较温和，“没有击中要害”。没等朱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总司令红了脸，就停止发言，直到散会，没有再讲一句话。接着就是林彪发言（我的记录本上没有朱总的发言，也没有林最初讲的几句话，但我记得极清楚，估计彭真、黄克诚、周惠也可能记得清楚），只简短几句，可说“击中要害”，为整个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泽东前一部分谈井冈山，几次军事情况和几次历史路线斗争。打长沙，打南昌，打吉安、九江，打赣州等等。

彭插话：1934 年一二月，我已转了，认为仍由老毛领导好，过去事实可作证明，我同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说：李立三多高多大，你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听王明的话。高饶事陷得很深。纠“左”比纠右难？第二次王明路线，高岗死了，王明至今不认错。纠正铁托容易？整右容易，请包整王明。高饶能改？38年，右倾联系资产阶级，“左”倾联系小资产阶级。路线本身不能改，要让别人来改。几次路线都摇摆，心里恨得要死，由于挨了整。今后也很难说。（彭插话：61岁了！）

以下他又讲了一段大跃进的过程。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说主要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只二个亿；搞平均主义，无非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说过去食堂留一半、三分之一也好的话（吴芝圃是百分之百），这对右派也给了些影响。到郑州，以为我是不办食堂之人。食堂无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自动集合办起来。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公社，总有一天给张楼梯让下来。物质基础，西欧雄厚。波兰、东欧也不错，但办食堂、公社难。我们物质条件就是人，要组织起来。物质条件好，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东部几亿人，土地少，组织合作化比较易。苏联地广人稀，如入无人之境。

北戴河高兴中埋伏了不高兴。比例问题，今年5月已解决。原来谈19个问题，未提反右倾。北京就有人越落越低、气越泄。彭的信和《会议纪要》，很有功劳。小舟等人主要锋芒对着除自己人以外庐山会议所有的人，要发牢骚，要出气，要讲失调原因，被插了白旗。（小舟插话：并非出气问题。）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随后对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来，是否如此？

彭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达到此程度。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立三路线自己是动摇的。许多历史事件，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然后谈湘鄂赣历史，一、三军团问题。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等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对立三路线并不那样坚决，但也没有反对。谈富田事变。张辉瓒搞反革命布告（打倒毛，拥护朱彭黄）。主席过去曾送我两本书：《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批语还记得，一直带在身边。（这一段话是不同意三七开）接着谈到抗战时期。毛泽东说，打蒋介石10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忽然漂亮了。这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林彪插话，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说是弼时作的决定。批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彭谈百团大战的过程，怎样逐步扩大；战后才搞武工队，对以后整伪军也有好处。彭谈到"张飞"的外号是毛泽东取的。说自己对敌斗争是坚决的。马克思主义没学通，但盲从也不行。"我有农民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在北京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上三宝殿。"然后谈到同毛泽东的关系是对半开，毛泽东则坚持三七开。两人相持不下。毛强调：多次重要时期，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责备彭搞背后议论。说"我同常委之间、同别人，从来没讲过你什么。为了使你安心工作，给林彪发转业费。"之后毛泽东又回过来谈1958年，谈到抗美援朝时同朝鲜领导人的关系。最后谈到《内参》不可不看，决不可尽信，《内参》是专搞黑暗的。彭最后表示三条：不反革命，不自杀，可以去种田。

8月1日晚上开大会，周恩来通知："问题不少"即右倾机会主义，怀疑、动摇总路线；向党、向中央、向主席进攻，打着所谓无产阶级旗帜，向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这一切有思想根源，有体系，有活动；彭的信起了反面教材作用，等等。

8月2日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长篇讲话，语气很重，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八大二次会议定的路线究竟对不对？起初神仙会，并无紧张局势，有些同志要求民主，感到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求点紧张形势，要言论自由，想攻击、破坏总路线，要破坏、批评总路线的自由。重点在去年是否工作基本做坏了？1957年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看来是这么回事。社会主义之命运由我们掌握，应该团结，现在有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一看二帮，还是有希望的。无非改或不能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一时跑到那方面，形势有利，经过说服，可以过来。在延安时，洛甫开始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来，就承认了。这回旧病复发，向楚太子大喊一声，有病要治呀！寄生虫作怪，可潜伏，气候适宜就出来了。上山原来总结三句话；后来就在"问题不少"上发生问题。现在改换题目：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

8月3日起，到会162名中央委员分成三个大组，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周小舟（和张一组）四同志，斗争自然是激烈的，无限上纲上线。一直开到8月10日。我参加彭总这组。康生尤其激昂慷慨。也听到他这样的发言：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

活动。

这个期间毛泽东批发了好几个文件。关于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解散无为县公社食堂的批语：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叛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漏网残余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要挽救他们，就要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张恺帆当然随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8月10日，我被调到黄克诚组去对证一个问题。结果，7月23日夜二周与我在黄处的谈话，有关斯大林晚年的议论被揭发出来，这就使斗争更火上加油，白热化起来。

8月11日开全体大会，毛泽东长篇讲话，从世界观方法论讲起。说历来犯错误的是唯我主义、极端主观唯心主义。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参加党。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党员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纠“左”比纠右难？历史经验证明：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哪里去了？骂人民公社，是地富反坏骂，兄弟国家怀疑。对大跃进，内外怀疑。指标搞高了，只要略有增产，农业有无一成？一成就是跃进。可能三成，还得了。

高饶事件，有的保护过关，实是彭高联盟。庐山两种气候，好得很；另一种是同罗隆基接近，政治上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次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共产风、浮夸风吹

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总要吹的，这一切都是好东西，大可教育全党全民。然后又讲哲学，讲必须政治挂帅。讲“自由、平等、博爱”（这时特别从北京调来当年彭在太行写的文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第一书记挂帅，实在讨厌，我却高兴；你挂帅，不如我挂。只要大家通过，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集体领导要不要？赫鲁晓夫强调的。有无集体领导？有无民主言论自由？这次要求民主，要求集体领导，鼻子不灵，头两周不灵。庐山两个司令部。这次满足同志们要求，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后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都干，天天开，免得老说没有民主，个人独裁。你那个军委会有无民主集中制？现在攻不民主自由，他们要搞政治挂帅，搞小跃进、不跃进。（延安）华北座谈会操四十天娘，操二十天不成，这次满足四十天，加五天，听你操，满足操娘欲望。现在要求民主自由，同章罗联盟一个性质。资产阶级有了民主、自由、博爱，无产阶级就无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你讲我搞阴谋，就大鱼、小鱼、吃人鲨鱼一起钓（23 日夜，我讲过钓鱼问题）。

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听到这里，我倒放心了，知道田家英等不致受牵连。）周惠挨了批，小舟不交心。

我怎么一百八十度转变？（这是小舟讲的）我是蝙蝠，开头属俱乐部，7 月 23 日是转变了。臭屁、香屁都放，通通让人讲话。估计有两重性：革命、反动，完全不革命不合乎事实。彭同许多人不合作，不单反对我，七个政治局委

员，有几个合得来？十个元帅，九个合不来。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从不提团结口号。三十一年关系，难道庐山就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进步。

8月13日至15日，开全体大会，彭、黄、张、周作检查，大家批评，当然进一步加码，尤其逼彭承认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要定性质：是魏延、冯玉祥、纳吉、铁托。（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复杂，产生一种很悲观的情绪：这是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人敢讲半句公道话。）

8月16日开大会，通过决议，毛泽东再作长篇讲话。开首说，庐山会议解决了问题，总结经验就要这样总结。19个问题变成第二位了，犯错误同志帮了大忙。之后说彭德怀犯过五次路线错误，依历史顺序又算了总帐：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接着谈海瑞问题，说海瑞历来是“左”派。我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彭黄问题带复杂性、曲折性，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人们不理解，由于不了解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次大会打了防疫针。大家要对他们做工作，要往来，采取热情帮助态度，要开团结大会，要看作是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最后还谈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可以争取过来。牛训练三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人不如牛乎？刘仁静现在当翻译，要给人出路嘛！立三也改了。（林彪最后插话：这次会，避免了大马鞍形，避免了分裂。）

关于庐山会议，《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文本，则是这样定性：“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得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上面就我的记录本，将1959年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特别是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谈话要点录下，以便了解会议和毛泽东在山上思想变化的过程。回头看这段史实，试作如下总结：

1. 上山之初，毛泽东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保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转起来，丝毫没有认输。因此，是开神仙会，有闲情赋诗。开十来天，讨论好若干问题，通过一个《纪要》。

2. 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不仅彭总、少奇、朱总都发了言，表了态，周恩来直到7月23日前，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领导开会，算细帐，抓调整。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从毛泽东起，大体还是有这么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的柯庆施等）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强调气可鼓不可泄（认为落实指标即泄了气）；大体还是这一部分人又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人为财死”。毛泽东当然要靠诸侯，不能靠秀才。

3. 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粗，无张飞之细”，有些话听者有心（伤了人），又有所谓历史旧帐。那些进谗言邀宠之人（其中有阿Q们），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于是毛泽东沉不住气，主观武断为是“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要“摘分

裂”，组织“章罗联盟”。（这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因素：凡属反对过自己的人，又不转变为百依百顺，一遇到机会，就不惜当场廷杖，乃至“昨日功臣，今朝祸首”。

4. 军权不能旁落，机不可失，调林彪上山。林彪看似讲话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张牙舞爪，慷慨陈词，但三言两语，起了定调的作用，有“护驾”之功。

5. 当然，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大斗争中，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

6.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一整套“左”倾的东西。“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自我支配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了。

三[①]

我们第十组全体同志，经过12次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写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意义深远，衷心拥护，并希望尽快写好。这个《决议》很难写，写成这个草稿很不容易。它的基

① 1980年11月11日起草的小组讨论总结。

本内容是好的，包括对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说明。但是大家感到还有不够之处。综合 12 次讨论中大家一致的意见，主要是有关长达 20 年“左”的错误的形成及其原因等。现分六个专题，简报如下，供修改时参考。

（一）《决议》是否以两条主线来写：一条是八大路线，以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条是搞政治思想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思想、理论、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串起来写，这样更是非分明，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1. 以毛泽东为首的“左”的错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开国以来，一整套“左”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在党内逐渐产生、发展，终于占了统治地位。第一阶段（1949—1957年），已经出现了某些“左”的错误。如“三反”、“五反”定指标，限期抓“老虎”，整死或冤屈了一些人；三大改造，原定十五年，实际三年完成，搞得太急，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觉悟程度；反右派斗争，整了 50 多万“右派”，副作用极大。

第二阶段（1958—1965 年），是“左”的错误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提出了所谓“三面红旗”：否定计划经济，搞大跃进；在农村，高级社尚未巩固，又搞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想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提出了“总路线”。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几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太平盛世绝无仅有之事，应当正视这一悲剧。三年大跃进，从经济到人的思想，受到很大破坏和搅乱。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右倾，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1962 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没有改正错误，随后沿着“左”倾错误越走

越远。1962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进一步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1964年搞“四清”，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整了一批又一批人。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统治全党，造成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特别严重的是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败坏了党的光辉形象，在人民中产生了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第四阶段（1976—1979年），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毛主席虽然逝世，但华国锋继续“左”的错误，造成目前经济调整极其困难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宣告“左”的错误的基本终结。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是正确的。

2. 过去二十年的根本分歧。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党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倾向的斗争。一种是八大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的错误路线。毛泽东以他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地位，使“左”的错误长期占统治地位，使八大路线无法贯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不同程度地包括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同志），同“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和一定的斗争。

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

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当时社会矛盾的科学的论断。八大根据这个基本论断制定的政治路线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这个矛盾。这条路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当时中国的国情。

有关组织路线，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很明确地规定，要坚持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个人迷信、个人突出。思想路线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毛泽东从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出发，坚持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也就是后来确定的九大路线：“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四清”要整党内走资派。到“文化大革命”，越发展越玄，在社会上找不到资产阶级了，就索性肯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并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种完全背离我国社会现状也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分析，以之为据制定的政治路线，只能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倒一切，给全党、全国人民造成十年浩劫。

3. 两条主线、两种倾向的斗争。

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即不赞成八大决议中有关“先进

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的论断，并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违反八大路线。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派，用“引蛇出洞”的不正当办法，开展反右派斗争，整了50多万“右派”，从此失信于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第二次是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反冒进，批评周恩来、陈云（实际也涉及刘少奇），为他推行一套“左”倾错误扫除障碍。紧接着进入三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一次大破坏。

对毛泽东“左”的错误第一次大的抵制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会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作了调查研究，准备上山反“左”倾。会议开始阶段，毛泽东同一部分同志的谈话中，也表示要纠正“左”倾错误。但当彭德怀按正常程序写了一封完全正确的信，张闻天作了长篇很深刻的批“左”发言后，毛泽东即独断专横地发动了一场反右倾的斗争，全国整了成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二次是从1960年冬开始，经过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首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得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了三年严重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自我批评的括，实际上并未正视自己多年来的“左”的错误，仍然不顾大家的反对，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走下去。第三次是在调整任务尚未完成，广大人民还没有完全解除饥饿状态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将斗争升级，在1962年7月北戴河会议和9月十中全会，又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批“黑猫白猫”，批包产到户，批单干风，批翻案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1963年又要

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毛泽东沿着“左”的错误越走越远，虽然受到抵制，但他一意孤行，到1966年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乃至把党内大多数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统统打倒。

在十年浩劫中，党章、宪法遭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30名政治局委员打倒27人；书记处17人打倒14人；10个元帅，除病故、休养的和林彪外，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即使在这种困难形势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如“文化大革命”前夕，彭真提出“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已经泛滥之后，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严厉批判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所谓“二月逆流”）；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在四届人大重新提出了四化任务；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方面在政治局批判“四人帮”，一方面抓全面整顿，批判派性，平反了部分冤假错案等等。至于全国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抵制和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出现了坚持反对四人帮，不惜以身殉难的张志新、郭维彬等一批英雄人物。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许多大城市掀起群众性的“四五运动”，是广大党员和群众自觉同“左”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斗争的一次高潮。

回顾我党20多年来同“左”的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由于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使毛泽东整套“左”的错误长期占了统治地位，使坚持正确路线的

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仍然坚持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和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功绩，以及张志新式的英雄人物，在《决议》中应有充分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增强对我党的信任，提高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二）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问题。

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功是第一位的，过是第二位的，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来的27年如何评价，写法上应认真斟酌，以求既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又能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在建国以前的28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历尽艰辛、曲折，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革命胜利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不仅对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27年，在1956年以前，路线基本正确，全党胜利地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显著，但他的“左”的思想已经露头。从1957年到1976年，他背离了八大路线，也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了一整套“左”的错误的东西，个人迷信发展到“文革”十年中的造神运动，由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变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这对党、对人民和毛泽东自己，都是

一场历史大悲剧。说明这一悲剧的的原委，吸取造成这场悲剧的教训，是《决议》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必然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由于他的晚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东思想，这给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确切内容，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大家认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为此，建议有《决议》评定毛泽东功过一节中，宜于肯定毛泽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这一基本原则，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有若干新的补充。

（三）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成长期坚持“左”的错误的独断专行者，客观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的封建制度历史悠久，基本上是个农民国家，专制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我党长期在战争环境中活动，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又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斯大林集权领导的影响，加上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以及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等原因。但亦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美帝国主义交了手，认为美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三大改造的胜利，比预料的迅速，认为中国自己有了一套经验。于是，在这种形势面前，胜利冲昏了头脑，逐渐把中国也把自己摆在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忘乎所以，失去自知之明。反右派，封住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坚持正确意见同

志的嘴。“大跃进”失败了，又不认输。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采取了不承认主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一意孤行，走了上唯意志论的道路。

毛泽东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法家治国和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种种影响。他历来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却不谈汉文帝、李世民。自认“坑儒”比秦始皇还多。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汉高祖的遗嘱：“安刘氏者勃也”。到了晚年，常用中国的古书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深挖洞”来自明初朱升给朱元璋提的建议。深居中南海，不接触群众，连政治局委员都很少见。让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发号施令；让毛远新当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最后当高级联络员。把自己同外界隔绝开来，将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一意孤行，乃至给别有用心的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机，陷入他们的罪恶包围，酿成个人与中国历史的一场大悲剧。

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发动和领导，一切工作、一切事情都要大搞群众运动，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破坏性后果一次比一次严重。每次运动都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整掉大批干部，使党和国家不得安宁。这种群众运动的方法同群众路线完全是两回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今后应禁止搞这种“群众运动”。

毛泽东远贤人，亲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使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之流投其所好，得到重用。而同生死，共患难，正派刚直，不唯命是从的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邓子恢、谭

震林，以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接近右派的边缘”、“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罗织罪名，或一棍子打死。

晚年在作风方面，出尔反尔，言行不一，这方面问题也多。1956年八大决议是自己举手通过的，后来不认帐。庐山会议先表白要当反“左”倾的头子，后来又亲自发动整“右倾机会主义”。指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批海瑞罢官文章，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是搞突然袭击。“二月提纲”明明是自己批准的，却说是彭真背着中央搞的。请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说“人才难得”，后来又说得一无是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个伟大人物的个性和气质，这种偶然性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常常起着影响历史前进和倒退的作用。毛泽东也不例外。分析主观原因，这类问题无法回避。

总之，应当从主观、客观上找根源，即他的错误的思想、观点、理论，从他的早年、中年到晚年，有一个潜伏、发生、发展到形成的过程。关于已成为党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过去我们有过基本的总结，举世公认，作为人民的财富，今后应当继续坚持和发展。但对于他的错误思想和理论，也应当将来龙去脉理清楚，作为教训，避免今后再犯类似错误。建议在适当时机毫无遗漏地编出一部内部的《毛泽东全集》，以便一方面总结正确的毛泽思想，另一方面，从中理清他的错误思想源流。

（四）必须把第四阶段写进决议中。

建国以来的第四阶段要总结，必须写进《决议》。理由是：第一，只有把这一段写上，才是完整的建国31年的若

干历史问题决议。第二，只有把这一段的是非分清，才能肃清“左”的错误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推动四化建设。第三，在写这一阶段开头，应概述一下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粉碎“四人帮”，华国锋是有功劳的，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从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左”的错误继续发展，表现在：

1. 在政治上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把“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在十一大全面加以肯定。

2. 在思想上宣传两个“凡是”。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在同年2月7日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纠正“左”的错误设置了重重障碍。

3. 搞个人迷信。华国锋以“英明领袖”自居，到处挂像，到处题词，大唱“交城山、交城水”。大加宣扬“你办事，我放心”，名曰维护毛主席，实则为了树自己。

4. 迟迟不给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彭真等平反昭雪，不让邓小平、陈云等出来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次发生杀害张志新式革命同志的事件，过早地宣布揭批查结束，阻碍清查“四人帮”的深入发展，包庇了一批有严重错误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他都是有责任的。

5. 在经济上又搞了一次冒进。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

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提出“四个一点”。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等等。其中引进项目22个。继续搞高指标。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1985年要求粮食达到8000亿斤，原油2.5亿吨等等。三年大跃进搞“小土群”；这次冒进搞“大洋群”，经济上同样造成很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领导下，纠正“左”倾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实行起来掣肘重重，步履艰难。因此，我们认为，让华国锋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是不合适的。

当前，思想上、组织上的“左”的流毒严重，要肃清必须做艰巨的工作，《决议》应作出必要的规定，否则留下后患。

（五）《决议》应充实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八大路线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转折关头召开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用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并相应地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和组织路线。这次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八大制订的路线，是切合我国实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八大路线能够顺利执行，我国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落后贫困。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八大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大路线的重大意义将会越来越明显。

2. 关于“三面红旗”

《决议》应该充实经济工作的内容，我们认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反映，它的流毒，至今还在损害我们的国民经济。总路线的头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反映了精神第一的唯心史观；第三句“多快好省”，不能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大跃进，是一个盲目蛮干，大轰大嗡的口号，已经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人民公社化，来自毛泽东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吃大锅饭，搞穷过渡，超越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多年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

3. 关于党的“九大”和“十大”

毛泽东背着中央政治局，依靠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被打倒，或靠边站，党的正常生活被扼杀。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先后召开了“九大”和“十大”。召开“九大”的目的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让林彪当接班人，并把一大批造反派头头选进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牢牢地控制党权。不久，林彪叛国摔死，又召开“十大”，让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王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这是我党历史上最阴暗的一页，《决议》应该对“九大”、“十大”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结论。

（六）《决议》要认真总结党的领袖搞个人独断专行的教训。

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

独断专行，这个问题国际国内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党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定要总结教训。一是禁止搞个人迷信，不要过多地宣传个人；二是加强集体领导，健全民主集中制；三是不要兼职过多，要有个制约；四是废除终身制；五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各级领导人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经过批评教育，坚持不改者，要给予法律制裁，直至罢免，等等。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再次要求中央编印一批历史文件和资料，作为讨论学习党的这段历史的参考。

四千人纵论毛泽东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件，是集思广益的成果。草案出来之后，中央在1980年10月到11月组织全党政军四千干部讨论。我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十组（能源组）。当年会场上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的气氛，至今记忆犹新。本着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各就所知所见，畅谈党史上的一些尖锐问题，谈得最多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它的根源和后果。许多意见已经被吸收在后来正式公布的《决议》中了。我作为小组组长，同时关注其他组讨论中的情况，认真阅读了会议的简报，当时就把一些我以为值得重视的意见摘记了下来。下面就是这些摘记中的一部分。发表这些意见的同志来自北京中央各系统各部门，经济、外交、军队、文化、理论等各方面的人都有。这些话是谁说的，除个别人以外，当时没有记下来，现在更是想不起来了。我觉得这也好，因为重要的是这些意见，而不在于这些意见是谁说的。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什么时候开始？

——左倾路线萌芽于“三反”、“五反”，定型于反右，流行于“大跃进”，理论化于八届十中全会，登峰造极于“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扩大了敌情，轻率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到处抓“老虎”。

——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八大后形成的。1957年党决定整风，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除极少数人意见比较尖锐或有些刺耳的话以外，绝大多数党内外同志，是真诚实意给党提意见的，有些人对过去运动的“左”的做法提出一些批评。但毛泽东却采取极不光明正大的“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以“知无不言，言不无尽”为诱饵，实行“言者有罪，闻者反击”，把全国50多万跟着党干革命，敢于提意见的党内外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干部划为右派，当作敌人实行专政。

——1957年是一个分水岭。反右派斗争是路线错误，是毛泽东由上坡走下坡的开始。反右派斗争同“大跃进”的出现有密切关系。

——毛泽东从1957年起，长达20年，提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关于反右斗争，同意把它作为毛泽东走下坡路的分界的观点。反右以前，知识分子对党感情很深，无话不对组织说，抱有极大希望，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回归祖国。反右后，就很少了。

1957年以后，发生了一个大转折，出现了很多人为的不幸和灾难。可以说一个不幸接着一个不幸，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

——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毛泽东从1955年合作化问题报告以后，逐渐走向错误路线。人民公社运动不但当时造成严重困难，直到他去世还没有完全纠正。全国学大寨，一刀切，穷过渡，取消自留地、集市贸易，都是错误的。他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瞎指挥，自己不懂，还要一个人说了算。

——“左”倾错误究竟从何时开始？不是从1956年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才开始的，以前就有了苗头。如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实际上是从上到下一哄而起。1952年就提出用10年时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政治上早就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夸大敌情，也不是从1957年反右才开始。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是1955年的事。

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有哪些？可以说，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外交都有，其中以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主要标志。讨论时对这三次错误的意见最为集中。

关于反右派：

——1957年开展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建国以来培养的大学生都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把知识分子当成了革命对象。反右派不仅是误伤了几十万人的问题，而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破坏，也是对智力资源的大破坏。

——1957年所以发动那么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就是为了护短。因为所谓的右派揭了我们的短，指出了我们党的不少缺点错误。

——反右派斗争如果整错了10%，甚至到30%，可以

叫扩大化，如果扩大到99%，还叫什么扩大化？真正的右派有几个？真有要杀共产党的，可以抓起来，但没有必要搞那么个运动。不同政见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右斗争的手法也是恶劣的，什么“阳谋”，“引蛇出洞”，使我们党第一次失信于民。可以说，我们党走下坡路，我们的事业走向灾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应该说是搞错了。全国50多万右派，经改正还剩下几个？不清楚。但就新华社来说，当时划了83个右派，经过复查改正，只有一个人因为有其他问题而未改正。难道新华社几千人为这一个人折腾了十个多月，是完全必要的吗？在对历史案件的平反中，对“文化大革命”，对“反右倾”都做了彻底否定，为什么对“反右派”就不予否定，反而一再强调“必要”呢？这是不是对“反右派”的实情及其严重后果缺乏切身体会有关呢？

讨论中，一些军队系统的同志也谈到当年军内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人说，当年军队干部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千多人。还有人谈到自己经历的事情：某军事院校因为完不成抓右派的指标，就找到一个教员，因为这个教员关起门来研究遥控爆破，就说他是搞特务活动，搞得他走投无路，跳楼自杀了。

——反右派斗争的错误非常严重，号召帮助整风，引蛇出洞，然后大抓右派，手法恶劣，不光明正大。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打击，“文化大革命”再一次挨整，现在还有严重的后遗症。

——历史上整“思想犯”是从反右开始的。1957年上半年发布“五一”指示，要求帮助党整风，党外人士响应号

召提了一些意见，有的人的话讲得尖锐一点，马上转入反击右派，整几十万人。后期甚至还专门在党内搜集一些党员在分散的个别的谈话中的言论，来批判这些党员，把他们定为或内定为右派或严重右倾。这种作法，在党内外，特别在知识分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关于1957年反右派有个理论性问题，当时在党内也揪“资产阶级右派”，这同后来提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有无联系？

——反右派斗争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采取各种错误做法进行的，因而导致了严重的恶果，是彻底失败的一场政治运动。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后果，不仅仅是误伤了几十万人的问题（这可以说是造成智力资源的大破坏），而且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大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大破坏，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大破坏，因而不能不是党的威信的大破坏。这恶果不但是十分严重的，而且影响深远。永远不要再做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错事。

关于“大跃进”：

——毛泽东对经济法则没有很好的研究，认为经济是从属于政治的东西，不说则已，一说就是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等等。于是出现了人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等，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不可思议的政策，致使全国人民处于灾难境地，饿死的人何止千万！在经济建设中也总是以所谓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来推动一切，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他不断强调和夸大人

的主观能动作用，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是这样讲的：“君主们在任何时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毛泽东违背了马克思的论断，对经济规律很不了解。

——毛泽东在抓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犯了主观急躁错误，高指标，瞎指挥，拒绝和批判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意见。他就是欣赏供给制，对按劳分配不感兴趣。他的有些想法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从上而下强迫大搞“群众运动”，强制推行，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三面红旗”都是错误的。总路线为什么是错的？从文字来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不像路线，而是一个口号，但经济上的“左”倾路线贯彻了20多年，都是同这个总路线分不开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见之于行动，就是一连串的大轰大鸣，结果经济上造成很大浪费，饿死了很多人。这套办法是从过去指挥打仗，搞土地革命继承下来的。至于“多快好省”，其结果就是高指标、高积累，盲目搞基本建设。从1957年以来，无论工业、农业、计划、流通各个方面，指导思想都是错的。

不少发言都谈到经济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位同志说，我不久前曾到辽宁的朝阳、河北的承德地区走一趟，那里的群众在战争年代是同我们同甘共苦的，现在许多公社的人民“衣不遮体，房上无泥，炉上无席，没钱治病，一贫如洗”，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前辽宁朝阳地区过去叫金朝阳，现在生活很困难，天灾是个原因，几年“朝农”经验，在那里的大破坏是主要原因。建昌县过去也是原热东一带较富的

地区，几十年没有大变化。仅有195户的娘娘庙公社孟松沟大队，全队25岁到50岁的男社员92人，因为穷，取不起媳妇。朝阳县大屯公社义天屯大队大梨树沟生产队，共26户，有34个25岁以上的光棍，没有一个育龄妇女。群众说，“这个地方真正好，计划生育不要搞”。那里的群众说，“我们实在困难，就怕饿肚子”。我听了，觉得实在对不起人民群众。

——对于这些困难的原因，许多人都说是人祸不是天灾。毛泽东却说我们的困难是由于天灾和苏联的破坏造成的，这是护短。苏联撕毁合同是有影响，但那时苏联只是帮助我们建一些军工厂，并没有与人民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工厂。因此，对国民经济影响并不大。我们主要是农业没有搞好而造成的困难，应该说是由于我们工作的错误造成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不会有这连续十年的历史性大悲剧。“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起主导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同党中央，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同全党全国人民这些对立的统一体，他始终是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这一方面占的比重如此之大，以至于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个人的权威、意志、思想和行为，成了不可抗拒、不可改变的，几乎构成了一种神奇的力量。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要整人，整掉了好人，重用了坏人。“反修防修”只是借口。早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以后，他就产生

了后顾之忧。他多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最危险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就是证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撤销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总书记职务。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早下了决心，考虑时间很长。八届十中全会，四清时就形成了他的思想体系，是作为晚年的一件大事来做的。他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是找适当的时机。他对党内外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刘少奇当作"赫鲁晓夫"，以为中央许多人不听他的话，不相信这个党，多少领导权不在手里。党的组织领导骨干也不要了，大批几十年的老战友也不要了。

——毛泽东所说的"反修防修"是什么意思呢？苏联变质，赫鲁晓夫挖斯大林的墓。而毛泽东就神经过敏的认为赫鲁晓夫睡在自己身边，以致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机，是要彻底扫除推行他的"左"倾路线的障碍，以便把他的"左"倾路线贯彻到底，这不可避免地要把认为反对他的路线的同志和防碍他推行这条路线的同志统统整下去，以解除自己的"心腹之患"，防止有朝一日有人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

——毛泽东非常担心他死后在中国出现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他把中国党的状况估计得同苏联差不多。怎么办？干脆发动"文化大革命"，首先打倒刘少奇，然后打倒其他，直到打倒一切。

讨论中，许多人或是从总体上，或是从一个方面，对毛

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归纳和综合。

——从1957年到粉碎“四人帮”，犯了那么多，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造成那么多严重的灾难，是因为毛泽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他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理论。

(1) 关于阶级斗争。本来八大已经作出正确的结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毛泽东在1957年就推翻了八大的结论，提出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到八届十中全会更系统化了。阶级斗争的时间愈讲愈长，1957年说两三个五年计划；庐山会议上说至少20年，可能半个世纪；十中全会上说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1963年修改统战部的报告又说，几十年是不行的，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阶级敌人愈讲愈多，到后来弄得到处都是阶级敌人，身边都是赫鲁晓夫，草木皆兵。阶级斗争的矛头愈来愈指向党内，庐山会议就说阶级斗争转向党内，后来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套理论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

(2) 经济建设上，毛泽东的思想就是“大跃进”，实际就是大冒进，搞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收购，以粮为纲，以钢为纲。

(3)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不顾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任意改变生产关系，搞大、公、平、穷。1958年提出过渡到共产主义，乘穷过渡，比苏联先过渡，只是不宣布。一贯批“资产阶级法权”，反对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提倡搞供给制，实际上就是平均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空

想社会主义？可以研究。甚至还夹有不少封建主义的东西。

（4）在国家学说上，国家权力愈来愈大，国家管的范围愈来愈宽，国家机构愈来愈庞大。还发明了一个政社合一，把农民怎么种地，种什么，怎么种，多少行距株距都管起来。经济上，不是搞社会化，而是搞国家化。国家化的结果是地区封锁，条块分割。政治上，人民自由权利，甚至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官僚主义出了名。在党和政权的关系上，斯大林还批判晕党专政的观点，毛泽东则搞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实际上是包办一切；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

（5）在个人同党和群众的关系上，大搞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后期实际上是一个帝王的形象加上神的形象。这固然有林彪、康生之类的鼓吹，实际上是毛泽东自己的需要，自己提倡的。

——毛泽东放手搞这一套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把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看成是无穷的；他以为改变生产关系就可以发展生产力：他否定社会分工，如“五七”指示，各行各业都要亦工、亦农、亦商、亦学、亦军、兼顾别样。再有消灭三大差别，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不提高工农的科学文化水平，而是把知识分子赶下去劳动；为消灭城市差别，就让城市也搞农业，农村也搞点工业。毛泽东讲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他的这个“供给”也是供给制的“供给”，不是我们理解的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错误部分：一是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如片面的把人的因素夸大为“生产力的最重要

的因素"，否认生产力的发展中生产工具的最终决定作用；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企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脱离生产力的状况来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片面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把政治工作、思想教育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不论物质利益的作用，把政治工作、思想教育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否认物质利益的作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热衷于高指标，崇尚用自发的群众运动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二是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如片面夸大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作用，从而导致人为地去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人为地制造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把人民内部的矛盾看作是敌我之间的阶级对抗的矛盾；在强调不断革命论时，否认革命发展的阶段论。三是具有封建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特点。如鼓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把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说成"跟旧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差别"，提倡"大体平均"的平均主义，"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会带来个人主义的危险"，把按劳分配说成"跟旧社会差不多"；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鼓吹实行供给制，把平均主义的分配说成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他提倡禁欲主义，说"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加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实际上主张普遍的贫困；他颂扬落后的技术，轻视技术人员的作用，认为在没有高度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可以很快实行"共产主义"。等等。

——根据建国以后27年的言论和行动来看，毛泽东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也许他原来就没有弄清楚马

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原则，或者不承认有关的理论原则。实际上他是以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这种思想，愈到他的晚年表现得愈为明显。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这是讨论涉及的最深刻，也是最尖锐的问题，发表的看法也最多。

关于毛本人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犯这一系列的重大错误？根源在哪里？从思想上或说从理论基础上看，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也违反了他自己所说的话，如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曾警告全党在取得全国胜利后的那些话。他虽然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搞的是封建帝王那一套。如果讲王明等人是言必称希腊，他则是言必称秦始皇、刘邦，一直到去世前，还讲什么周勃、陈平来挽救国家。周勃、陈平恢复的是刘邦的一家天下。从政治上看，毛泽东是极力维持自己至尊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唯我独尊，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听不进逆耳之言。他喜欢阿谀逢迎，好大喜功等，对吹捧自己的人十分推崇，千方百计把这批人扶植起来，加以重用。而对刘少奇、邓小平等许多他长期艰危与共的亲密战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采取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极其恶劣以莫须有和突然袭击的手段（或叫权术），把他们统统打倒。其实，这些中央领导同志从来对他都是极为尊重，只是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根本不存在反他的问题。从1957年前后搞“一言堂”、“家长制”，严重脱离群众，好多重大事情都是他个人说了算，甚至出尔反尔，把错误推给别人。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主要原因：除了历史原因、社

会原因外，本人有封建专制主义、帝王思想。如对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同志就是如此。不能正确处理领袖和领袖、领袖和领袖集团、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不仅要当中国的唯一领袖，而且要当世界的唯一领袖，搞第三个里程碑。他自己宣扬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就是他一个人正确，听不进反面意见，谁反对他就是“反革命”。他在党内外都要权术，要手腕，他自己讲他搞阳谋，对很多老同志都采用了这种手法。这是一。二是他轻信重用坏人，又被坏人包围利用，如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都是他提拔、重用的，这些人又利用他的错误在党内大搞破坏。给他的权力太大了，吹得太高，抬得太高，神化了他，助长他唯我独尊，至高无上，党无法监督他。毛泽东过分强调意识的作用，后来发展到意识决定存在。“大跃进”，根本不顾客观条件，蛮干。经济政策不从客观经济基础出发。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把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谁反对这样干，就是保守、右倾、修正主义、反党。

——毛泽东片面强调斗争性、过分夸大主观、精神、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变动频繁，造成很大破坏。他不大懂得生产力，对自然科学并不重视。他的得意创作是阶级斗争哲学，老抓暴力、斗争、运动，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规定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三个存在的基本理论，发展到系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论断，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的错误思想体系，是“左”倾路线的核心，是理论上的大倒退。

——毛泽东早期就有形而上学、绝对化的东西，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里有辩证法吗？特别到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客观实际的认识已经走到了主观唯心主义。晚年的错误包括了封建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构成还多一条封建主义。

——毛泽东好大喜功，帝王思想极为严重。到了晚年，他所追求的，实质上是超过神与皇帝的绝对权威，并且要这种权威在他生前死后都不受侵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用封建权术文过饰非，排斥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鼓励个人迷信和造神运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史无前例的规模上，以专政的强制手段，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所进行的这种个人迷信与造神运动。

——在思想根源上，毛泽东帝王思想浓厚。他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非常熟悉，把封建统治经验接受过来治理国家。对个人迷信他是提倡的，他和斯诺谈话时说，不搞点个人迷信行吗？在党内制造派别，利用矛盾，控制一部分人，掌握一部分人，消灭一部分人。

——毛泽东有封建帝王思想，喜欢突出个人，当了领袖之后还要当唯一的领袖，也很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搞“大跃进”，是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搞个奇迹，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思想上，他想创造一个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防止变修的伟大理论，后来被林彪一伙称之为第三个里程碑；在“反修防修”的做法上，他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接受了国际共运中反面的经验，斯大林的三

条错误：肃反扩大化，个人专制，个人迷信。他的错误比斯大林还严重。为了巩固自己的威信、地位，大搞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大搞“文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导致全国大乱。

谈到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时，不少发言回顾了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夏衍回忆起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一件事。他说，我亲耳听到柯庆施向毛泽东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可见，当年那些“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等创举，毛泽东都是联系到他的世界领袖地位来考虑的。

有一位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1950年4月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

一位当时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1967年5月18日《红旗》和《人民日报》的联合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有一段是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的，大意说是这问题马、恩、不可能解决，列宁逝世过早，没有来得及解决，斯大林也没有解决好，是毛泽东正确解决了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先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又发展到毛滲东思想阶段云云。这里面，有一大段话是毛泽东本人在审稿时加进去的。

一位在外交部门工作的同志说：“八大”文件里本来写有毛泽东思想，因为鉴于苏联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教训，在八大文件里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此耿耿

于怀。1960年，林彪在军委扩大会上，重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一些发言者还谈到毛的作风问题。他整人很狠很凶，行为捉摸不定，在“文革”期间言行不一更为严重。如说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但又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实际都统统打倒了；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又说多年没打仗了，打一下锻炼锻炼也可以。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提法很多。这反映“左”倾路线在推行中遇到困难，造成了极大混乱，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后，无法解脱的矛盾心情。

刘澜波和我同在一个小组，因病住院，他的书面发言中说到毛泽东缺少自我批评精神。他说，毛泽东教导我们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我们却很少听到毛泽东做自我批评，相反，尽是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批评者。七千人大会上一方面讲民主集中制，同时又说：“全国几亿人，每人提一条意见，那还得了？”在那个会上的自我批评，也只是说说“高指标、瞎指挥，我有责任”。言外之意，责任还在大家，而对林彪“交学费”一说，则深得“我心”。还不只一次听他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

不少发言者追溯了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有同志说，延安整风就有“左”的倾向。有同志联系历史谈到延安的抢救运动。延安整风后来变成审干，搞抢救运动，这固然康生要负责任，但根子还在毛泽东。当时他讲了九条，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特务是个世界性的群众性的现象，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把特务看成群众性的，还能不扩大化？当时说特务如麻，就是这样来的。再往前，1930年第一次围剿前后，反对AB团，那时中

央苏区毛泽东是当权的。搞AB团也是够残忍的，也是扩大化。有些历史材料记载，说江西省委是AB团的总部，除陈正人、曾山等少数人外，一个晚上都抓起来，后来全杀掉了。听说当时中央苏区杀掉四千多人。后来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杀得更多，各苏区杀了几万人。内战时期的肃反运动，毛泽东开其端，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按：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结论时，已对打AB团一事承担了个人的责任，他说："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1930年1、1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① 一位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同志，1946年在一个口号中去掉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字样，毛泽东当时发了大脾气，说你这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删掉群众提出的口号，这人因而被打成假党员、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还有人在发言中谈了一件类似的事：部队一位负责干部，1960年在起草一个文件时，提出不要什么都提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便被毛泽东认为是坏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同他不了解世界、不了解外国有很大关系。他对世界形势、国际问题的一此失实的估计与过火的反应，导致对国内政策的极大错误。

——1974年2月在同卡翁达谈话中提到"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理论没有什么周密论证，同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不吻合。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晚年提出"小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16页。

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把战争的危险大大讲过头了；他只是片面强调国际局势中促致新战争爆发的因素，而没有看到制约或至少延缓新战争爆发的因素。

——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产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研究，也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就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否则就给你加上洋奴思想等等罪名。派到外国的新华社记者，也不敢如实写文章。若是如实写，就要挨批评，说替帝国主义作宣传。驻西德的一个记者就说过“文章不敢写，不好写”。西德战后破坏得很厉害，几家分尸把它刮光了。但在美国一百亿美元援助下，经过十至十五年的努力，经济已发展到世界的前列，在欧洲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它是最安定的，连大的罢工运动也没有，据说失业工人每月有 1000 马克的补贴，仍可作短途旅游。发言者对比中国情况，对于毛泽东不了解外部世界造成的后果深有感慨。

——毛泽东基本上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和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

对科学方面的无知闹出来的乱子，夏衍谈了“除四害”的问题。1958 年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列为四害，我们奉命大打麻雀，当时上海的生物学家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个世纪欧洲打麻雀，就造成了大规模的森林虫害，不要打。可是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当然未被重视。后来上海的科学家们解剖了几十万只麻雀，证明了麻雀一年中有三个季度吃的是害虫，只有秋冬之交吃一点剩余的粮食。1962 年，周恩来把这个科学实验的经过告

诉毛，结果呢，不声不响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这件事，似乎也没有科学家研究过。因此有几位科学家又提了意见，说臭虫是害虫，但它的为害远不及虱子，因为虱子是斑疹伤寒的主要传染者。连这一类小问题，也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建国30年来的教训告诉我们，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有权加无知。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生，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

——晚年错误除了毛泽东自身的问题以外，还需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几乎所有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自已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都出现过斯大林的类似的错误，而且在斯大林逝世后还继续犯这种错误。作这种分析，对国际共运是有意义的。

——孙冶方说，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在晚年为什么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从他个人来说，是他的宗法家长制思想，以后又发展到封建帝王的独裁思想；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力。英国阿克登勋爵说得好："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就是被这绝对权力绝对腐蚀掉的。从党和国家来说，就是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制度，允许党的领袖可以凌驾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党代会之上，允许党的领袖可以违反宪法上明白规定的制度，如停开人代会，宣布国家元首靠边站等等。

——毛泽东所以在后期作了许多错事，有其客观的发展过程。除他本人思想上存在帝王思想、平均主义、唯意志

论、封建权术的问题外，一方面是他的口号、威望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愿望，社会要求他这样做。小生产的经济结构必须形成中央集权制度，造成至高无上的皇帝式的领袖。无限的权力具有无限的腐蚀力。中国式的社会成就了毛泽东前半生的功绩，中国式的社会也铸成了毛泽东后半生的悲剧。1957年的“反右”，封住了社会上人们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同志的嘴。由思想专政进而政治专政。一个权力高度集中，机构臃肿庞大的国家；一个拥有绝对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党；一个主宰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领袖；一个包揽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必须产生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封建家长制、官僚主义，以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追逐特权、欺压鱼肉人民的现实。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我们党从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到广大党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全新的历史任务到来时，理论准备是不足的。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搞清楚。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就作出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在中国实现的决议，并向全世界公告。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于是空想社会主义以新的形式在我国出现，而且以这个空想的理论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在思想路线方面，唯意志论、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占很大成分。

第二，社会原因，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但是小资产阶级依然是汪洋大海。农民、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忍耐心，对“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有很

大的冒险性。这是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能在党内统治很多年的社会原因。

第三，党的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特别是在党内大搞个人迷信和毛泽东个人专制。

第四，国家的民主、法制极不健全。从国家制度看，我们受封建遗毒确实很深，名义上人民的当家作主，在实际上人民并未真正获得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的权利。国家机构的权力，得不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

李维汉的发言，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晚年悲剧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他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欣赏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皇权观念，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社会现象，它的基础是农民个体经济，是农民意识的表现。农民不能代表自己，要别人来代表。农民反对地主，但拥护皇帝。中国历史是自发的农民战争，出路是做皇帝，或者是自己做皇帝，最后归于失败；或者是别人做皇帝，自己拥护他。大革命失败后十年，毛泽东生活在农民中，结成血肉关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农民把他看成是自己的解放者和恩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农民心目中，皇帝最重要，领袖最重要。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有所察觉和注意，想防止个人崇拜。但后来，他逐渐走向反面，让《东方红》广播和歌唱了二十几年，“文革”期间还有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他越来越欣赏对他的个人崇拜。1964 年，当着几个负责同志，批评朱德同志“反个人迷信起劲”。这里有个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我们的国家是半封建社会，这个半不是一半一半，是七分封建主义，三分资本主义。能不从娘胎里带点东西？能

没有封建的病菌?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搞社会主义，抓阶级斗争为纲，不抓经济规律。他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苏联经济问题》；不研究经济规律；对知识分子，他提出“外行领导内行”，还提出按照世界观来划分阶级；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搞大炼钢铁小高炉，提倡吃大锅饭，恢复供给制，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实际是农民的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批所谓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搞成闭关锁国。1964 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 年就开始转到四个大破坏。钻到线装书里，搞他的所谓古为今用。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十年批“左”转到十年极“左”?毛泽东在民主革命阶段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从遵义会议以后，为了清算王明极“左”路线和“左”倾教条主义，花了十年功夫。为什么他晚年又走到极“左”路线，把他为这奋斗半生的革命果实，送上破灭的边缘呢?就他个人而言，有思想根源，也有历史根源。他在认识论上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他从没有犯过右倾路线错误，主要表现是“左”倾片面性。五十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疑是一篇代表当时正确路线的著作，长了革命农民的志气，灭了反动派的威风。但他提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宣传“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带有相当破坏性的赤贫分子（即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贫农一道当作革命先锋。这些“左”倾观点，在八七会议后的农民起义斗争中相当普遍地

发生了影响。对于事物的矛盾法则，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强调矛盾的绝对性（即斗争性），不强调矛盾的相对性（即同一性）；强调一分为二，否定合二为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八大二次会议时，就开始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后来发展到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到“文革”期间，成了唯意志论。

毛泽东的一生确是斗争的一生。五四时期就以论战出名。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十年生活在对敌斗争的处境中，锻炼出一身解数。军事斗争，达到神机妙算，能调动敌人；政治斗争，也达到绝招，有很大的无产阶级胆量、气魄。这两个方面都很高明，斗争经验丰富。但是存在决定意识，“左”倾片面性的认识论和长期对敌斗争的实际经验，使他养成一种爱好斗争环境，不善处和平环境的性格，反映斗争一个接一个。前几年的斗争还基本正确，1957 年反右就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打成敌我矛盾，最后到“文化大革命”成了打倒一切。

第四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对老一辈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他能用人，也能容人。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不同了，个人权威第一，因此他走到反面。特别是 1958 年以后，在他直接领导下批斗、批倒一些老干部，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打倒一切了。

李维汉说：“毛泽东晚年越老越反映出，他的思想意识中，潜伏有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主义病菌。

毛泽东与“总路线”的形成

1958年先后出现了三面红旗。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分开来说是“三面红旗”，其实三位一体。当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估产、全民动员、昼夜苦战，用“高潮”一类字眼已经不能显示出它的规模和气势，只能叫做大跃进。而总路线，既是这一场大跃进的动员口号，又是它的指导方针。人民公社这种将每一个人从生产到生活都管起来的准军事组织，就是贯彻总路线、实现大跃进的组织形式。三者缺一不可，缺其一即无法构成当年这一壮观无比的历史图景了。

这里只来探讨一下毛泽东提出这条总路线的经过。总路线的形成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因此先要谈谈冒进与反冒进的问题。1955年夏，党内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指责持稳步前进意见的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从而在党内发起批判“右倾保守”的斗争。这个斗争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几个月之内，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预定要18年完成的

农业合作化，竟然提前11年完成了。这件以批判开路，被人为加速了的事情，使毛泽东极为兴奋。他由此及彼，以为农业的改造可以这样，那么手工业的改造，其他各项工作也无不可以这样了。这年12月27日，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其中说道：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从1955年底开始，毛泽东认为在各方面都要开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结果，1956年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冒进的偏向。对已经出现的冒进偏向，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警觉，并试图纠正偏差，于是在国务院和党中央，也就不断出现了反冒进的声音。

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虽然也讲到右倾保守思想的严重性，但同时提醒说，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2月份，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发言时，又强调“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要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

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从这时开始，周恩来在经济方面抓了反冒进的措施，如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控制，压缩原定的1956年计划指标等。

5月份，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6月15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作决算和预算报告，其中说：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我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其中说：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的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

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这篇社论这样分析发生盲目冒进偏向的原因：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冰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紛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反冒进基本遏制了急躁冒进的势头，在中央、地方和各部门，稳步前进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党的八大改变了原来将反右倾保守作为中心议题的设想，大会提出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为：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中前进。这一方针反映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和关于“二五”计划建议中。这一改变，可以说是对前一段反冒进工作的肯定；所确定的上述经济工作方针，已经不是针对某一时期工作偏差的权宜之计，而是关于经济建设整个过程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了。

八大之后，反冒进仍然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主要围绕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的制定。

11月10日，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作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基调也是反冒进。他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计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不能定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还谈到毛泽东欣赏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的。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

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计，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说："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谈到错误，他用了一"冒"字："1953年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一下。"陈云对1956年的估计也如此。这年11月，他在商业部的一次会议上说："经济建设，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1953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他还指出："文章上写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这

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就很不容易。”

所有这些意见，毛泽东都是不同意的。事实上，对于反冒进，当时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内心一直持保留看法，也可说耿耿于怀。1956年6月那篇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人民日报》社论，草稿送给他审阅时，他批注三个字：“不看了”。

11月15日，就在周恩来作报告后的第五天，毛泽东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终于表明了对反冒进的不满。

他批评了李先念的预算报告。他说：“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为什么呢？他说：“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这不是语文教员给小学生讲授文章作法，他是忌讳这一个同急躁冒进相对立的“稳”字。

对于几天前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中的一些论点，毛泽东也作了反驳。关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计，他说：“从上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他用“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这样的话，表示了对反冒进的不满。

几个月之后的整风运动中，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批评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作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提出

了保守和冒进何者的危害更大这样尖锐的问题，对 1956 年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以及造成的偏差，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在整风运动转向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党内的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了起来。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批按语》中说明了这种联系："我们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1957 年 9 月到 10 月举行的八届三中全会，一方面是总结反右派斗争，一方面是反反冒进的正式开始。10 月 9 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就来算 1956 年反冒进这笔帐了。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叫"冒"了。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他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已经有所表示。到了三中全会上，反对反冒进更成了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到了 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上，反反冒进就成了会议的主题了。

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的南宁会议，有两大内容：一

是毛泽东对过去经济工作的批评，主要是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二是讨论和制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在11日、12日、13日、16日先后作了四次讲话，并在听取汇报时，插了许多话。他在这些讲话和插话中，对反冒进作了严厉的批评：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就‘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钱花多了，计划大了，要批评，我也批评过，如广东、河北通县专区产量定得过高。我是‘抱着石头打泡泅’（打泡泅是湖南方言即游泳），做事历来是稳当的。”

——“十个指头是关系六亿人的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讲，总是九个指头是好的，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搞泄气，使整个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问题。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叔通也讲过：‘我看方针是冒进为主，保守为副’。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之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年产）。‘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

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喜怒无常’，有常，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恢复‘冒进’。看来‘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修水利，1956年1700万亩，1957年200万亩，1958年（准备搞）2700万亩。治淮河，七八年共花了十二亿元，只做了十二亿土方；安徽去冬今春八亿土方已超额完成，决定再做八亿土方，一共不过用几千万元。双轮双铧犁，浙江发动全省讨论，浙江、安徽、两湖都能用，要为双轮铧犁恢复名誉，重新启用。扫盲，路上挂识字牌，还要坚持。”

——“我乃罪魁祸首。1955年12月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反了右倾保守，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各地大小报纸刊物都登了。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大家劲都很足，谈十大关系，就

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省年吹掉了三个东西，没有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就又有了勇气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那篇《要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使得会议空气极为紧张。他说：

"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9与1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按：社论引了这一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为了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从北京取来了原稿。在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稿子上，除胡乔木、陆定一的修改之外，还有刘少奇的几处修改，这些修改加重了原来的语气。这样，刘也就同反冒进有了牵连，也成了个有过错的人，从此更不便

在毛泽东跟前说话。可以说，南宁会议以后，也就开始进一步形成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地位。

南宁会议上辞严色厉的反反冒进，实际上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提出，做好了思想准备。有了这个前提，总路线也就呼之欲出了。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工作会议，有部分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并在一些人发言时插了许多话。3月9日，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第13个问题是：

“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如除四害，一种是老办法，不除（苏联不除）；一种是要除掉。如何除？也有两条路线，有快有慢。一说快除，就能除掉，越慢越除不掉。如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是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比1957年多一倍，1958年要超过1956年一倍。湖北今年积160亿担（1957年70亿担），平均每亩6600斤。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搞‘马克思主义’，生产不起劲；今年搞‘冒进’，还要超过1956年。哪种办法好？1957年‘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办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方法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当然不行。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第16个问题提出“跃进’的口号：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 150 斤，1956 年提出要一年内就产 800 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 义。这也无大害，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没有具体措施，工农商文都可能有此情况。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这样的一种说法：对虚报、空喊，也不要泼冷水。高指标实现不了，屁股也不要打重了。这就实际上为不久之后遍及全国的高指标和高产卫星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第 25 年问题，宣布了反“反冒进”目的不是整人。他说：“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南宁会议提出，反冒进是个方针性质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在大家有共同语言，绝无要使哪一个同志不好混之意，而为了做好工作，好混，绝非不好混。目的是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冒进上来。有了冒进的共同语言，就好混，绝非不好混。”

没有参加南宁会议的陈云，在成都会议上不能不作有关反冒进的检讨。

在 3 月 10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和两种不同的反个人崇拜，他说：

“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掩打倒个人崇拜（有的是过去压力残余，心理状态复杂）。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

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

3月18日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说是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一天等于二十年"。毛泽东在他发言中赞许地插了许多话，举出修水利，渤海区一个合作社的一些数字，印证陈伯达的话。在插话中，毛泽东还讲了这样的意见："'反冒进那个时候，同志们倒不是不赞成搞生产建设。156项，800多项，都是要搞的。只是当前遇到困难怎么办？相当限制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当作理论性的问题提出，市场和基建，搞几个平衡，恐怕就不妥当。"

"两个速度分歧：一个改造速度，同邓子恢；一个是建设速度，冒进派与反冒进派。我是'罪魁祸首'，就是写了这篇序言，又提出几个口号，一个农业四十条，一个促进委员会，一个多快好省。不促进岂不变成国民党？这是1956年1月党 的知识分子大会上，到了一千多人，我在会上放了一炮，说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形成有个过程，开头只有多快好，'省'字是富春同志加的，那是1955年。四十条是一个积极的农业纲领。农业发展了。工业就有了市场，有了积累，寄很大希望于农业。这四十条也是大家谈出来的，开始只有十五条、十七条。大家都很积极，包括我们总理和陈云同志。1956年预算，基建费搞大了，市场问题一来，有些东西就压缩了一下，是应该压的，基建那时不压缩一下也不行。问

题在连带把这三个东西都吹掉了。三中全会开会前，在休息室时，我同我们几个常委谈了，把多快好省、促进、四十条吹掉了。全会讲话时，我就捅出来了。会场那么多人，都不敢进，不敢提多快好省，可见那时候的空气。我还讲到，只记得郭沫若在哪次讲演中还提到多快好省，我说只剩下这一个知己。我讲完了，会场还是鼓了掌的。鼓掌不是反对，而是赞成嘛。后来也没有一个人写信给我，对我讲的表示反对。所以，我说这三个东西复辟了。复辟了，我就有劲了，有三中全会的合法根据。在杭州、南宁会议上，我就发难，就大讲了一气。”

陈伯达谈到，现在是跟帝国主义争时间速度的问题，毛泽东插话说：“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可以这么看，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假如帝国主义都搞掉了，也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干劲十足，群众路线，在轰轰烈烈潮中前进；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也可以是这样一种路线，‘凄凄惨惨、冷冷清清’，那并不见得好。这是宋朝女诗人李清照的一首词。她是个寡妇。这首词可能是金兵打杭州，把宋高宗追到海里头那个时候写的。是以一个寡妇面孔、寡妇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以另一种心态建设社会主义?”我参加了成都会议，当时对于这样解释这首词颇不以为然。外敌入侵，国破家亡，诗人把个人生活中的不幸和国家的受难交织在一起，吟成这首千古绝唱，把它看作寡妇心情的代表作是很不恰当的。我曾把这意思同田家英谈过。

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建设的高速度，成都会议一边倒的局面，反复重申速度问题，也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 3 月 20 日的讲话，第一次把总路线完整地提了出来。他说：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地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会上，陈伯达受命对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了文字表述。

回顾历史，真是令人感慨不已，就在这一篇讲话中，毛还流露出了一点犹豫的心情。他说：“路线由群众斗争和我们思想反映已开始形成，但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正是形成正确路线的必要条件，二者的对立统一”。

在 22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希望人们讲真话。他说：

“我很高兴，最近出现的大字报表现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生动，反暮气、庸俗空气一扫而空。而我们呢？老是穿着粉底朝靴，四平八稳踱方步，‘逢人且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不敢暴露自己的缺点，不敢批评别人的看法，就是说，也是吞吞吐吐，毫不尖锐。恩来在 1956 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5 月 5 日至 23 日在北京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跃进”的开始。会议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会

议作了工作报告。这篇报告经过毛泽东两次修改补充，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说的那些意见有条理的综合。会议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四次话。在会议闭幕那天他这样讲到总路线：

“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有些人对多、快、好、省的方针还不清楚，到底对不对，有怀疑的，反对的不少。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经过一些时候，经过反复看，才看到了。总的形成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以后是不是没有曲折了呢？不会的，还会有曲折的。这次大会制定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去证明；虽然经过去年冬天今年春天的大跃进，已经有所证明了。过去三年是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了。有了这个变化，我们这次会就开好了。”

又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个提法很好，是新鲜的提法，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就鼓起来了。问题是足不足，至少要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了。‘鼓足干劲’是个新话。‘力争上游’从前也有，不是新话，但是现在有新意。”

他举了一些实例说明什么叫力争上游，例如原来规定要十二年实现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可能在五年之内实现，有的省甚至说一年可实现，在对外宣传时说二年实现，留有余地。从国外来说，就是争取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超

过美国，如此等等。

总路线提法上有“多、快、好、省”四个方面，但实际上，不仅后来的实践，即在最初理解上也只是一个“快”字，突出一个“快”字。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就说得很清楚：“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社论反复强调“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这个思想。而当时人们也主要是从“快”的方面来理解和掌握总路线的，这也是总路线的首倡者的本意和真谛。所以，讲了“多、快、好、省”四个方面的总路线，是只讲“快” （或者还包括“多”）而不顾“好”与“省”（或忽视“好”与“省”）的总路线。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不只一次讲了要破除迷信，讲了青年人胜过老年人，讲了学问少的超过学问多的，并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的一个“公式”，认为“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他让编印发明家的传记来证明这一点，以此来“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丢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

毛泽东的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这一些，是为总路线的贯彻和大跃进的开展作舆论和宣传的准备。实际上所谓破除迷

信，就是“破除对科学知识的迷信，破除对工程技术人员的迷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方面是进一步贬抑知识分子，一方面是为科学知识不多的人壮胆。敢想敢说敢做，就是敢于胡思乱想，胡言乱语，胡作非为。这些号召，为“大跃进”中那些千奇百怪的新生事物开辟了道路。像大大超过常识的农作物产量之类，如果不破除迷信，不敢想敢说敢做，是绝对无从出现的。

毛泽东说了，目的不整人。可是，不整人则无以立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严厉处分了一些高级干部。只说毛泽东在讲话中点了名的，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的，就有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孙作宾。此外受到处分的，还有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更是在这次大会上受到批斗，被撤销了职务，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处分了这样一批高干（古大存、潘复生是八届候补中委），你怕不怕？这种政治上的压力，促使到会代表思想统一到总路线、“大跃进”上来，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条总路线提出到今天已近40年，它在历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呢？回想1980年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时候，多数人对造成一场巨大灾难的“大跃进”，对于破坏人民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的人民公社，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于“总路线”，一些人却认为应该与前两者有所区别，不应完全否定。我的看法是：

第一，不能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就认为它包含有正确的成分。任何一种认识、政策、方针，都是对客观的反映。问题是反映有正确和错误两种，正确的反映是对客观现实的合理认识，错误的反映是对客观现实的片面认识甚至曲解。总路线虽然反映了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反映现有国力难以迅速实现这些愿望和要求的客观现实，因而有严重的缺陷，导致实际执行中的灾难结果。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书中对几次错误路线的分析，对我们是极有启发意义的。他指出，那些犯路线错误的人，他们“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良好的愿望并不是路线正确与否的决定因素。

第二，诚然，这总路线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很好的好话。但是我们判断一种政策，一个方针，不能只看它用怎样的字句来表述，而要看它的实际内容，看它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前面已说过，总路线是在反反冒进的形势下形成的，以突出“快”字为中心，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和缺陷，在实践中主要起的自是负面作用。

第三，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三面红旗”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总路线”是第一面旗帜，是“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方针；而“大跃进”运动则是总路线实施的产物，也是总路线在实践中的必然产物。“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也就是总路线所造成的灾难。

北戴河滩八月潮

1958年7月23日，我接到中央通知，定于8月13日在北戴河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参加，要求8月12日报到。过了几天，8月1日，又接通知，为了给各大协作区留出时间再开一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推迟三天举行，改在8月16日开始，8月15日报到。

我给毛泽东写的第一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以及电力难以相应保证计划的完成。其时，毛泽东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之上，根本听不进去，未予理采。我对北戴河会议抱一种观望的心态，而且竟有些“闲情”：盛夏酷热，难得到海边避暑，我也是第一次到北戴河。于是，让人将两个孩子也带来住了几天。

会议讨论的问题

去北戴河之前，中央的通知就附了17个要讨论的问题：

1. 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2. 今年铁、钢、铜、铝问题。3. 明年农业问题。4. 明年水利问题。5. 合作化问题。6. 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7. 教育问题。8. 干部参加劳动问题。9. 劳动制度问题。10.570 万人去边疆问题。11. 技术保密问题。12. 国际形势问题。13. 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4. 协作问题。15. 深耕问题。16. 肥料问题。17. 民兵问题。

在这 17 个问题中，中心的问题是当年的钢铁生产和建立人民公社（即第 5 个“合作化问题”）。

八大二次会议开过之后，“大跃进”运动进一步升级，高指标风和浮夸风弥漫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修改和提高指标成了一种“竞赛”，刚刚确定的指标很快就被更高的指标突破。而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指标，成了这场指标“竞赛”的龙头。5 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计划提出，1958 年产钢 800 万吨；5 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提高到 800—850 万吨；6 月中旬计委又涨到 850—900 万吨；同时毛泽东提出翻一番的设想，要把指标提高到 1100 万吨。不到一个月，钢指标涨了 3 次。

与高指标相伴而生的，是竞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粮食高产“卫星”的竞放，尤其喧嚣一时。北戴河会议前，早稻亩产放的最大“卫星”，是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的所谓“天下第一田”亩产 36956 斤；花生亩产的最大“卫星”，是福建南安县胜利乡，亩产 10000 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是祝贺“双星”高照。粮食“卫星”的腾空，竟使毛泽东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还要人们“一天吃五顿”。8 月 12 日，毛泽东视察天津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

有了这两件东西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时在他看来，粮食的事情已经办好了，不是生产而是如何消费的问题了；不是要扩大耕地，而是要少种一些地了。

但是钢铁的事情还没有办好，截止6月底，全国钢产量完成312万吨，仅为年计划的27%。7月份，冶金部直属的大企业仅完成钢产量月计划的86%；11个省市没有完成月计划，而到年底只有4个多月了。毛泽东为粮食问题兴奋不已，对钢铁问题则忧心忡忡。钢翻一番是他的主张，话已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只有背水一战，拧紧钢铁生产的“发条”，下死命令：钢产量一吨也不能少，必须确保翻一番。

我是16日到北戴河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开预备会议，李富春谈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我的情绪不高，但记录还是做了的，有的还记得比较详细。)

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先讨论1959年和“二五”计划的指标，再作决议。会议分10个小组谈。

二、投资方案问题。对目前这个方案主要有意见的是华东。华东根本不同意（中央对华东的方案是：财政收入194.66亿元，投资额83.1亿元)。他们提出的投资额为92亿元（不包括铁道、交通、邮电)，财政收入为196亿元。1959年的指标与投资项目能否保障？明年要保证2700万吨钢。财政不能上，投资下不来。财政不上，基建能不能降下来？

三个方案：第一，都降下来。第二，钢2700万吨及直接有关的指标不降，其他指标作压缩。第三，根据财政收入

700亿元，基建投资480亿元的计划，再超过一点（财政收入可增加一点预算外收入。农业积累、农村生产资料有问题）。倾向于第三方案。大区表示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工业与农业，大、中、小项目，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四个并举的问题，从全国看是贯彻了。(1) 现在农业过关了。但工业跟不上，工业赶不上农业，为农业服务不够。(2) 项目确保的多，机动的少。中小项目靠自筹。大、中、小，在项目表上来说明。轻、重亦如此打算。(3) 中央和地方并举，中央管的企业少了，90%的企业属地方。中央与地方实质已变了，中央管的企业很少。(4) 沿海与内地注意到了并举。从局部看，华东这点体现不够，有缺点。

三、重点和一般，后者比例少。都摆上重点，不仅没有机动了，而且保证“元帅”还不够。现在的计划，收入打高了，要把投资限死，两头卡死。20%左右的机动，在项目中未能表现出来。有些重点项目交地方。项目要再审查，看站得住不？小平提出，把若干重点项目变成机动，这样可多一些余地。机动的比例20%—30%。

四、重点问题是华东。与各省重新审查项目，辽宁、黑龙江、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北京、四川、云南、甘肃共10省市，向华东调整。

每个部都有个别问题，加起来变成部分问题，项目摆得不全。石油、化工、建材项目安排没有问题，直属企业安排妥当。山西的煤运不出，还要投资？石油投资定得是否高了？机械基本来个平均主义，不分等级，除几个重型（企业）。续建、扩建的项目可以快些。资源、国防尖端、铁道干线可彼可此，摆得不平均，要调整。

要求增加投资40—43亿元，其中东北10.5亿，华北4.5亿，华东18.7亿，华南4.7—6.7亿，西北5亿。财政收入要求减少19.49亿元，其中华北减少5.13亿，东北减少16.58亿，华东增加2.2亿。计划调整后，铁产量增加975—1075万吨，钢产量增加495—545万吨；铜产量减少2—4.5万吨，铝产量减少2.1—2.6万吨。

这个方案本来就是由于华东计划会议提出高指标（包括华东钢产量翻一番）后，毛泽东大加欣赏，逼得计委、经委重新调整修订的。而柯庆施仍不满意，还要追加投资，使得计委、经委产能不再次作调整。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开始。地点在北戴河中直一分院礼堂。第一天的会是下午3点半开到5点，记得有80多人参加。主要是毛泽东讲话，他这样讲到会议要讨论的17个问题：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些，同志们还可以出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计划问题。这是重点、主题。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工业会议，农业、商业也有一点。发下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大家来进攻，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的问题，也是工业问题，铁、钢、铜、铝的问题。钢由1957年的534万吨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到年底只有4个月13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没有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催回电话，保证完成。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生产安排问题，由谭震林负责准备一个文件。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谭震林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第三至第五个问题，由谭震林负责。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粮食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问题。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6500亿斤，一说7000亿斤，6.5亿人口，每人1000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1500斤，后年2000斤。是否搞到2500—3000斤，这是方针问题，大家议一议。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我看超过3000斤就不好办了。(谭震林插话：想搞2500斤。)

第七个问题，教育问题。陆定一同志写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作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作官，官作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这么多干部子弟。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

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和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邓小平插话：干部参加劳动的决议，我和乔木负责。）

第九个问题，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570万人去边疆问题。从明年起，搞570万人去边疆。

第十一个问题，技术保密问题，发一个指示。

第十二个问题，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题目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究竟是什么性质？紧张局势对谁有利？中东的英美军队是早撤好还是多留几天好？禁运对谁有利？联合国承认有利还是不承认有利？到底谁怕谁？谁怕谁多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内也不是完全解决了。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有人就对东风压倒西风发生怀疑了。说：可见东风未压倒西风，否则美英在中东怎敢登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党内外都有怕西方情绪，有恐美病。谁怕谁多一点？恐怕还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世界上有三个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一派是民族资本主义，一派是压迫别人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可是它一反帝，就变成我们的后方。印、埃两面都搞，但比较对我们有利。我们两个主义站在一块，力量就大了。原子弹双方都有，人民力量我们大，因此不会打。但是也可能打，我们要准备打。垄断资本也难说，其中可能出疯子，假如它要打，是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横起一条心，对敌人用黑心，拼命地打，打烂再建设，讲清楚不怕打是好的。

对北大西洋、马尼拉、巴格达三个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我们在宣传中说它是侵略的，因为它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侵略；但是，不要看得了不起，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向我们进攻，即我们出了大乱子，反革命把我们推翻。匈牙利的反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他们不敢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中，我们中国有七八千万吨钢就巩固了。帝国主义那些条约，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是患了肺病的钙化组织，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巴格达条约搞了一个洞，中心突破，伊拉克一天早晨就变了。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渗透，我很赏识赫鲁晓夫说的他们怕我们穿过去，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是薄板墙，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北大西洋公约是比较巩固了，是整中间地带的，他们没有机会整我们，就整中间地带，并且互相整，英美整法国，又限制西德。我们宣传反对紧张局势，争取和缓，好像和缓对我们有利，紧张对他们有利。可否这样看：紧张对我们比较有利，对西方比较不利。紧张对西方有利是能够扩大军火工业，对我们有利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7月14日早晨，伊拉克的盖子揭开了。紧张可以使各国共产党增加几个党员，可以使我们增加一些钢铁、粮食。美英在黎巴嫩、约旦晚走一些时好，不要使美国变成好人，多呆一天就多一点好处。抓住了美国的辫子，有文间章好作，美帝成了众矢之的；但宣传上不能这样讲，还是讲立即撤退。

禁运越禁越好，联合国越不承认越好。我们有经验，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给我们40万元，大家靠这点钱过的，没想办法，等钱买棉衣。后来蒋介石、何应钦不发给养，不给钱，我们提出团结自给，发动大生产，搞出的价值不只

40万元，棉衣也穿上了，比何应钦给的多得多。那时如此，因而现在各国禁运也有利。最好再过七年再承认。我们头一步需要七年，七年计划分三段，第一段苦战三年，第二段再苦战两年，再还要两年；那时我们可以搞到1亿到1.5亿吨钢，可以超过美国。这期间最好不要请我们到联合国去。前面有一个敌人，紧张对我们有利。

第十三个问题，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要搞大辩论、大字报。要有一个文件。

第十四个问题，协作问题。是东北欧阳钦提出的。大区协作。

第十五个问题，我提出的深耕问题。这是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不深耕，水装不了，肥放不进，不能分层施，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在深耕一尺，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耕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有除虫，草翻到底下又可变成肥料。这样一来，一亩可以当三亩。我们的土地多了。现在全国平均每人三亩地。我们向下边刨，就可以高产。苦战三年之后，土地的观念要改变，种那样多的地干什么？将来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小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果不深耕，就没有这种可能。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是人少，不是人多了。过去我说搞8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也不要紧，不成问题。但也不要提倡多子女。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会真正节育了。

大概三六十八亿，我看不会多。多子女的，实行邵力子、马寅初的办法，不然成航空母舰了。

第十六个问题，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民兵问题。协作区或较大的省可以生产轻武器，如步枪、机枪、轻炮等，武装民兵。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造那么多枪可能浪费，因为我们不打仗，浪费点也要搞。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四人发一支枪，全国共需一亿支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

会议形式大中小，今天算大会。明天下午3点，你们开战。

讨论计划和8月19日讲话

第二天开始讨论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邓小平主持，参加的人比第一天多，有一百多人。李富春先谈了两上计划草案的起草经过：五九年计划和“二五”计划，是第一次大协作区会议以后，计委、经委的同志经过五天搞出来的，提交政治局作了初步讨论，然后又经过第二天的突击，第二次提交政治局作初步讨论，作为初步草案提交各大协作区会议。李富春详谈了6个方面的问题：一、1959年计划的根据。二、700亿元的收入，480亿元的基建投资。三、工业布局，项目安排。四、1959年的计划方案。五、计划定了如何保证实现。六、“二五”计划如何制定。

刚开始讨论计划问题，8 月 19 日上午，毛泽东就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作了讲话：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全国、省只能搞一个计划），重点建设，枝叶扶持”。天津专区办了一个 4 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由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1962 年搞到一亿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年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要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销到别处去。不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一百万吨钢，运到那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中小型的各省都可以搞一点。

所谓地方分权，各级（省、地、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

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要种到这样多的薯类？棉花要不要种那样多？明年再鼓一年劲，粮食搞到每人1500斤再看。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网。一万年后，人多，汽车多，上街也要排队，飞机多了，空中交通不管也不行。在猴子变人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往后愈来愈不自由了。另一方面，人类大为解放，自觉地统治宇宙，发掘出无限的力量。

社会主义，农民会先走一步。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不分等级了。

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储粮一年（每人500斤）。红薯可以减少一点。

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性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大鸣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在公社，国际形势要讲帝国主义可能要打大仗。全国是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2700万吨要完成，今年1100万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人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天津市有100万人能参加劳动而没有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才能基本实现机械化，机械化了，劳动力才能彻底解放。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

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查。钢铁专门小组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以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如种棉花要整枝打枝保桃一样。这们会不会损伤下面的积极性呢？合作社不搞钢铁可以搞别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遥津》就不能同时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

钢铁铜铝及其他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拼命干。不拼命不行。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

派人到越南去时，我讲过一句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上的，是劳动人民的；打敌人也不是胡志明的事，是地球上的事，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的就埋在那里。将来我们要搞地球政治协商会议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才有可能。现在两个阶级各有各的计划，将来作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彼此，帮助困难的地方一个钱也不要。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共产主义道德不能按

钟头计算工作，要按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河北省计划 15 岁的人 15 年以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的觉悟就高了。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没有当过兵的要当一下，当过兵的再当一下也很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当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拼命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

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要搞点政治。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好搞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搞大公社统一计划，重点建设，枝叶去掉一些，就是政治。

毛泽东的讲话反复强调要抓工业、抓钢铁，强调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唯头头是问，反映了他的一种焦虑和担忧的情绪。他对上上下下忙于定指标、定计划，却疏于抓生产、抓落实，以至于他最关心的钢铁产量的计划都完不成，心中十分不满，所以才要求"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对各省由于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紧张而自行调拨物资，甚至直接以物易物，也很恼火，所以才讲"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讲话的当天下午，会议继续讨论计划和工业生产问题。刘少奇讲话强调统一计划。他说：全国一盘棋、一本帐，都应列入全国计划。我们发展的基本方向，各地方要走

向平衡。各地方一部分或大部分都能自给自足。应集中领导，集中调配，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邓小平讲话要求确定一个计划，保证重点，言行一致。

李富春发言说，今天上午主席、下午少奇指示，对我们计划工作的同志启发很大。根据主席、少奇指示，提出的四点调整计划：(1) 调整项目；(2) 增加收入和投资，调整收入和投资；(3) 保证重点；(4) 预算外的各省要做计划。他谈了 1959 年计划的根据：(1) 贯彻总路线和三个并举。(2) 苦战三年，保证在“二五”计划内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3) “二五”计划内基本上要首先建成各大区的工业体系。(4) 明年的具体要求：保证生产钢 2700—3000 万吨，1960 年 4500—5000 万吨，以钢为纲，苦战三年，争取 5000 万吨钢。(5) 对 1958 年的估计，农业大跃进促动工业大跃进，粮食、棉花基本上过关了；工业是四五月份才开始跃进的。因此，工业还要努力。钢 1100 万吨，一吨也不能少。全国收入 700 亿元，基建投资 480 亿元的方案，是积极的还是保守的？从财政收入上是不保守的，如果加上预算外（投资）的 100 亿元，就是 580 亿元，等于“一五”计划的全部投资。要布置大后方，西北西南的铁路干线。根据主席的指标，争取七年时间，1960 年钢 5000 万吨，1962 年 8000 万吨到 1 亿吨，1964 年 1.6 亿吨。（刘少奇插话：是否设想搞个十年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五个计划某些方面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不可以设想，公社化了，粮食问题解决以后，吃饭不要钱；棉花问题解决后，穿衣、鞋子不要钱；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衣食住行都不要钱，就全面向共产主义过渡。李富春还说：统一计划，分

级管理，保证重点，全面规划，多快好省。主席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钢、粮、机械、铁路、电力），1962年保证8000万吨钢，扩大再生产能力就世界第一了。

8月21日讲话和讨论钢铁、公社问题

8月21日上午，毛泽东第二次在协作区主任会上讲话，主要谈钢铁和人民公社问题。保证重点，明年搞2700—3000万吨钢，50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拼命干。本星期抓一次，今年还有19个星期，要抓19次。24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1100万吨钢，必须保证完成。经过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者有铁拿不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就要执行纪律。纪律处分有六种：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1100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检讨。有些人不懂得，不完成11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拼命干”三个字下面要加着重点。上海有10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冶金设备——高炉、平炉、轧钢机，以及发电机和重要欣路、重点工程、车床和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一省只

能有一个头，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一个人也不准乱跑。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协作区之间，省与省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一点。还有 133 天 19 星期，要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

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河南对我的感动很大，修武全县 29000 多户，13 万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力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秋收翻一番，群众就看出好处来了。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样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红安经验，就是一个典型。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

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乔木、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身体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以来，身体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稣教清教徒的生活很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是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的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

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向云南的一个师长学习，一年当一个月的兵，我看这是好办法。应该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散的军队。

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人先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搞阶级斗争，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

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同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北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河北实行军事化是习惯这一套。南方有许多地方没有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去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一个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兴奋，"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步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

共产主义的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两本有关文件看一下，把实践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个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钢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1100万吨钢以外，允许机动，如果树、棉花要整枝，其它就不整枝。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准备100亿元冲击，使合作社的冲击力有东西可冲。国家保证2500万吨钢，剩下500万吨由省、地、县去安排，能超过一点更好。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难于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设几个书记。

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过这个话：我就是抓钢铁，这件事与我有关。所以几次讲话，他首先讲的、反复讲的就是钢铁问题。为了实现1958年翻一番的目标，他到北戴河以后就找陈云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谈钢铁问题。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作第二次讲话的当天，陈云向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钢铁问题的意见。

陈云说：头一天各省市同志到了之后，到主席那里去，他说少一吨都不行的，少一吨就失败，要他们当夜打电话。这是生产方面的情况，他很担心。主席有所批评，主席批评中央的一些领导机关，经济小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中央各部，现在都忙于搞计划去了，没有机关搞生产，这样不行。主席这个批评很对，马上就改正。有些工厂生产没有完成，原材料调不动，这样对生产不利。主席说如果发生这种现象要有纪律，这样大规模的建设，没有纪律不行。前天晚上搞了半夜，对钢铁情况的估计，7月份380万吨，主席指出很危险，要敲警钟，因为相差很远，380万跟1100万，差800多万吨。6月19日开各大协作区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530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日才决定搞1100万吨的，这样的指标布置下去都是很迟的。

8月22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说：今年的钢铁生产计划能否完成很担心，7月份只完成了380万吨，离1100万吨还很远。钢铁第一本帐620万吨，第二本帐710万吨，第三本帐是八大二次会议850万吨，第四本帐是6月19日1100万吨。第四本帐下达时间很晚，许多大工厂都没有完成任务，原因之一是从部起相当多的工厂偏重于搞计划，忽视搞生产。主席批评是很对的。二是调度不灵，一种是许多小高炉由农民搞的，掌握生产需要一定时间，生产不稳定。另一种是许多厂子的生产没有完成，原因是成都会议提出分成，工厂按分成比例留下使用了。再有一种是许多厂子

是6月15日下放的，上下交接在过渡，同时冶金设备不能正常供应，有些厂子得不到原材料，不能迅速生产。

陈云说：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八条指示。一、抓生产，经委由薄一波负责，主要抓生产，王鹤寿、赵尔陆也抓生产。二、原材料的调配也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超过计划部分地方还是分成。三、抓设备，尽快地把设备安装起来投入生产。四、机械工业收到材料后，第一是制造炼钢炼铁和轧钢设备。五、各省、市委每个礼拜抓一次钢铁生产。六、冶金部的直属厂在加50万吨的任务，作为保险系数。各地也要有这个计划。七、调拨材料生产要有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留党察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八、开一个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在北戴河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戴河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央又从8月25日至31日在北戴河召开各省、市、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除了工业书记外，各省、市、区的计委主任和有关厅、局长也参加了会议，专门讨论1958年的钢铁生产的问题。

8月22日和23日，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农村工作，重点是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谭震林对会议准备通过的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作了说明。他说：分六次召开了农业书记会，向中央作了汇报，在中央、特别是在主席的指示下制定的九个文件，比较大的三件：一是人民公社，一是积累与分配，一是储备粮；其余较大的是今冬明春社会主义教育，1959年的计划，至于水利、肥料、深耕是带技术性的。还有一个，农、林大专院校准备迁到农村去，这是主席指示

的，准备讨论的。

谭震林说：人民公社，先要大，小了不行；另一个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名称也有各种各色，有的叫国营农场，有的叫共产主义公社，有的还叫农业合作社，但规模很大。这个问题，我们向主席汇报了，相据主席的指示，写了这么一个意见，这个意见送到主席那里又改了一下。昨天晚上主席改了，文件先印了。这个东西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虽然以前也有大社，但并不太多。成都会议作了小社并大社的决定。会后各地方采取了一些行动，比较快点的是辽宁、广东，接着是河南、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也作了规划，其他省份也作了些规划。并得快的是辽宁，全省都并完了，一个省并成 1400 个社；河南现在差不多也快并完了，全省原来是两千多个社，并成一千几百个；河北估计 8 月底也完了。积累和消费问题，生活水准放在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水平。五九年计划，第一步每人 1500 斤，第二步每人 2000 斤。

关于公社问题，刘少奇在讨论时插话说：大城市郊区再不要搞工业了，把农业和原有的工业结合起来。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社的规模大小和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不要强迫，要大鸣大放。建立公社有些地方要分两步、三步走，有的地方不必要。公社建立后商业就不必要了，只要一个批发部。关于公社的问题，刘少奇早在四五月间同毛泽东就讨论过，而且意见相投，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但在步骤上多少有些不同，刘主张更稳当些。

就我自己来说，当时关心的是工业，钢铁翻番持怀疑态

度，电无法保证。公社问题可以说根本不关心。记得公社问题的决议通过后，黄克诚对中南组陶铸、王任重、周小舟几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公社挂个牌子算了。黄老遇事稳重，他很怀疑这种一窝蜂搞公社化的做法。

8月24日讲话和会议讨论

8月24日，毛泽东对各协作区主任作第三次讲话。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得比今年大还是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干一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成灾，不要怕粮多就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得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去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陶铸插话：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

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其中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苏联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表现为王鹤寿、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20%中央管，80%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60万吨搞到130万吨钢，第二期就可以搞到300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请大家好好想一想，是群众积极性来了。王鹤寿管的时候，实际上是设计员在专政。这晨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便发展了。

死、活斗争问题。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不行，统的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五九年的钢如果是2700万吨，2500万吨必须卡死，200万吨是活的。如果3000万吨，就有500万吨是科学研究的，如果超过3000万吨，还可以分成。食油多的多吃，小的少吃这就活了。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科学研究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中央究竟谁当

家？大权独揽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是冤各有头，包工包干，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百好人中夹一个坏人，这就自然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130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影响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业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上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00人的大会（按，指五八年军委扩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

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

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售制，负担 48%，限制农业 40 年不发展。我们只拿 5%—8%（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民食足，军食孰与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要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民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用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 10 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真理在下级，就上级服从下级；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先生编得好，先生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青年研究人员，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张道陵每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逐步实行，暂时不定，五九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吃、穿不要钱，不一定要等到第三个五年。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好一点。河南搞 80 亿土方，粮食翻一番，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国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好的影响，对帝国主义国家是个大的打击。如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回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了，别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世界都要搞千斤亩，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

是邓小平发了一个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还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167种，已经找到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氢一碳，屁是二氢一硫，石膏是硫化钙。就这样一点来说，都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河北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的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来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到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年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 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代替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市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1952年还好，1953年到1956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700万生产工人、2000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

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当作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都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头把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济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1955 年我就提倡大社。全国搞 1.5 万至 2 万个社，每社 5000—6000 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2—3 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段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一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县平均 2 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话（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卫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

8 月 26、27 日，会议再次讨论 1959 年和二五计划问题，主要是为了最后通过关于计划和工业生产的一系列文件。26 日，李富春就计划的调整问题向会议作了五点说明：（一）

调整的结果：1. 项目的调整，重大项目增加 148 个，减少 30 个，净增 118 个；五九年重大项目 643 个，其中续建 462 年，新上马 181 年。2. 投资的调整，比原计划投资 480 亿元，增加 21.22 亿元，达 722.5 亿元，地方加了 15 亿元，中央各部加了 7.2 亿元；华东、西南、华中、西北四个区的增加，完全是政治挂帅，以虚带实增加上去的，中央各部也是如此，找的各部部长（没有找财务司，财务司越算越少）。4. 生产指标的调整，电原来是 520 亿度，这次增加到 580 亿度，保重点，保生产指标，保新增生产能力。（二）1959 年计划是空前宏伟的计划。农业，粮食、棉花要比 1958 年至少增长 60%，做的结果可能翻一番；明年钢要达到 2700 万到 3000 万吨，增加的钢产量等于"一五"计划五年总和的四倍；电机生产今年 90 万千瓦，明年 1000 万千瓦。（三）关于方法问题，全党全民办工业，保证计划，保证重点，分级管理。（四）"二五"计划问题，1962 年以 1 亿吨钢为纲的计划方案；粮食 15000 亿斤。（五）计划的编制，各省市 9 月份把明年的计划搞出来。

除了计划、钢铁、人民公社等重点问题外，会议还讨论了教育、财贸、劳动制度等问题。这些讨论都是交叉进行，每个方面又分成若干更具体的问题，形成若干相关的文件草案。所以开会也分成大会、中会、小会三种形式。大会当然是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中会是中央领导人召集的系统（又称大口，如工交口、农林口、财贸口）或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小会是中央有关领导人就某一具体问题召集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

记得除了大会、中会外，我还参加过陈云召集的研究和

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小会。参加的人不多，有中科院张劲夫、二机部刘杰，好像还有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的负责人。我是代表水电部参加的，因为当时上海计划建造一功率为一万二千千瓦的原子能发电站，涉及到水电部的业务。会议期间，中科院党组和二机部党组形成了两个文件：《关于大家办原子能科学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的推广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两个文件当时都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了与会者。

最后一次大会和毛泽东的总结讲话

8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大会。工业书记会议的代表也来旁听，所以人特别多，约有三百几十人。少奇主持大会。毛泽东讲话：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起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

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像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个人，跟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这样，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在70万个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社最好。河南提出2500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差不多了。当然，要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地方要三年。决议案上有一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奖励私人盖房子，我们将来废除私人房屋。

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的怎样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看有二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息（土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土地的概念就变了，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每人几分（地）就够了。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种地。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该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对联句：“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

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如果搞到一亿五千万斤粮食（今年可能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叫绿化？没有树，怎么叫绿化？真正级化，我看每人有几千斤，腾出三分之一土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有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 24 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少奇插话：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讲开始过渡还可以。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很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 2500 万、2700 万吨，争取 3000 万吨。这是一场大仗，这一仗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6 月 19 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 8 月 21 日起，还有 19 个星期，133 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了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 1 月 1 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

报讲900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1956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1957年的粮食生产，比1956年更扎实，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50亿斤。今年1100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争取3000万吨，后年再增产2000万吨，苦战三年，达到5000万吨，基础就搞起来了。剩下两年，到1962年搞到8000万吨到1亿吨，就接近美国。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光搞地瓜。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1953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制度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度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两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过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花”。现在有了“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

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这一点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的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队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1950年、1951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所以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遍，有一条说，许多东西自古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个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做。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

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跟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界做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经济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发明创造多得很，哪里是钱买来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降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帅、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事，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才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么一套，一从资产阶级——本国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破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要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要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只一个月呢？云南有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兵。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那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我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番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

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而是无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方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工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他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是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是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工业。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性质的。九个指头是说明，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来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只有那么少数人，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先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死"是不行的。1100 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 2500 万吨到 2700 万吨，争取 3000 万吨，其中 2500 万吨是死的"死钢"，另外 200—500 万吨是

活的，归地方支配。有些同志怕没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分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总有干，才有枝叶。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干，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样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一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也是第一书记、计委一同来开，十一月十五日开会。我就是抓钢铁，这个事与我有关。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的不大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 41 年的经验，我们有 31 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除四害。国庆节、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越少越好，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市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个害病，出勤率达到 99%以上。医生没有事做，可以去种地，做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他们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会议作的最后总结，不过内容在前几次讲话中反反复复多已讲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开过后，工业书记会议又开了一天才结束。工业书记会议由薄一波主持，陈云、富春到会讲话。这之前，陈云还讲过几次。在 27 日的讲话中，陈说，这次会议是生产会议，主席发现了

问题提出来，非常严重地提出来，我们没有抓生产，他批评得很严重。特别是他提的，现在没有纪律，纪律像豆腐一样这不行，要马克思加秦始皇。29日，陈谈了六条意见：一、搞好土炉子，主要的关键是土炉子，否则钢铁生产今年就完不成，像主席所说就是失败。土炉子成为今年的一个主要问题。二、机械工业的任务，首先是发动群众，挖掘潜力。江南造船厂用一个车间将一个车间军的办法，造一艘五千吨的船，从18个月减到5个月。三、目前存在的以物易物的现象必须制止。从生产出发还是从分配出发，反冒进就是从分配出发，主要力量应放在生产上。四、已经签订的合同要遵守。五、中央和地方必须共同努力。六、要召集一次基本建设的会议。

毛泽东对钢铁产量逼得紧，陈云不得不反复强调抓钢铁生产计划的落实，甚至说出了“土炉子是关键”的话，问题明摆着“洋炉子”根本完不成翻一番的任务，硬是不准少一吨，只有搞土炉子，由各地分摊。其实陈21日的发言中说过，钢翻一番这样的指标布置下去都是很迟的。似是话里有话：变动了的计划本来就下达得晚，落实起来势必困难重重，怪不得下面。

可是，工业书记们还是在会议上纷纷作自我批评，检讨过去一个时期放松了生产的领导，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计划工作上，特别是放在基本建设的投资计划上，大家争投资去了。30日下午，主要产钢铁区的工业书记当面向毛保证，一定完成当年以钢为纲的工业生产计划。这个计划中钢铁和机械的主要任务如下：钢1150万吨（对外宣布为1070万吨），生铁1700万吨，冶金设备35万吨，发电设备90万

瓦，机床8万台。为了在年底前完成任务，会议还排了一个生产时间表：9月份完成生铁200万、钢120万吨，10月份生铁280万吨、钢160万吨，11月份生铁320万吨、钢200万吨，12月份生铁350万吨、钢220万吨。

31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的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到这时，使人感到，一般地赶超英美已不够气魄了，中国人民要有这个志气，美国不在话下，于是一个美国变成“四个美国”。而且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你赫鲁晓夫只不过变成两个美国，我比你多一倍，所以我是英、美、苏一起超过！

这里附带说件小事，即上述陈云说的上海江南造船厂那艘五个月造成的船，我去看过，只是一个船体，空壳壳，内中既无机器，也无其他设备。就在北戴河还是回北京后的基建会议上，我向他谈过。后来经过了解，陈认为我反映的是事实。

会议通过的文件

北戴河会议讨论问题很多，会上印发的文件也很多，有100多份，正式讨论通过后下发全国的也有40份，比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还多3份。这些通过的文件是：

一、计划和工业生产方面：

1.《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

2.《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

3.《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4.《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意见》;

5.《关于物资调拨问题的意见》;

6.《关于改进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审批办法的意见》;

7.《关于经济协作的几项规定》;

8.《关于纺织机械企业领导问题的决定》。

二、农村工作方面:

1.《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2.《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

3.《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

4.《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

5.《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

6.《关于储备粮食问题的决定》;

7.《关于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的指示》;

8.《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9.《关于改革农村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

三、财贸工作方面:

1.《商业部党组关于召开商业厅局长会议向中央的报告》;

2.《关于进一步改革财贸管理体制和相应改革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

3.《关于粮食、棉花、油料的收购计划》;

4.《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

5.《李先念、程子华同志关于物价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6.《关于发展中药生产问题的指示》;

7.《关于农副产品、食品管理办法的意见》;

8.《关于做好薯类抢收、保管和加工干制和使用工作的指示》;

9.《商业部关于棉、麻、烟收购的意见》。

四、教育、卫生方面:

1.《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2.《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陆定一的文章);

3.《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

五、劳动制度和其他问题:

1.《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2.《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

3.《关于劳动制度问题的决定》;

4.《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5.《关于技术保密问题的指示》;

6.《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职工宿舍冬季取暖补贴问题的意见》;

7.《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

这里将主要的文件内容作一简单介绍。

关于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的三个文件,主要是确定了自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几次加码的计划指标。这里将这两个计划的主要指标列表如下:

项　目	1959年计划	比1958年预计数增长	1962年产量①（"二五"计划）	比1957年增长（"一五"计划）
工农业总产值（亿元）	3516－3706	68%	8000－8200 9000	5－5.1倍 2.7倍
财政收入（亿元）	722.5	68%	5200 5600－5800	2.9倍 3.1－3.3倍
基本建设投资（亿元）	501.22	118%	3850③4300	6.8倍 7.1倍
钢（万吨）	2700－3000	145－173%	8000 10000	13.9倍 17.1倍
生铁（万吨）	4000	135%	10000	18倍
钢材（万吨）	1900－2000	144－156%		
煤（亿吨）	3.779	80%	9 11	5.9倍 7.4倍
发电量（亿度）	550		3000 3500	14.5倍 17.1倍
新建铁路（万公里）	1.05			
原油（万吨）	800	281%	5000 6000	33.3倍 40.2倍
化肥（万吨）	530	231%		
机床（万台）	30	288%	50 60	16.7倍 20.2倍
棉纱（万件）	1000	58%	2600	46倍
粮食（万亿斤）	1－1.2	33%	1.3 1.5	2.5倍 3.2倍
棉花（万担）	9000 10000	45%	15000	3.6倍

① 1962年产量计划均为两本帐，上面的数字为第一本帐，下面的数字为第2本帐。

② ③ 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数字，均为"二五"计划五年的总和。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在若干地方已经普遍发展起来，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并且有不可阻挡之势。《决议》对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这样说的：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设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关于人民公社的规模，《决议》提出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为合适；也可数乡一社，六七千户左右；万户以至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反对。这样的规定弹性必然很大，从两千户到两万户相差10倍，导致后来不少地方建立了五千户、一万户以至两万户以上的大公社。《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着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

间。《决议》最后说:“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做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是会后第二天由新华社发表的,题目富有鼓动性:《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公报说,1958 年粮食作物总产量将达到 6000 亿至 7000 亿斤,比 1957 年增产 60% - 90%;棉花产量将达到 7000 万担左右,比 1957 年增产一倍以上。公报公布了经过修改后的 1958 年钢产量计划指标,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 1958 年生产 1070 年万吨钢(即比 1957 年 535 万吨钢增加一倍)而奋斗。公报还肯定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意义,既认为它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又预言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高潮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狂风巨浪的“大跃进”运动,北戴河会议是最高潮的标志。如果说这以前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大跃进”的几次洪峰,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

首先是会议正式确定了年中才修改提高的钢铁计划指标,使钢铁生产由会议前的行业行为骤然升级成为会后的全民运动。从 50 年代前期开始,毛泽东就有一种“钢铁情

结”，把钢产量作为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这同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思想不无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总是生产资料部类的生产优先于消费资料部类的生产。毛泽东把生产资料又简约为钢铁和机械，并以钢铁为龙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为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纲举目张”，即纲一举目必张，是一种主导关系，一抓起钢来万事都好办了。这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因此就要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我在《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中写过，毛泽东对国务院的工作久有不满：“那么多部，都干些什么；尽事务主义，抓不住主要矛盾。这大概是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官’等等方针的最早由来。”“纲”同“目”正符合这样的哲学思维：“目”受“纲”支配，“纲”对“目”起决定作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所谓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也决不是如此简单的决定作用或主次关系，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建设中更难运用此种思维。何况，人们在工作中，还难搞“单打一”，只抓纲不抓目；可是，当时有六条纪律在，谁都怕戴“不抓纲”的帽子。后来九千万人上山搞钢铁，影响到许多地方收粮食，丰产未能丰收。

当然，毛泽东历来重视粮食（消费资料之首），把它作为同钢铁、机械并列的“元帅”之一。历史如此作弄人，1958年上半年大放粮食“卫星”后，毛泽东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甚至讲“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反过来，钢铁生产成为他的心病，因而宣布六条纪律，

要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搞出1070万吨钢。直到1958年毛泽东才认真抓起工业来，关于生产一吨钢尤其是一吨好钢，需要哪些条件，即相应的先炼成铁的各种原材料，以及运力、电力、设备等等，在如此紧迫的时间（19个星期）内，能否办到？所有这些前提条件，应当说，他远不及专业部门那样具有感性理解，否则，他怎么可能轻易树立这样一个雄心壮志？他似乎也看到此事的难处，于是在会上说到：“钢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这是多少有点坦露心声的话，生产不了1070万吨，板子最后要打到自己身上。对发展战略的思考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交织在一起，构成动员“全党办钢铁”、“全民大炼钢”的动力源泉。

北戴河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炼钢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各项工作与炼钢发生冲突者均“停车让路”。在“土洋结合”的方针下，一方面拼命“挖掘”各大中钢厂的“潜力”，一方面大力推广“小（小转炉、小平炉以及遍布全国的小炼铁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的炼钢“经验”。各地党委以第一书记挂帅，广泛动员社会各行各业炼钢。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钢铁生产必须快马加鞭》的社论，称北戴河会议公报公布后14天，各省、市、自治区投入钢铁生产的大军已达2000万人以上；9月上旬全国平均每天的钢产量较8月上旬提高了33%；到9月10日，全国建起小土炉、小高炉35万多个，比1至8月份的总数剧增11万多个。说是卷起狂潮，一点不过分。

作为“大跃进”高潮的标志和影响进程的大事，北戴河会议更重要的是做出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如前面

所说，人民公社同毛泽东1955年设想办的大社，同成都会议决议提出的小社并大社，都有明显的质的不同。它不仅在规模上比大社还大，而且在性质上比大社的公有化程度更高，在社会意义上被赋予新的内容。如果说大社还是被作为一种农村的经济组织，那么人民公社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政社合一，被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甚至被当作“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一些基本的思想，简要说来，这样一些原则是明确的，即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可能开始，这一过渡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及人们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当然，到底还要具备哪些具体条件，才能开始过渡，这是需要依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探索的，需要实践已经向人类提出这个问题时才能开始解决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轻率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简化为“产品丰富”和“共产主义精神”两条，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这两个条件，竟以为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几年内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空想。

如果说，人民公社是从“立”的方面找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桥梁，那么，毛泽东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则是从“破”的方面，为实践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打开了道路。最先响应这个号召的是柯庆施的笔杆子张春桥，他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6期上。文章赞成实行供给制，而把薪金制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产物。

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前面有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张春桥因此文而得宠，以后柯庆施参加中央的会议，就必带上这个"笔杆子"了。在两三个月之内，全国报刊发表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几百篇文章，《人民日报》即达四五十篇。上海市社科联为此组织6次座谈会，会后并把发言稿辑成专集，计有七八十篇文章。由此可见当时这个问题在全国影响之大。

"资产阶级法权"一词翻译上有错误，后来改译成"资产阶级权利"。最确切的译法是"市民权利"，这是同"封建特权"相对应的也就是《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平等的权利"。当时从毛泽东起，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是错误的。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来的，以此同封建特权这一概念相对立，即将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因此，这个概念并不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并不是指剥削者的权利。由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阶级差别，他只是认为，这个原则同资本主义商品的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存在。马克思还指出，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的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包含着在劳动者中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如劳动者工作能力的不同，家庭负担的不同，等等；这些只有到了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时，才能完全消除。当年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恐怕也不甚确当。马克思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并没有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商品混同起来。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工资制等列入社会主义要取消的对象，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其一，将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劳动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将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其二，将消费资料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其三，将对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至于毛泽东把脱离群众、争名夺利、搞特殊化、等级制度以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这更是对马克思原意的附加。他所说的这些现象无疑应该防止和消除，但它们主要是作风问题和体制弊端，而不是“资产阶级权利”。毛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在理论和实际上造成的混乱和严重后果，到“文革”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更是达到顶点。

1958年春夏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一些地方（如河北徐水）在农田水利建设中采取某些组织和协作的方式（其中

有一些显然很不对头），拔高为“军事化”的经验。还有的农村因农忙而建立的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理发室等，被视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表现。所有这些虚虚实实的东西，这股热浪，一时烘托出毛泽东久已心向往之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在他看来，1958年出现的这些情景，同他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设想正相吻合。这两者产生了某种互动：本已有些浮夸和被曲解的实践场面，为毛泽东的空想提供了“实证”；而毛泽东的空想，又给这些实践场景赋予某种理论色彩。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我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庐山会议实录》等论著中已经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北戴河会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后，人民公社运动顿时在全国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各省、市未经充分准备，就争先恐后匆忙地并小社转公社。会后仅一个月，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历史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一种事物当它上升到峰顶时，也就开始了向低谷下滑的过程。北戴河会议就具有这种性质，它把“大跃进”运动推向最高潮时，隐伏在这场运动中的危机也即从此开始一天天显露出来，并且日甚一日。

庐山会议的由来

回顾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国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路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这"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十五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

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要 50 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从 1955 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1956 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十五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1956 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1957 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的，国民收入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 1957 年的增长速度低于 1956 年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 1957 年 10 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经过 1958 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

“反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20%到50%。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煤从2亿吨提到4亿吨，粮食从5000亿斤提到7000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到了8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1962年比1957年的工农业指标，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50%以上。1962年指标，钢变为1亿吨，煤为11亿吨，粮食为15000亿斤。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分别改为三年和十年了。

1958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理想的蓝图。

三四月间，先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4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渐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发表)。8月初在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这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结果。当时确实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到，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

共产风等，随着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1958年6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2000多斤放到7000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1000吨，禹县4000吨，接着是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万吨，后来河南三天300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有的地方四十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无麻雀、苍蝇、老鼠、蚊子）。凡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三次大战的阴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在漫长的28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存在，在这些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这28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斯大林盖子；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三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个人的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层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并不是

毛泽东开的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一次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作全欧洲革命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的，而且列宁也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他在 1920 年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 50 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 15 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 1936 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 年宣布，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 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1957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在庆祝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十五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十五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可厚非，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程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良好，避免了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夸大，达到胡思乱想的程度，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曾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作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改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现，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源远流长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他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1919 年 12 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1918 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的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

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其中哪些是应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一概未加评论。这里只是为康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毛泽东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的作法也是欣赏的。看

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等，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振兴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了。于是晚年的毛泽东最终陷入带空想色彩的理想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1959 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维护其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庐山会议的教训[①]

1959年的庐山会议，至今30周年了。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并进一步向党内向中央领导层发展，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1980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关于庐山会议，我曾做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约两万余字），最后有这样六点简要总结：1. 初期开神仙会，是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认为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大保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起来，丝毫没有认输。2. 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发了言，对纠“左”都表了态。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的柯庆施、李井泉及康生等）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气可鼓不可泄”（落实指

① 此文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结束语。文字有修改。

标即泄了气）；他们又犯阿Q之病，一触即跳，简直批评不得。3. 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勇，无张飞之细”，有些话听者有心，加之又有历史旧帐（没有解开的一些“历史疙瘩”），于是被这些人夸大其词，上纲上线，说彭的信是“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搞分裂”，组织“章罗联盟”。终于“昨日功臣，今朝祸首”。4. 中途调“援兵”林彪上山，最后接管军权。林彪提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为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5. 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6.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一套“左”的错误的东西。“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支配之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以上这些认识，显然是很不够的，只是接触到一些问题，未及深思。不久前，将自己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和有关史料，全部整理出来。对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的认识，比过去进了一步。回头看这段史实及其教训，似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在运动中，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主张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公社什么都要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的公社生活，是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到全民、按劳到按需）的最好形式，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当时不仅是毛泽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

要领导人，都曾自豪地描述过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总之，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为了实现这样美妙的前景，还在理论上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等观点。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政治挂帅、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大搞“人海战术”，“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而不言经济文化条件太差、起点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难），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中蕴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总之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然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庐山会议前的这半年中，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的主题就是纠“左”，整顿公社的所有

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尽管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运动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发展下去，可是这一社会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终是毛泽东所执著追求的。“文革”之初发出的“五七指示”，曾作为“建设新世界的五七道路”：全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以此达到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

（二）当时纠“左”，神仙会阶段提出的18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并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他将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做了惯用的形象比喻：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不必大惊小怪，是不可避免的，是前进中的困难，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关紧要的是，劲可鼓而不可泄，“三面红旗”决不允许怀疑，这样，形势就会很快好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也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

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主要将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三）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段斗争”理论的升级。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界，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党内，同他对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有密切关系。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形势，对我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本来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报告指出：在我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暴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八大通过的正确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第二年，人为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重提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更为严重的是，开始将

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运动开始，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十几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一些对运动有疑虑或发表了某种不同意见的讲真话的同志，当时就被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八十万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大超过右派分子。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四）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起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能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帐，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本来，党内发生原则意见分歧时，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大家能畅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能得到尊重，即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时，是非自易辨明，错误就可以避免。但经过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时，党内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刘少奇在八大作的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一节，有这样一段关于发扬党的民主生活的话："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

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去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八大隔了三年了，这段话人们可能淡忘了；可是4月上海会议才过去两个月，关于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犯上直言，关于“有时真理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关于“李锐怕鬼”（说李锐上书的胆子还不大，内容写得太简略，实有赞扬之意）的话，都还言犹在耳。然而，朝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无常。拿出一顶“敌对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这些全党刚刚听到的话，就统统不作数了！

（五）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

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很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农村环境和农民的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

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确的个人崇拜"之说，自然得到了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是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的。7 月 23 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为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了毛主席的心。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过：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一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 7 月 23 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帐，抓调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李井泉、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主观武断：彭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

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六）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比当年给政治生活造成的危害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的统计，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62%。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1959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8%以上。钢产量达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73.4%，生铁达到2191万吨，增长60%，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195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5.2%，提高到43.8%，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34.3%降到25.1%。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1959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81亿元，增长30%，总投资规模达到350亿元。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1958年还低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

上年减少了22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15%，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元，下降了22%。

1959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及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1840万吨，并提出了八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国家计委编制的1960年计划，仍然以“大跃进”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跃进。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方针，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1960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其中粮食减产530亿斤，棉花减少1292万担，油料减产52.7%，生猪头数减少32%。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9.8%，在棉布、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比上年增加479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积累率一直维持很高的水平。1960年，全国基本建设总额达到388.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9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31%，是开国以来最高的一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81.8亿元，货币发

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1960年二季度开始，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缺布，全国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净增率为-4.57‰；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增率为-3.87‰。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训，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是古今中外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

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 恩格斯晚年这段经典性论述,可以看作是研究人类的历史创造和解读一切历史事变的钥匙。

“大跃进”也可以称作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自然很大,但思想影响更源远流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同样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697页。

中，也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也仅仅是作为“单个意志”去参与这种创造。这情形就如戏剧中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一样，生动威武的表演，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舞台的大小、深广决定了演员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甚至也影响到戏剧的成功与失败。这个比喻用之于革命很恰当，用之于建设也同样恰当。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问题就出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

我们的革命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我们的建设也是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学说创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欧，正进行残酷剥削、掠夺世界，又周期发生危机之时。他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将要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同我们实践过（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俄国到中国都发生在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另比俄国尤甚。这同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立即实行全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直接分配社会劳动，取消商品、货币，全部社会生产直接由中央计划控制、调节的状况和条件相去甚远。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两种趋向：是一，是教条主义按照经典理论去“复制”社会主义的“原型”；其二，是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的状态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当然，上述两种趋向，很大程度上在人们头脑中是同时并存，兼而有之的；就是说，人们常常既有“复制”、“摹写”的一面，又有“借鉴”、“创造”的一面，并且随时间不同也常侧重不同。大体说，着重

“复制”的一面趋于保守，着重“创造”的一面显得富于生气和活力。由于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以及文化性格等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趋向往往存在某些差异和各具特色。前苏联如此，我们中国亦如此。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更突出地表现为后一种趋向。他发动“大跃进”主要是为了有所“创造”，有超过前人的意识，但整个思想状况又是十分复杂的。中外学者著书立说，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和原因作各种分析，我们应当将这个历史性的“创造”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解释得更合理一些。

“大跃进”形成的潜在原因，自然同中国走怎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分不开。工业化萌芽期本身是受到历史的限制和规定的，西方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大体分四种类型：（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二）较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四）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以美、英、法为代表，继续实行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量积累社会资本和财富。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也起变化，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上升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一定的领先地位。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赶上英法，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各种内外原因促成。第二种模式则以前苏联为代表，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形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30年代以后，苏联凭借这种经济体制迅速壮大了经

济实力，增长率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提高，并使它在卫国战争中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或靠近第三种模式的，主要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一般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经济羸弱，但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独立后大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为主导。但因其对外依赖严重，以及民族工业薄弱等原因，发展较慢，亦不稳定。第四种模式同第二种模式具有相同性质，一般为革命得到胜利的国家所采纳。差别在于刚刚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这些国家，长期的兵燹与社会动乱，使得经济基础极为脆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起步艰难。但正是这一点，又促使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试图以较快速度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主动学习第二种模式，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充分调动全国的人才物力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压缩人民暂时的物质需求，实行高积累即某种“原始积累”。从本质上说，第四种模式采取的是一种加速型发展战略，即一方面客观基础较差，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改变国家面貌，于是尽可能运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所谓“急于求成”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模式发展而来的。

按照中国当年的情况，选择第四种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苏联的榜样又摆在那里；而且，由于我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胜利提早到来，更增加了我们加快发展的愿望。毛泽东在 1956 年党的八大预备大会议上说过一段广为传诵的话，明显表现了这种“跃进”

的情绪。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样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又说，"再有五六十年，在钢产量上赶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种责任，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①

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是紧密相关的。如同斯大林不可能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一样，50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认识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只有学习苏联，走一种历史规定好了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的巨大援助下，我们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成绩是十分辉煌的。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已全部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8.40%（世界银行的统计中，这是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之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14.7%速度。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266%；煤产量1.31万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比 1952 年增长了 96%；粮食产量达到 3900 亿斤，比 1952 年增长了 19%。同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比较，这一连串的数字确实是值得自豪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离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离超过美国的目标则更加遥远。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旧墟清理完了，但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未改变，因为在这片旧墟上还没有建造起共和国强盛的大厦来。所以毛泽东对这一前进步伐仍感到不满足。早在 1955 年夏季，他违反自己原来的设想，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斥责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于是应该“花几代人的时间”（列宁语）完成的对农民的改造，在不到半年时间即告结束。有关这一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已有定评。在工业方面，由于受到农业合作化“热潮”的影响，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更加强烈起来。1955 年 12 月，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谈话：“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机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毛泽东当时还设想八大的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见其“加速”愿望在心中占有的位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 1955 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

鉴’的问题。”这同刘少奇上述传达在时间和意向上是互相印证的。也就是说，1955年至1956年之际，毛泽东已在重新考虑“前进道路”问题，原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速度，已不能令他满意，要探索“非常规”的道路与速度；即是说，要采取不同办法，要超过苏联，比苏联走得快些。1956年2月中旬，毛泽东开始分别听取中央34个部委办的汇报，经过思考、比较和总结，4月作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开篇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结果长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而且对农民剥夺过甚，造成经济失衡。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些缺陷，并试图在中国的实践中加以克服，当然是十分明智的。由于感到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创造不多，仍处处受苏联经验的限制和束缚，回顾革命年代的教训，毛泽东的心情自不平静，强烈希望从中国情况出发，在建设方面也有所创造，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中，他批评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伤害，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这三方面关系的问题。他还批评过去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搞得太死，从而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论证了正确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从1955年到1956年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中央会议上，曾

提出“又多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随后李富春加了“又省”。这八个字为毛泽东欣赏而接受。

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我们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继续维持过高积累，追求“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且“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的“运动”。结果比同期苏联经济的损失要大得多。这又作何解释呢？难道我们所极力肯定的“探索”就这样含糊其词地被事实否定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所谓“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科学地总结和合乎逻辑地说明吗？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以为，这段话可以作为解释上述疑问的一条重要线索。

所谓“原则相同”，指的是我们仍然承袭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追求放在经济首位，这是为主的东西。前文已经指出，作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50年代似乎只能选择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同时在理论上，从斯大林起，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理解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部类，即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实行先建设后生活的方针，也就要高积累，对工业高投入。在中国，则特别要求人们要“勒紧裤带”。早在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就发生过实施“大仁政”还是“小仁政”的争论。道理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

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太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当年国内外形势下，当然首先要加强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建设。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发明新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前人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与苏联“原则相同”。在经济结构上，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页工程为基础，奠定了突出重工业的建设格局。

因此事实很清楚，1956年前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那后半句话上，即“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苏联建设中轻轻倚重的偏向，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对旧的一套观点有所突破。后来八大提出“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意见，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都可以从讨论十大关系前后的思想中找到源流。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尽管阐述的是经济建设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兼及政治方面的内容，《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学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而经济运行最需要的就是精确的规定性、比例等量化的东西。因此，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总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于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被冲掉了。这种现象使人想到“大跃进”中不少貌似“两点论”的东西，比如“工农业并举”、“土洋并

举”等等，当时都是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性而大加赞誉的，称之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但是，同十大关系类似，这些“并举”更像运动的口号，而不是经济学用语。它们没有准确的经济学定义，因此人们无法掌握“并举”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较关系。只是在感觉上认为提出了“两点”，有了自己经济建设的新方法、新内容，可以傲视前人了。结果，“两条腿走路”和“同时并举”，造成了两条腿一起狂奔，土法、洋法一轰而起，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当年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规则）。几千万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如回到人类炼铁的上古时代。这就根本不是什么“独创”的问题了，而是虚幻和荒谬，恰恰与经济工作要求的精确与科学背道而驰。在革命年代，靠“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建设时期，却不能靠这两手实现工业化。因此，“大跃进”时期那些所谓“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东西，表面上似乎是“两点论”，实质上不过是在苏联旧体制之上，运用我们自己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已。所谓“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像诗的语言，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非理性思维。结果反而把苏联经济建设中那些弊端扩大化了，造成更大的结构性失衡。以 1958 年以例，全国上马的大中型项目成千上万个，积累率由 1957 年的 24.9%陡然超过 40%，而同期国民收入只增长 22%。这就意味着国家大量挤用消费资金和压低农业投入，来上工业项目，如此何来“兼顾”“并举”呢？因此，“大跃进”中这一套自诩的“创造”，在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说来，无非是“新瓶”与“旧酒”

的关系，“新东西”没有创造出来，“折腾”和“胡闹”倒非苏联所能比拟。这就不是辩证法所能解释的了。因此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苏为鉴”，实际借鉴的仅仅是浅层的或操作层次上苏联的缺陷，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又大多“过度”或“无度”。这同苏联模式即其经济政治体制无关，我们仍然在这种模式的旧体制上进行，但在“冒进”上却非苏联所可比拟，他们在几届五年计划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当年的猛上猛下，没有出现过那种“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大量饿死过人，是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事，同工业发展无关。

为了“创造”，搞出一套与苏联不同、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毛泽东曾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乍看起来，这个口号同上面“形象思维”的“两点论”一样，都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东西。但是“热烈”的气氛过头，荒谬就接踵而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对教授的态度，他当时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无穷的恐惧；看大家一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由此还称赞了柯庆施敢兼任教授之举。当时听来，颇有新奇之感，把教授或有科学知识的人作为建设的对立面，这于理不通。但当时听者动容，很得启发似的。这些话无形中也成一种“创造”。如果说毛泽东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早有反感的话，那么在一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他此时此地讲这番话的目的，却是针对着以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而言的。因为不打破这种“迷信”，那套“豪放”的“创造”就难以为

干部和群众接受。毛泽东自己是知识分子，并非不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也提过“向地球开战”，“开发技术革命”，“向科学技术进军”之类的口号。但他主观上超乎想像的一面，又时常与实实在在的科学规定相冲突。他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知识对驰骋想像的束缚。“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正是以诗言志。政治斗争可以“无法无天”，可以厌恶法律的约束，结果不过错划了几十万个右派；经济上也“无法无天”，也厌恶规章制度的束缚，那就不止是几十万“右派”挨整，而是亿万黎民百姓遭殃了。28 年的残酷斗争，战胜一切内外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自然养成一种绝对自信的心理；客观上六亿人民齐唱《东方红》的最高音响，是否也使历史伟大对不可违背的客观经济规律和许多基本的科学道理时有违背呢？不然，“大跃进”时期出现那么多荒谬的事情，一时怎么能信以为真呢？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这也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排斥知识，破除迷信，在“大跃进”拉开帷幕之后，有一股发狂热而不可收之势，以致在思想上连老祖宗马克思主义也有些看不起了。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创造出来的，是随时代发展的，当然，不能抄书照搬。一般地说，这段话很有道理，教条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害人不浅，曾经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感触最深，为“破除迷信”奋斗不已。这已经有了历史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也当然不能照搬教条，应该走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

路。这种精神是完全对的。但是，“大跃进”中鼓吹的“不要迷信”，不要“抄书照搬”，则是另外的事情；说明白了，是觉得马克思主义也不在话下了，自己要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范，要搞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破马克思”的问题。他说，自整风以后，我们大多数同志慢慢地不大怕资产阶级教授了。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知识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又说，“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等。这些话，这些感想，应当说都是对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抱有雄才大略的人，应当具有这样的精神气质。问题在于任何人都要受客观规律的约束，不可以超越客观规律胡思乱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何况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人都受三种限制：即时代的局限，自己已有的经验、知识水平，以及思维能力。否则，还是那句话，伟大与可笑，只差一步。

“敢教日月换新天”，1949年得到证明，1958年不能同日而语了。建造“新天”“新地”的“大跃进”和人民运动，也同三大战役时一样，曾经在全国铺天盖地奔腾而来。这种

主观随意性，远离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自己在仅仅三个月之内，也觉得太过分了，不得不连续召开会议“纠乱”。但问题就在仍是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下“纠乱”，作一些量的调整，而不是作质的变更：放下这三面红旗，回到客观实际中来。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上面和下面某些领导人总是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投其所好，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柯庆施的“乘风破流”开其端，李井泉、谭震林等人紧随其后。可举一个具体例子：1958 年 7 月，在湖北省委机关刊物《七一》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该省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开篇之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该文原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由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反对，才改为现在的题名。此文可看作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有关讲话的诠释和发挥。王任重是当年很被毛泽东赞赏的地方领导人。文章一开始就批驳了有些人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理论，而不认毛泽东的著作为理论的观点，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现代最重要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做理论，不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看做理论，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提出，在当前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反对厚古薄今的偏向”。接着，作者以讥讽的口吻说：“某些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实际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低，其中有些人简直是在那里反对马克思。”“假若有一个人企图在《共产党宣言》里，或者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当中去查找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你能说这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一有所知吗?”文章的用语是犀利的，有点兴讨伐之师的檄文味道，但读来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过是“不要迷信”几个字，那就是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要多看毛泽东在当代的“创造”，看那些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此必须“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到来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的形势面前，这些话当时真给人们以“激动不已”的力量。

然而人们不能总靠“激动”过日子。几个月的狂热下来，许许多多的人已有所觉悟：在我们中国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多了还是少了？我们目前所作的，到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中国这块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土地上虚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目空一切，在那里妄自尊大地进行所谓“创造”?《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去作如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据说李达当时闻得书记的这番高论，甚感焦灼，曾据理力争，甚至还当面向毛泽东进言，说已经发高烧了，再热下去不得了。杨献珍其时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之说。可见当年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这篇文章虽说最后不得不换了题名，但点睛之笔尤在“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后者，一切科学都是发展的。但该文作者

的本意却在“超过”，就字义而言（这同后来林彪用的“顶峰”相似），“超过”与“发展”也是两码事。作者当年的意思就在：马克思的东西已经不管用了，毛泽东已经超过了，只要学毛泽东的就行了。其含义同后来林彪的读“老三篇”和手摇小红书，如出一辙。

“大跃进”时期，一切“旧”的思想、理论、规章、制度都可以破除，唯有一件事是迷信的，那就是“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就可以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大跃进”中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前面谈到，这种做法同长期进行革命战争有不解的渊源，同时又是试图打破一切常规的寄托。或者说，也是一种对生产组织、制度的“超越”。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一反冒进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毛泽东为什么要说得这样严重呢？核心在于他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搞一个大突破，超过前人的设想，超过前人的速度。而要实现这个抱负，就必须打破常规，运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人多力量大，只要焕发出六亿人民的干劲，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应该说明的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根本是两回事情。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来源于理论依赖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群众运动则是一种激励人们的手段，它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性和无序化等特征，同稳妥、科学、秩序化、条理性等格格不入。在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往往能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或工作目的，如土地改革，参军支前，以至春耕秋收等等，革命

形势成熟时，其排山倒海之势，可以迅速打翻旧的统治制度。这是为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在建设时期，群众运动的上述同优势相对称的缺陷，却会造成灾难。“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以“革命的冲天干劲”的面貌出现的，针对的正是计划与平衡、规章和制度，以及一切经济生活必须遵从的程序和秩序，它们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这些“正规化”的东西，应当说从理性到感性，毛泽东都是很不熟悉的，他没有过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他早就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因为计划与平衡就来自国务院，毛泽东认为国务院尤其计划工作是搞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束缚了人的手脚，影响群众的热情，即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他多次谈到规章制度问题，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要同群众见面，不适用的应当改革。实质上，这同批判反冒进的“保守”、“右倾”是一个意思。《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设新的平衡》说，1956年反冒进，“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简直惶恐得很，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因此社论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篇社论将平衡视作庸俗，等于贬低了生产管理的科学性，于是为一哄而起的乱来开了方便之门，通了畅行之道。毛泽东对国务院工作的不满还在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几十个部委，平均使用力量，没有抓住纲。于是提出“以钢为纲”等口号和三个元帅、两个先锋的说法，从而造成全民办钢，各行各业为钢铁让路的局

面；破除条条框框，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958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曾感慨谈到：“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些话同其后几千万人搞小土炉，所谓群众性大炼钢铁有直接关系。王鹤寿10月29日给中央报告中就说：“现在全民大搞钢铁，声势浩大胜过淮海战役的群众运动。毛主席提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业。两个月的实践证明，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完全没有搞过钢铁的群众，很快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钢铁。”毛即予批示：“此件很好。这是我要鹤寿写的。”可见钢铁战线上，“一场真正的革命”，也是毛亲自发动起来的。此事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超越”苏联经验。“大跃进”中批判“马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是否定苏联搞工业的方法。《马钢宪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是苏联组织工业生产几十年摸索出来曾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它在合理地组织生产方面，是经过多年实践的。现代大工业本身，需要严密的规章制度，对各个工艺流程和生产部门进行监控，以实行优化生产，得到高质量的产品。这已经是不容怀疑的经验和定论。否认“马钢宪法”，认为它限制了人的积极性，还冠以“不准革命”的罪名，实际的着眼点还在于实行工业上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也就附带破除了《马钢宪法》。至于“小土炉”遍地开花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尤其是大量破坏森林，多年也难以恢复。但当时搞这些乱来的东西，却被说成是“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

题”。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迷信群众运动，并不是真正的依靠群众，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主观主义，即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群众运动来达到某种主观愿望，无论从方式还是最终效果来看，都跟群众需要相距甚远。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处在较低状态时，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易于耸动起来，形成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进行科学的有效的生产，人们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及责任制度，这是现代化生产所必然要求的，任何人为的“超越”都将自讨苦吃。“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乱来的作法，为我们民族留下了长久而惨痛的教训。

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高速度绝非坏事，但要看怎样来实行。前文说过，我们所取的建设模式本身即是一种“加速”型模式，极易诱发急于求成，但就“大跃进”发动的过程看，导致急于求成，又有特定的国际因素和主观作用的交互影响。毛泽东很早就对苏联的建设速度表示怀疑，多次讲到我们自己能否快一点的问题，并认为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做到更快一些。1956 年形成《论十大关系》前后，即有这样的想法，但提法上是借鉴苏联经验，少走一些弯路。1957 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情绪高昂，一再讲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按：此处所讲“技术革命”是广义的，指政治以外的经济建设，而不是狭义的技术上的革新的革命，但后者也包括在其中）。而就在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动。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趋向缓和。50 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世界局势不再像二次大战结束时那样两个阵营间剑拔弩张。1956 年前后特别是苏共

二十大以后，苏联方面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认为世界形势正走向缓和。这种形势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口号，本身即含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的意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提出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这已经有些自不量力了。但毛泽东的气魄更大，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并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年底，刘少奇将这个口号正式公开出来，全国一片欢欣鼓舞。后来，"赶超"时间一再缩短，1958年5月，毛泽东曾决心再过一年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到1962年时，"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在赶超英美的同时，自然也就超过苏联了。很久以来，对苏联憋了一口气。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我们是不是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到1958年，就这样谈到："我们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对外公布。"因此毛泽东要为"发明'跃进'这伟大口号的人授一个博士头衔"。前文已经提到，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集中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获得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这已经是超高速发展了。沙俄时期，尽管经济落后，但已奠定了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30年代斯大林大力发展工业，使苏联经济迅速强大起来。相形之下，旧中国的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据西方的统计，我国50年代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仅及苏联1928年时的1/5稍强，工业设备、技术也落后于苏联约三四十年，人口则是苏联四倍左右（马寅初至1959年仍坚持说："我们要快，人多就是个大负担。"。这些差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主观上一蹴而就之事。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赶超"战略，其状况必然是打破平衡，疾进疾退，伤了整个经济的元气。《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平衡思想、辩证关系，时隔两年到1958年已经丢得无影无踪了。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感到大惑不解，他判断说："或许，毛泽东从未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那些思想看上去不像他自己的。"《论十大关系》是他听取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各部委汇报后的产物，其中意见，即使最先是由这些部委负责人提出，但当毛泽东将它吸收到《论十大关系》中，当然可以认为其中的思想还是源自于毛泽东，是他当时头脑清醒思考的产物。但随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本人既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所鼓舞，又为求强求快的思想所催促。迷信群众运动等经验，在一系列自制的假象面前，主观主义日益膨胀起来。加之1956年底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对他的影响，我们实际上已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后退，放弃了八大对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批评与警惕，从而助长了党内个人意见至上的传统，随即扩大了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柯庆施、康生等人在中央会议上，正式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正是造成"大跃进"局面的催化剂。

回顾起来，当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作战略性转

移，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之时，毛泽东却日渐骄傲、自负起来，他越来越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展成一人专断的局面。这也同回顾历史正面经验有关，促使他只迷信自己的一套，赞赏“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此话列宁说过，斗争王明路线时毛也说过）这样的话，表示过“只要正确，就不要推，不如我独裁”的想法。因此将批判“反冒进”同1957年反右派斗争相联系，早已越过了经济发展方针的分歧本身；实质上是他个人否定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个人凌驾党之上的严重事件。而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的否定，则基本上改变了当年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状态下，毛泽东个人无论怎样发挥想像，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到快得不能再快的地步，也不会再受到任何制约了，终于形成上上下下察颜观色的局面。如钢产指标一再加码，粮食产量一升再升；在几年之内，不仅超过英国不算回事，就是超过美国也理所当然。回顾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情！郑州会议开始提出所有制方面乱来的问题之后，毛泽东仍不愿降低钢的指标。1959年庐山会议一个“反击”，“大跃进”又起高潮。直到1960年9月，局面明显太严重了，才被迫同意调整，而此时国家的经济已沉疴难起了。1960年钢达到1866万吨，1961年猛降到87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实际只有4000亿斤（公布7500亿斤），1959年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1961年2800亿斤，降到1951年水平。这种猛增猛降、大起大落自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而且发生了饿死几

千万人的严重情况。

"大跃进"年代还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当年毛泽东所试图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超越"。这个"超越"在思想和理论根源上，要比经济上的急于求成和超高速发展深远得多。它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社会性的大改造，或者说在改造社会主义方面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许多最具有个性特征的思想和认识，都全面表露了出来，使我们得以窥其堂奥。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超越"性的实践，并不如一般所说，仅指人民公社化运动——那只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已；这个"超越"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摹写或设想，包括了城市、农村、思想、理论、道德、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每一家庭和每一个人自身。因此，它是极其广大和复杂的党国体制和思想体系，是新旧观念交织在一起，又从主观出发而进行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震动。遗憾的是，当时许多"观潮派"、"算帐派"和"攻击者"、"诋毁者"的话，却被历史证明是逆耳忠言，是真知灼见。

我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说过："大跃进是轻社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不仅跟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在追求'大同'方面，连康有为的一些认识也未达到；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是相当轻视的，总希望找到尽早过渡之'捷径'。历史已经说明，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凭主观想像，任意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加

以根本变动，还名之以‘超越’前人，其后果是何等的灾难性。”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围绕人民公社而构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或称设计的共产主义的远景，主要以旧的思想材料为源泉。例如关于“大公社”的思想，毛的设想大多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而来。1958年2、3月间，他在同陈伯达的谈话里，就说过公社政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在广州同刘少奇谈公社问题，“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人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转述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具体构想，即乡村中的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各级学校、科研机构、各种服务行业、公共食堂，应有尽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这仍能看到“新村主义”的明显遗痕。1958年7月，陈伯达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正式公布了毛对建立这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即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也没有超出上述旧思想材料。毛的这些想法一经透露，全国上下一片响应之声，徐水、七里营、范县等便率先“急闯”，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甚至消灭家庭都成了一时议题。城市也开始大办公社，家庭妇女和老少幼儿统统组织起来，尝试新的集体生产、集体生活。似乎整个中国社会一下就到了“大同”之境。

现在人们一般都承认，毛泽东上述关于“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

这种判断当然是对的。但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钟情于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大”（政社合一，乡政合一）和“公”（提高所有制档次，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共负盈亏，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什么他要从旧的思想素材中吸取养料，塑造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面貌呢？直到去世之时，他毫无反悔之意，还惟恐后人否定了他的这些作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基本思想看，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本身可能并非是错误的，如追求人的平等、社会的公正等等。其谬误性在于“空想”是从单纯的想像出发，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可以不依赖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而发展的社会形态。再深入一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公正、平等和对公有制度的追求，正是对贫穷、分散、分化、偏私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空想的美好，正是对社会丑恶的折射。无论西方的空想论者如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还是东方的康有为等等，无不从此出发去阐述自己的理想和设计。对他们说来，公有制度或共有制度是解决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最佳选择。换言之，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把解决生产力问题放在改造社会的首位，而是寄希望于在分配即生产关系方面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平，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与贫穷的关键。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拉平”主义，即平均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易于接受公有制度的原因，恐怕亦在于此。科学社会主义要始终同平均主义作斗争的根源，也出于这个原因。

毛泽东在深层意识上，是否受这种产生于落后经济条件

下的空想影响，实值得后人研究。早年，由于家庭身世的原因，他对旧中国特别严重的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已有了深刻的感触和一定的思考。1918年以前，他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的五六年中，曾读了大量的经世济民的书籍。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尔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乃至托尔斯泰《泛劳动论》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这些思想材料无疑给他的思想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可见旧思想材料中的乌托邦在他心目中引起了很强的共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即投身于长期的革命斗争，激烈的武装斗争，人类历史罕见的艰苦环境，使他经受了极大的锻炼，也积蓄了丰富的才智。他终于创造了一整套在落后国家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和经验，这几乎使他享有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武装斗争之父”的声誉。但是，武装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又是一回事。对于建造新的社会，他的思想认识是复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有来源于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方面，最不熟悉、未彻底接受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第一性”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他希望大力

发展生产，希望“向地球开战”，甚至是以冒进的形式，牺牲平衡的方式，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但是更多的是从“求强”、从“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愿望出发。至于如何科学地发展生产力，求得人民的富足，在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基础上再考虑向新的社会阶段过渡，则是非第一位的构想。相反，他甚至顾虑人富了，要变质，“变修”，因此要“趁穷过渡”，等等。他留恋的、肯定的是战争年代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可以使人精神境界纯洁而高尚，人的精神得到某种升华。

“趁穷过渡”，具有典型的“空想”特征，也表现了毛泽东宁愿以一种更高的公有制，而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来解决社会差别的意识。显然，在经济条件十分低下的状态中，设计和追求社会组织的“大”和“公”，是典型的“空想主义”和乌托邦。——因为它们是脱离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空中楼阁”。早在合作化初期，毛泽东就主张迈开快步伐，其主要的担忧，不是如搞不及时，会出现两极分化。1953 年关于山西合作化的争论，1955 年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无不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公”意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于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立即提上了日程。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毛泽东当然不是未予理解，但他更有兴趣的，是对社会的改造，是社会关系和所有制的改造，是求得真正的公正、共有和平等。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所以后来那样钟情于搞“学大寨”运动。可以说，这是他晚年的愿望所在。一当群众中出现生产上的联合愿望，他立即捕捉到这一“深刻”的社会动

向，提出了“人民公社”和一整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而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时，人为提高所有制的程度，或人为地拉平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别，以为如此一来，社会的共有和公正就实现了。说到底，这仅仅是一种小农的“共产主义”。

果然，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一切落后的东西都破网而出，最典型的就是破坏性极大又屡禁难止的“共产风”，“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县共社的产，社共队的产，队共农民的产，打的都是“共产主义”的旗号。于是较为富裕的农民杀猪卖牲口，有的生产队干脆组织起来进行“瞒产”，站岗放哨，像战争中对待敌人一样。那些类似“新村”的作法，如生活集体化、公社食堂等等，不久即引起农民的反对，只是在政治压力下强行维持一时而已。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可以说在几个月中就遭到了失败。

1958 年 11 月以后，他开始了解到农村急于过渡，已引起了一片混乱，于是提出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划线的问题。1959 年初，又不得不确立基本队有制（大队）原则，以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对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实践寄予深情和厚望。例如 1958 年 6 月对《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范县在两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是什么呢？还是那一套所谓“把全县九百九十三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二十五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的吹牛皮；所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这

套小农式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确实始终极感兴趣。1958年12月7日、10日，他又印发《张鲁传》的批语中写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可见其感情与意识中同中国传统的空想主义有何等深远的沟通。他希望在中国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而又始终解脱不开经济、文化都处于很低水平的农民空想运动这个情结，当然是无法实现“超越”的。有人说，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点燃了一个幻想，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人民公社化的继续发展)，来达到那个“圣境”，结果不能不屡遭挫折。我则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既有十分高远的想象，又有丰富的历史素养，独独缺少对人类（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了解，其中有为马克思所总结过的，他有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尤其是二次大战后新发展的，他都不熟悉，或者茫然无所知；同时又违背革命年代自己的经验，急于求成，不是脚踏中国实际，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终于造成了晚年的悲剧。

当然，仅仅从旧的思想材料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对毛泽东的影响，去分析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这还是很不够的。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他读过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但有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曾对他的空想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形成了某种“发展”了的状态，今天很多人把这称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误解。在这方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法权”应

译"权利")即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有如下一段批语："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并非不了解共产主义要有极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作基础的道理。问题是，他感觉到文章要做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产品上面，即寻找一条具体和"创新"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这恰恰是斯大林未能解答的。毛认为，全党大办工农业，几个并举和群众运动，是高速发展生产的最有效办法。而在上层建筑特别是观念形态领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途径。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这个思想。

从"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几乎从未放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其执著简直达到了百折不挠的境地。1975年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可以说把他的这种观念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毛的这种执著确实值得加以分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要划分为两个阶段，可以认为具有理论上的科学预见性。但他又提出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权利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权利问题就被说死了，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已被剥夺，但在交换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权利还存

在着，由此造成的事实的不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而国家则成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在理论上就成了难翻之案。马克思、列宁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已建成或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国家的党内，并没有引起后来像中国那样高度的理论重视，却在毛泽东的思想里产生巨大的反响，以致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是有深刻思想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空想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生了“共鸣”。

前文说过“空想”的错误性不在于“空想”本身，而在于它脱离了时间和条件，把目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当作一种真实。毛泽东受小农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空想论，刚好可以马克思、列宁的“资产阶级权利论”为“武装”。他的这种空想即企求在低物质水平上实现社会平均与公正的特征的思想，终于在这里找到奥援，因此，他试图在现阶段就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例如级别、地位、薪水乃至商品、货币等等，甚至认为这些差别乃是万恶之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看来，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践，于是提出恢复供给制；通过所谓教育革命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通过干部下放，来缩小城乡差别，等等作法风行于世。似乎这样一认真推行，马上就可以达到理想之境了。毛在倡导破除法权时，又常常带有对以往革命时期经验的依恋，如认为“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的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

“进城后，后退了。”于是要填补这些“鸿沟”，要超越。这些想法同他脱离实际的空想论，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但这种貌似“赶超”的做法和追求，并非使社会有所前进，而是向低经济水平的社会形态靠拢；其平均主义的目标模式，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实行商品生产，更同今天实践的市场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能再世的话，他们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所呈现的复杂变化，相信也会重新考虑“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至少他们原来估计的资本主义已处于其最后阶段，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和国家，进入一个完全公有制，没有商品，只用“劳动券”的社会构想，已是很不现实的了。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夺得了政权，再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途径，首先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再进一步追求均富；而不是立即消除一切不平等，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穷过渡”的方式，已逐渐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所认同。至于何时才能实现《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描述，那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甚至应该不做现实的考虑。在这样的意义上，除必须指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固有的空想主义一面外，还应承认他所受到的理论、历史的局限，他毕竟也只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领袖。他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所遭到的失败，应该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教训。

我在《龙胆紫集》中有这样的句子：“看事容易做事难，事非经过不知艰，束修或少或多付，须戒倾囊赌棍然。”这是指毛泽东晚年许多违背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作法，

并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大跃进”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我们子孙后代都应不断从中吸取教训。除需要在加强党内民主、政治民主方面去反思以外，更应研究我们怎样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为什么会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正如开篇所说，历史为人们提供的活动舞台是有限度的，任何试图跨出这个舞台，作“超越历史”的努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遭败绩。就此而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判断是正确的：“总路线、大跃进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此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遗憾的是，党没有有效地制止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行为，以致他将这些东西发展到了极端。“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经由历史来证明是办了蠢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错误的主观意志论和不负责的政治随意性，加以彻底清算，那么我们党或者某个人（掌权的人）还会不会再干类似的蠢事，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不会再次陷入类似的“狂热”？（请不要忘记 1978 年经济上的新冒进）这个问题似很难作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尤其因为事实上还有“理论家”或“权威人士”在写洋洋大文，想根本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想根本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他们留恋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也要一分为二，等等。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关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两大错

误：“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虽然党已经做了彻底否定的正式《决议》，但是想翻案的确还大有人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之加以彻底的清算，经过这样的清算之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才能从彻底批判错误中建立起来。

“大跃进”期间 我给毛泽东三次上书

在“大跃进”期间，我作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先后给他写过三封信。三封信都是反映我对“大跃进”的观感的。毛泽东对这些信件都表示过他的看法，有的是在小范围谈话中的即兴评点，有的则是在大庭广众中语惊四座的议论。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印象深刻，感慨无穷。

毛泽东听到我说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

1958年6月上旬，毛泽东找我去谈过一次话，说到当年钢铁要翻一番的打算。6月中旬到7月上旬，我到上海主持华东区电力系统下放会议，接着参加华东区计划会议。这些会议是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紧锣密鼓地部署“大跃进”的重要步骤。在开完会议离开上海的头天晚上（7月7日），我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工作性质的信。我的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地区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尤其着重于发

电设备高速增长的困难。我认为在工业全面跃进的形势下，电力供应将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信的末尾指出，“有些事情需要也可以‘霸蛮’（按：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即勉强蛮干之意），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人们还是不大愿意多听困难之言，困难之言有时也使人难以启口，至少先给自己戴顶‘中游’帽子，才好开讲。”（此信留有底稿）这封信发出不久，就是8月北戴河会议的召开。北戴河会议决定为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发动全民炼钢；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号召在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这次会议成为把“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推向最高潮的标志。我的这封信同这种狂热势头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当时毛泽东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对我的这封信自然不会看重。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到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情况起了变化。“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子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第一天讲话时提出要把空气压缩一下。也许是他想起我那封信来了吧，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他的住处东湖招待所去。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就在附近。1952年我从湖南调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组织部谈话时，在这招待所里住过几天。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廊式的平房，就在东湖之滨。见面时毛泽东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我没多作解释，心想不过是“不中下怀”罢了。谈话不到一个小时，现在记得起来的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谈到“小土群”，几

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从而会影响到用户。我们首先是机械行业一系列问题。我最后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来，这些话听进去了。其次谈到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当时我就有所接触，联想到水土流失，这个问题未能深谈下去。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他，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一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科学论证，一亩地可以打几万斤粮。钱的文章对毛泽东固然起了作用，当时我心里想，一个自己种过地对农业如此熟悉的人，恐怕主要还在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也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真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吧。说受钱文影响，是否有点推卸责任呢？何况，即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硬有7500亿斤。这个比头年翻一番的产量，他是很满意的。(后经核实，只有4000亿斤。)

我的《龙胆紫集》中，“戊己诗”九首组诗有一首七绝，即记这夜谈话情景：

岂有闲情忆少年，湖边夜台话当前。
黄河不到心难死，特作如斯斗胆言。

这晚谈话使我感到，钢铁也好，粮食也好，毛泽东确实

比较清醒了，"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重的话，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虽然粮食产量仍坚持公布 7500 亿斤，他还是号召反对作假，直接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浮夸和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这就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毛泽东批评我的第二封信只有"骨头"没有"肉"。我再次上书，有些话是对着毛泽东的心态而言的

1959 年初春，"大跃进"和公社运动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减弱，农村开始整顿公社，一些工业指标也有下降。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在整顿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觉的政策性问题。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已经下降的指标（如钢产量）仍然同可能实现的产量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完成 1959 年的指标，还在争材料、争设备、争资金。这时我愈发感到问题很多，矛盾丛生，曾反复考虑 1959 年钢的指标难以完成；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办，会影响到全局。一次开会时遇见计委的廖季立，他是计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我们是延安"抢救运动"时一同关在保安处认识的。我直率地问他，钢产 2000 万吨到底能不能完成；他也直率地答道，不可能完成。有了这个底，我便于 2 月底或 3 月初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反映问题的信（这封信的底搞至今未能找到）。信里主要讲了 1959 年钢产量指标必须下降，并且落实，这样才能免于影响全局。否则，最大问题是同一机部的矛盾无法解决。一机部的主要产品有赖于钢的数量尤其质量，从而电力也是

无法保证的。信的末尾，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信写好后遇周太和（陈云的秘书，延安时老熟人），他将信给陈看了，并跟我说，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少牵涉到计委，最好能给富春也看看。于是我将信的抄件送李富春，原件送毛泽东，并说明同时给了富春一份抄件。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会议刚开始两三天，得到通知，毛泽东要我去谈话。他住在一所很宽敞的花园洋房。进客厅时，胡乔木也在座。刚坐定，他就指着我对乔木说：这个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转入正题谈钢铁指标落实，对计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见时，我才醒悟到，刚才的话是指我写给他的信为什么要送一份给李富春看，认为我胆子太小了。谈到我的信，毛泽东说，为什么只给他几根骨头吃，不给些肉吃？我这第二封信写是大概很简要（这同武昌谈话说第一封信"观点不明朗"有关），主旨在1959年钢的指标肯定不能完成的理由何在，如不立即落实，后果会如何等。看来，这封信内容被接受了。不然，谈话不会如此风趣。出门时，乔木还跟我谈到，去年赫鲁晓夫来北京，请吃饭时，毛泽东问到："苏联有无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对这种问话，乔木当时是不以为然的。

我同毛泽东谈话后，受到一定的鼓舞，决心进一步提些意见，于是立即写了第三封信。这封信的底稿保存下来了。从南宁会议到上海这一年三个月时间中，我除了自己的水电业务工作外，有一半时间是泡在各种会议和调整计划指标之中，对这种"纸上谈兵"和"画饼充饥"的生活，体会极深；对中央和地方高层决策程序和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及性格

特点等，也略知一二。当时心中最焦虑的问题也即经济工作较有经验的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1959年和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具体落实。我觉得我可以将这点心情和意见向毛泽东透露了。第三封信全文如下：

> 想到几点意见（仍只是几根骨头），供您参考：
>
> （一）在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关于1959年计划的安排（这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几次调整），从成都会议到这次上海会议，大体上涨了五、六次，下降了两次；如果划一根曲线，则北戴河为最高点，武昌为转折点，上海为落实点。这是一个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发展过程。从做计划来说，回忆一下这一年来的情况接受一些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这对于安排明年和今后的计划有很大的好处。中外古今没有过这种大跃进的经验，一年来计划安排的上下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就是今后做计划，应当避免再这样几上几下、大上大下了。对于全国条条块块成万上千做计划工作的人来说，这一年中是极为辛苦的，是颇有苦可诉的。由于计划的上下摆动，长期不定，思想不实，对日常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今年一月的订货迟了，影响到一季度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够好；现在二季度订货还在北京难解难分。
>
> 在这一年的计划波动过程中，也有个思想问题，就是对一些问题不敢大胆怀疑，否则会有离开

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的担心。

（二）也许经过今年一年的工作，可能基本估计出钢、铁、煤炭、重型设备、发电设备等几种重要工业产品年度跃进的可能限度，可能摸清工业交通内部几个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三委（按指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和各工业交通部应当有专人来研究这种限度和比例，以利明年和长远计划的安排，以免今后不必要的几上几下和大上大下。

（三）同时还应当很好研究苏、美、英、德、日等国跃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去年一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带来某些负作用，对苏联的某种“不足为训”是负作用之一。还是要认真研究人家的经验，哪些是必须参考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四）以上这些有了进一步的考虑，对于如何才叫做贯彻了总路线，才可能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例如重工业跃进的限度，主要决定于哪些因素？在哪些部门，这些因素又各占怎样的的比重？这些重要因素如：头年已经达到的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设备能力，当年基建可以发挥的能力，两条腿的作用，重大技术革命的措施，鼓足干劲的能动性，等等。

（五）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着重讲过留有余地和事物波浪式前进的问题。这两条去年大家不大多谈了。留有余地和波浪式前进是客观的东西，违反不了的。做计划工作不应当忘记这两条。

（六）三委和各部门现在就应当有人来考虑明年的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我们现在是用尽全部精力和全部当前条件来赶今年的任务，其间譬如在基建方面，就同明年和长远计划有一定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与安排明年计划有很大关系。尽管还会改多少次，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还是早定出为好。

从当时的气候看，信中所讲的一些意见还是比较尖锐的，讲了"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关系；讲了订计划要避免"几上几下，大上大下"；讲了工业交通内部的比例，工业跃进的限度；甚至讲了"去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某些负作用"；讲了人们担心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而不敢大胆怀疑。可以说，这些话都是直接对着毛泽东的心态而言的。

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胡乔木提醒说，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在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达三个来小时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回顾"大跃进"一年多来的历程，提出十六个问题，评古论今，说长道短，涉及到许多党内上层之间的历史纠葛；讲得疾言厉色，很有情绪。其中讲到第十四个问题即他要找几位秘书时说：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计、经、建

委）二部（冶金、机械）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面乌龟爬上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你们反对得了呀？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人算是好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李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是插野鸡毛的。

讲到这里，毛泽东大声地问：李锐来了吗？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只好应声站了起来。毛泽东说：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头来嘛！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在讲到第十五个问题即要解放思想时，毛泽东又点我的名说：李锐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总不知有哪一天要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戴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王熙凤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舍不得砍掉头，就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岳飞不是砍了头，比干不是挖了心吗？明朝有廷杖制，顶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几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我跟陈伯达讲过，你不尖锐，无非怕丢掉选票。连封建

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无非是开除党籍、撤职、记过、老婆离婚，砍头也只有一分钟的痛苦。风波亭的戏还要唱。岳飞砍了头，为什么不好?

接着讲第十六个问题即党内批评时，毛泽东又借海瑞敢于冒死上谏的历史故事作了发挥。毛泽东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在地下，然后又捡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嘉靖皇帝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有一天皇帝死了，班房里的人告诉海端，恭喜你了，你要出班房了，要升官了。他听了这话以为是假的，他就拼命吃饭吃肉，准备被杀头，以为是要杀头了。班房里的人告诉他，不是要杀他，是皇帝死了。他听了以后哇哇大哭，把所有吃的东西统统吐出来。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

周恩来当场回答：看了。

我自己真没有相到会在大会上受到如此奇特的夸奖。"你坐在前头来嘛"，"给我点肉吃嘛"，"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此种声调、语气、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发电问题时受到表扬，"要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但那毕竟是在小范围讲的。这次是中央全会，坐了满

礼堂的人，而且是满篇怨言、气话中冒出来的称赞。于是我又一时成为关注和议论的对象。一些人对“骨头与肉”不知所云，甚至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红得发紫了。”

当天晚上，见到田家英，同我一样，他和胡乔木等人都对毛泽东的有些说法感到突然和费解。家英甚至说，是否头晚安眠药吃多了。这样谈海瑞，似乎是鼓励人们学海瑞，敢于讲真话，不要今不如昔，连明朝的廷谏之风都赶不上。家英向我谈了乔木的看法：引出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当时我和家英都认为乔木这个看法很深刻，他对毛泽东理解得比较深。（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胡乔木加了一个尾巴。）

我个人再次受到此种夸奖殊荣，自然也感到一种安慰；但心中又怀着一种惶恐，即今后这个“秘书”怎样当下去？能否再这样“若即若离”下去呢？同家英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还是比较乐观的。

第二天，赵尔陆（机械工业部部长）找我长谈了一次，主要谈他们部同冶金部的关系。机械产品的周期都比较长，其数量、品种和质量三者都同冶金部提供的原材料分不开，彼此依赖，互相制约；一年多来，计划的多次改变，重点任务的变化，突击小高炉，突出轧钢机，造成许多半成品，尤其是铁含硫量高，不能使用，等等。他准备将面临的问题，向中央作一次全面报告。1958 年 6 月的华东计划会议，我就接触到机械部的问题，部长助理陈易也跟我谈到同冶金部的矛盾。关于大型电机的制造，主机与配套之间的复杂情况，我多少知道一些。赵所谈的问题与困难，我是很同情

的。记得后来庐山会议时，赵还带了一些不能使用的生铁样品，准备用物证来说明问题，后来会议形势突变，就没有摆出来了。

当时也还有经济方面的领导同志，找我谈同主席接触的经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一点感想这样谈到：还是如实反映情况，不要顾及对方听不听得进去或听后的反应如何，直说比打折扣好。

记得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会上，总理对我写信反映情况，很是赞同。于是我趁机动员他去新安江看看。这是除三门峡外，正在施工的大型水电站，完全靠自力更生，由我们自己设计的（三门峡由苏联设计），72500千瓦一台的发电设备也是国内生产的。4月9日，由我陪同，总理去新安江工地看了半天，留下了这样一句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新安江值得欢呼：施工三年半后的1960年，就开始发电，造价没有超过预算，保证了工程质量，一直完全运行了几十年。水库形成的千岛湖，已优为东南旅游胜地。

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以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面对现实，纠正错误，形成了对“大跃进”运动的节节退却和渐渐降温，这个趋势是好的。谁能料到风云不测，局势突变，庐山会议后期竟然发生那样巨大的反弹，这股纠“左”早潮被更加“左”倾的狂澜完全淹没。我个人“一跌风波二十年”不足挂齿，党和国家遭到的灾难真是太令人痛心了。

毛泽东晚年悲剧细说

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谈到“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他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时，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① 这段话，如实地总结了党的历史。1987 年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过去的错误是在“左”；从 1957 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的是“左”。鉴于历史教训，为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必要深入清理持续二十多年根深蒂固的“左”的错误。不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被那些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唬住，我们就还有可能重犯“左”的错误，再走“政治思想挂帅”、“以阶级斗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5 页。

争为纲”的回头路。

“左”的错误之所以根深蒂固，这同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以下简称错误思想）有直接联系。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历史决议》对此已经作了总结。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还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事实证明，近两年来，确实出现了这种翻腾。不是有人在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必要，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走资派”吗？不是将引进外资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吗？不是在问“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吗？不是将改革开放影射为“实用主义”（“四人帮”批邓用的词汇是“经验主义”，“把经济搞上去是一项指示为纲”），说“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吗？还有一种最露骨的说法：现在要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全国搞大鸣大放，搞大运动。所有这些说法，实质上并无新的创造，都来源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有的连用语都是一样的。总之，对于这些“从左”的方面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干扰，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时刻不要忘记“左”是根深蒂固和主要危险的论断。

为了加深对“左”的历史危害性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有必要在《历史决议》的指导下，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关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我将自己的初步探讨写出来，算是学习邓小平最近谈话的笔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顾名思义，同现在人们常用的晚期思想含义不同，因后者还包括晚年思想中的正确部分。众所周知，有特定科学含义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前进的正确理论体系；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是脱离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左”的错误思想。邓小平 1980 年曾作过这样的区别：“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① 邓小平还说：“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②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45 页。
② 同上书，第 353 页。

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因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理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①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 1949 年以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浓重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在几十年内，中国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最高指导权威，这是历史诸因素所决定的。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从 1957 年开始，直到 1976 年，毛泽东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左右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 20 余年，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国防等一切重要方面，而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历史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和挫折，都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历史性的改革，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就是改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36－837 页。

革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所定型化的、实践证明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从而结束中国社会长达20年停滞、徘徊和混乱的局面，拨乱反正，重新走向振兴。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理论工作方面不能不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进行清理和剖析。三中全会冲破了旧的思想藩篱，人们才逐渐认识清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如何导致实践方面的错误。这在《历史决议》中有概括的原则说明。回顾这十年中间，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和基本原则等等方面，理论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有一些旧的思想框框和旧的思维定式，仍然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深入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及其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还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被宣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其中特别着重宣扬的又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团体，不仅接受其理论而且付诸实践，“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作法就曾经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度掀起过波澜，像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红色高棉”、拉丁美洲的“光明之路”等等。这都表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对它的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

近十来年，许多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视线投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方面，解释庞杂，众说纷纭，派系林立。其中不乏严肃中肯的深刻分析和某一方面的独到见

解，但亦有不少简单肤浅的主观臆测，甚至还有别具用心的曲说。而对此种情况，中国自己的研究者责无旁贷，自然更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一系列问题，作郎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说明，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都将是有益的贡献。

一、简单的回顾

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界标。近几年，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从1957年起，犯了20年"左"的错误，尤其"文革"，是极"左"的错误。现在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以1957年为起点。在1957年以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有关思想文化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上，后来的一些"左"的做法和提法已初露端倪，只是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错误。在这以后的20年中，他一个接一个（当然中间有间歇有起伏）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和设想，以此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充实思想。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形态。

1949年10月，一个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三年时间，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1952年，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如下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很落后和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要同步进行同步完成，从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这就表明，在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贫穷国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并没有使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稍感满足。新中国还是一个婴儿，一个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农业国家，他就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根据国内外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这种条件，毛泽东希望尽快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尽管缺乏经验，最初对过渡时期的设计还是较为稳重的，当时曾设想用 10 年到 15 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使得他愈来愈相信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进而认为农民中有一股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这种积极性可以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积极作用的必不可少的私有经济成分，很快便持否定态度。于是，他开始强调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党的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改造，解决所有制问题，认为“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

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①

这同以前的设想根本不同了。

14年前，1939年的《新民主主义论》谈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阶段。

8年之前，1945年《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经地义。”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并且提出了生产力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6年前，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也反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经济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页。

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年之前，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90%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从这一总的情况出发，重申前言：“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从而谈到，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要恰如其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义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二中全会决定的革命胜利以后的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明确说明，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发展，首先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1949年新政协召开时，通过了一个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其中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规定，都没有越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范围，仍是五种经济并存，

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未提社会主义，当时有党外人士建议写入，周恩来还特别作了说明，要待人民群众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时才能提出。据当时报纸上的报导，刘少奇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 50 年。可是只过了 5 年，1954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共同纲领》就不再有效了。

还应当注意到，在二中全会报告的前部分，谈到“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这里，“资产阶级”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显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这个报告是 3 月 5 日作的，虽然最后也谈到谨防“糖衣炮弹”的问题，但整个报告给人的明确概念是：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可是，据黄克诚回忆，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泽东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是不及格的。① 可见“阶级斗争”这根弦，虽然在公开的文件中未加以强调，但在实践上毛泽东却从来没有丝毫放松过。

---

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65 页。

二、战略转轨——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建立之初，关于如何发展社会化生产力，使生产关系的变革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大家都没有经验。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私人工商业在全国工商业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何况“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论人民主专政》)；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引导农民“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必须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七届二中全会所据以制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对城乡资本主义政策的前提条件，并没有根本改变，事实上，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任务应当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1949 年四五月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提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构想，认为“不要去套书本子”，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经济，不能过早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过早消灭资本主义要犯“左”的错误。1950 年刘在土改报告中说，保存富农不是暂时权宜之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如此。对这些说法，毛泽东都是曾经肯定的。1949 年 7 月，毛在中央团校向毕业生讲话时说，20 年后，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形转入社会主义。1950 年 6 月，他在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批评了“有些人认为可

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随后在1951年刘少奇曾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认为“这个阶段大略有10到20年之间”，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这个时限和方针曾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的。

土改刚刚完成时，农民大都成为中农，新式富农很少，不久，在老区开始出现土地集中和雇工现象，农民本性要求发家致富，但怕“冒尖”，怕说“剥削”。1950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之初，关于农村合作化道路、私有制的保存和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等问题，中央内部主要是毛泽东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意见。刘认为农村合作化，应先通过农民自愿集资入股的供销合作社，组织并提高农业的生产力，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导农民从小土地所有制过渡到专业分工的社会化生产。基于这种认识，刘批评了当时东北和山西急于组织合作社的做法，认为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则是担心农民的自发势力走向资本主义，土改后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应当趁热打铁，利用这种政治优势，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走集体化道路。他认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这场争论的结果，产生了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毛泽东在1953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城市的“五反”运动中，报纸上曾揭发出不法资本家各种违法活动，集中暴露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丑恶思想。当时的舆论宣传对民族资产

阶级这一消极面，有所夸大，其实不法资本家是少数，多数还是守法的。由于当年革命胜利的形势，本身的有利条件，加之政府的支持，国营经济生气勃勃，生产情况一般优于私营经济。在农村中，互助组同单干户之间，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为解决日渐紧张的市场供需矛盾，上上下下也就自然认为，加快农村和城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是理所当然之事。直到取得“五反”胜利以后，1952年10月25日，周恩来同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还这样谈到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①

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能遵循的，只能是马恩列斯特别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苏联的既有模式（当年毛泽东最重视的，也是要求全党仔细研读的经典著作，是斯大林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共产党宣言》中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理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哥达纲领批判》上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又只能依靠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即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马克思也不可能具体预见到一百年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情况），才能建立和发展。离开这一前提就将成为空想。这就是说，同社会主义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35页。

相亲相近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对于这一天经地义和我们自身的天然弱点，我们似乎是明白的，实际上是不承认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由于其客观物质性和历史继承性成为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最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决不能说毛泽东不曾认识到这个前提和基础，前述1949年以前关于中国落后的论述，是越来越具体的。但问题在于，这主要是来自书本的比较抽象而简单的认识，且对于西方社会化大生产缺乏亲知，远不如一个世纪前在伦敦写《资本论》的马克思，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都无法与之相比。随后的事实说明，毛泽东所最关注的，却恰恰不是这个前提，而是怎样变更生产关系；不是这个基础生产力，而是阶级斗争。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经验，毛泽东认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他还认为东欧土改由于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恩赐，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因而农业合作化搞得慢。从1952年下半年起，他就在考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朝鲜战争引起的必须加快建设的紧迫感，考虑中的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在于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以及他经常所说的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在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党中央内部的思想认识虽然还不一致，但肯定斯大林和苏联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则是基本相同的。在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会议和8月12日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他在

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讲话中批判了刘少奇等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不妥当的，不对的，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武装革命的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①

到这年12月，经过毛泽东两次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界说，又作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开始。第二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总路线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提出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三年恢复后国营经济的比重已占优势，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是现实任务。这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1952年国民经济总水平只相当于1936年所谓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个社会生产力的起点是很低的，中国还是一个很贫穷很落后的农业国。于是，本来富有中国特色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页。

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束之高阁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也不再存在了；于是，按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在战略思想上作了根本的变更，就完全不同于二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不认为在中国还必须让资本主义有一个适当的发展，不认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还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样，就离开了中国国情，同时也表明指导理论是斯大林学说。毛泽东后来证实道："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① 在中国革命长期复杂的斗争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彻底批判"左"的错误，从而统一全党思想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在总路线的执行过程中，他却无视实际情况，从主观的革命理论出发，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不断批判"右倾"，逐渐走入了一个"左"的思想误区。

三、前奏曲——三大改造三年完成

1955年下半年，不顾主客观条件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违反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不满意邓子恢（实际是刘少奇）等稳步发展的正确方针，毛泽东终于发动了反对农业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走路，即所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

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造成一种声势、一种压力，使得农业合作化运动很快出现“高潮”。同时，他提出，中国的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完成；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①] 1955 年 9 月至 12 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 100 多篇按语，以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学说为依据，其中就提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会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②] 据说：在写这一百多篇按语和编辑《高潮》一书的过程中，毛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认为农村中出现的这种农民要求合作化的“高潮”，其意义有如 1949 年革命的胜利。他确是过高估计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过于相信各地报来近乎没有经过核实的书面材料。对推动生产关系变革，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在毛泽东看来，不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是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而政治工作的内涵主要是“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②]他举例说明：“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③]由此可见，过渡时期

① 同上书，第 5 卷第 223。
②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58－259、244、页。

总路线，关于阶级矛盾分析中的一个偏差，是认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这一判断，带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既未能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同时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毛泽东离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超越阶段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以及夸大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的思想，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就有了某些表露。由于领导农业合作化已有相当的实践经验，且跟苏联作法不同，初级社这样的形式农民还是可以接受了，农业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且有所增产；三大改造采取大体平和的途径，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又由于对私人工商业是采取赎买政策，三大改造的某些内容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援助，及其他各种原因，1953 年 - 1957 年的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发展。所以，毛泽东的这些过激思想在实践中的不良后果，一时也没有很显著地显现出来，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关于 1956 年的三大改造，《历史决议》这样论及："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 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 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1953 年 6 月 15 日的讲话中，说到 15 年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

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① 15 年的计划 3 年完成，当然过快、过急、过粗。这里至少有两点可以指出：一是，过快、过粗就意味着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过早公有化，则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和流通两方面都受影响，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未起到的历史作用，也就消灭了。于是就造成了从生产、流通到消费，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局面。二是，应当存在并有发展前途的多样化经济形式被扼杀，单一的公有制，大锅饭、铁饭碗，后来长期带来一系列弊端，不仅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难以在经营管理方面创造出新的经验，管理人才（企业家）也难于涌现出来。正是由于起点低、底子薄，以单一公有制承担工业化任务，这种缺乏物质基础的超前变革，也是导致后来“三面红旗”以及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因。当然，三大改造毕竟在震动不大的情况下，完成了生产关系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经过 20 年大起落大折腾之后，我们才认识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之后，急促过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合格的，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还得努力几十年或更长时间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才能算是合格的社会主义。现在学术界对三大改造问题已有一些新的看法，应当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

如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观点来回顾 50 年代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研究：这条过渡时期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82 页。

总路线，是否提得过早了一些？尽管具有种种政治优势，在中国如此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是否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义社会阶段？是否应当如此匆匆忙忙消灭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济？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学说，阶级剥削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能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被消灭。在没有具备消灭剥削的物质条件以前，剥削也还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是不能绝种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已为我们今天初级阶段的实践所证明。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段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 列宁对此有过切身体会，因为犯过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1921年，他提出新经济政策之后，就完全否定了那种"直接过渡"的观点。晚年对此有过许多论述。他认为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不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消灭剥削，改组整个社会经济，而是发展生产力，建立大工业基础，否则，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为改造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必须采取"改良主义方式"，通过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曲折迂回的途径，来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晚年不再强调小农生产是资本主义复活的基础，而认为不应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奢望向集体化过渡；要善于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通过商品经济的交换来巩固工农联盟；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组织形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式；在大机器将农民改造过来之前，要允许农民的经济自由。此外，他还认为在过渡时期，通过国家的调节监督，在一定限度内，应容许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实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赛；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学会经商。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还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不应当再放在政治斗争方面，而应当转向文化建设，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消灭文盲，建立相当的物质基础即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正是由于政治变革、社会变革先于文化变革，在一个文化不发达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历史的遗憾在于，我们党对列宁有关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曾不能不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所有论述，只是当作恢复国民经济的一种暂时的、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政策。而在他开始独掌大权的1927年，就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结束了苏联历史上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正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人开始反思几十年的经验教训。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给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供了独立思考的条件。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前面五个讲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矛盾，后面五个讲政治、思想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都初步提出了一些新的方针，正式表明他要寻求一条不同于苏联发展道路的意向。他说：我们的任

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的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①] 从而探索"适合中国的路线"。[②] 5月，他提出了旨在促进科学发展和文学艺术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稍后，又提出了处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文件表明，当时中共中央是考虑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提法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报告中，都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肯定。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关系、主要矛盾，并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这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中心工作，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八大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各项政策，坚持了党中央1956年5月提出的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据此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此外，还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正确方针。关于党的建设，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
② 《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即对反对个人崇拜有保留。不过，众所周知，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当时还是表示赞同的。在八大期间，他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到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说："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但斯大林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基本点就是用民主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认为，这是他接受了斯大林错误的教训而提出的观点。不过，两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仍是阶级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既然有了宪法，是法治国家，处理对抗性矛盾，就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镇压的对象应该只是刑事犯罪分子。大量犯罪分子在人民内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只问犯罪事实，而不问阶级成分。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时代的产物，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关于两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是前人所没有论及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历史贡献，当时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

但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仍处于一种矛盾、动摇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

话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① 这是真的。例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中，他不再提及八大所明确提出的中国人民现时的主要任务，只笼统地提到所谓"向自然开战"。在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就换了新的提法，更表明了他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摇摆和变化。对于他曾经同意过的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又不以为然了，认为我们的经济问题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的前进。于是提出"反'反冒进'"，强调"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②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成为经济建设的"促进委员会"。毛泽东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但对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以后，必然出现大量经济矛盾却又缺乏认识。以上这些先后出现的现象，实质上表明，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急过快，与中国共产党人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两者也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对于"生产关系是否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的问题，当时哲学界曾发生过疑问和讨论，即如此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容纳如此高度公有化的生产关系是合理的吗？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吗？可是，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当年没有允许认真展开讨论。

关于这个思想的渊源，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矛盾论》，其中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69年8月版第8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5页。

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然，《矛盾论》中的这段论述，并没有违反唯物论，且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但是，这里“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反作用”两词，究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唯物史观，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表达的十分明确，毫不含糊；他还举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本书为例证，以及《资本论》的许多提示，“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据此从理论上严格说来，《矛盾论》中，生产力、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却可以“在一定条件之下”，两者互易其位，后者也能起“主要的决定

的作用"，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在这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当然，从文字上看去，两个方面都顾到了，一般说来是如此，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是如彼；但是尽人皆知，在法律条文中，"但书"是更受重视的内容。实践所表明的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是把改变生产关系放在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地位。早在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问题上，他肯定了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批评了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特别迟缓速度"的观点，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① 随着当年国内外相继发生一些复杂的政治事件，更促使毛泽东的思想很快回到了战争年代传统思维方式和领导方法上，脱离实际情况而陷入"左"的误区，片面地过分地夸大变更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终于从主观愿望出发，随心所欲不断变更生产关系，不断搞穷过渡，在高举"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接连"超阶段"，造成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后果。实践教导我们，不顾实际可能的"超越"，实质仍然是倒退和落后。这种错误思想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起劲地大批"唯生产力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被称为"唯生产力论"，而对之加以挞伐和批判。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说到。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页。

四、反右派斗争及其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后果

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问题曝光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些波折，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社会动荡，我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工人、学生和农民闹事事件。当时毛泽东认为，国内少数人闹事仅仅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也察觉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执政党的地位使干部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运动。早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要继承党的光荣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他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① 因此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就是要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1957年4月27日，党中央发出整风运动指示，“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方法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② 为了发动党外人士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9页。
② 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提意见，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提出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要求大家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否则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此外，还谈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这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拥护共产党和佩服毛泽东的，他们响应了党的号召，一心一意想帮助党整风。例如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傅雷，在出席宣传会议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给国外留学的儿子写信，称赞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到了化境"。① 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13次，70多人次发言；5月15日至6月8日，召开工商界座谈会25次，108人次发言。根据中央指示和毛泽东的要求，大家的发言绝大部分是善意批评和积极建议，中间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如学校领导体制、文字改革问题等），许多意见切中时弊，不少人是打破了顾虑才敢发言的。在这些会议上，知识分子发言内容大体有以下方面：批评1956年的冒进，保守与冒进何者损失大；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肃反运动和历次运动后遗症的处理；法制建设，应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重视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靠专家学者，党委制还是校务委员会制；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党内外干部一视同仁；加强统战工作，虚心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等等。其中也有很少的错误言论。据李维汉回忆：两个座谈会反映出的意

① 这种情况，《傅雷家书》1957年3月到5月信中有充分反映。

见，都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论调都出来了。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氢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据李维汉的说法，在这次汇报之后，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当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① 毛泽东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政治上很敏感。早在波匈事件后，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一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着重考查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一些教授中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② 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为了清除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便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

《事情正起变化》首先谈到，共产党内有右派——修正主义者，他们“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央党史出版社1958年版第831-8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页。

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在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① 文章中谈到对右派应当扣帽子，但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能扣。“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② 关于广大知识分子中包括民主党派中有右派，早在 1949 年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来过：这些人即“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不属于国民党反动派，应在人民内部通过批评斗争，教育改造。

反右派斗争，从 6 月 8 日正式开始。当天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7 月 1 日又发表了他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他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25 页。
② 同上，第 435、431 页。

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对共产党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猖狂进攻”。并且公开点了所谓“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硬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①] 于是，一场狂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整风初期用来和风细雨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想法，突然转变为狂风暴雨对待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开会，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中右派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②] 后来，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归为一类。

对于社会上确实存在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历史的教训在于，一旦搞开了运动，上下一起头脑发热，斗争就必然越来越扩大。各地上报，中央通报，全国右派分子“虾兵蟹将，凶恶鲨鱼”，数量越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1958年的统计是从30万人增加到40万人；1959年中央文件说“约45万人”；20年后改正时，复查统计为55万多人。这个数字，为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九分之一左右。这场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其严重后果，李维汉说道：“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5页。
② 同上，第456页。

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这一场斗争的后果，还不只是全国有55万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包括被株连的家属就是几百万人），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它以强力推行了一系列“左”的观点，使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更具有系统性；根据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促使他认为推动社会前进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他概括出这样一系列“左”的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

其一，反右派斗争“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①] 从此，政治思想被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在事实上，把知识分子看作一种异己的、必须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从此开始执行了这一条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同时这也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依然存在的理论根据。

其二，改变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1957年6月，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作为已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指导文件发表时，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页。

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 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这种论断，又写入了第二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里，并作了进一步的强调。

其三，改变八大对我国阶级状况的看法：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是敌人，右派就是其代理人。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状况所作的错误分析，正式提出我国依然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论点。[2] 除被八大宣布已经消灭的剥削阶级还继续存在之外，又把"资产阶级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入了剥削阶级行列。

其四，改变党对过渡时期时限的规定，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作为结束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全国城乡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

---

① 同上，第417页。

②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

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①] 八大二次会议对过渡时期的提法更明确，认为“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③] 对过渡时期时限的这个提法，为后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改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视为过渡时期，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过渡”理论埋下了伏笔。

其五，提出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某种策略。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创造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都可以用这种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明确表示：“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反右派斗争时，凡属提出不同意见，都视之为向党“猖狂进攻”，采取“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对敌斗争策略。毛泽东曾指示各级党组织，在两三个星期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②] 这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毛泽东自己十分欣赏，把它称做“阳谋”，认为“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正是这种策略，使冤狱遍及神州，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也从此生长。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468、464、436页。

五、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

在毛泽东看来，反右派斗争这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出现的“搞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问题，可以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了。1957 年 10 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股劲鼓起来了。”① 他认为，胜利地完成整风反右运动，“将使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② 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对 1956 年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表示不满，认为下半年这一股风，批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明确表示，要恢复被扫掉的这三大件。”③ 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和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将反冒进提到两条道路原则高度，进行批判。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说他们反冒进犯了方向性错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离右派只有 50 米。成都会议上提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断然规定，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不能提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94 页。
② 《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1 日社论《乘风破浪》。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74 页。

冒进。仅仅这样还不够，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大批“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拔白旗、插红旗”，以“不断革命”的理论，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开展。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时解释：“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同时强调“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对建设速度具有决定的作用。① 这个时候，根据战争年代的经验，毛泽东特别强调“政治挂帅”，以政治思想决定、促进经济技术：“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从而批判了斯大林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强调政治决定一切，群众决定一切。这样，总路线就完全将客观经济规律搁置一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很短时间里，“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狂飙骤起，云海翻腾，浮夸风、瞎指挥、高指标迅速泛滥。各地农村争相出现高产“卫星”：徐水县“小麦亩产12万斤”，“一棵白菜500斤”；湖北麻城县溪河乡早稻亩产36956斤，等等。1958年7月，中央农业部发布1958年夏季粮食作物生产公报，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上年增长69%。《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社论，说是“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② 这篇社论的思想被归纳为两句歌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有著名的科学家也在6月份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加

① 《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社论《力争高速度》。
② 《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以论证，说人类对太阳光能的利用，只要达到若干分之一，甚至比这种神话数字更高的产量也是可以出现的。毛泽东是相信科学家的话的，他甚至一时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样一种新的忧虑。当时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只让1/3耕地种粮食，1/3种观赏植物，叫做“大地园林化”，1/3轮休，名为“少种，高产，多收”的“三三制”轮作制度。这个想法写入了1958年12月在武汉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文件里。有些地方迫不及待实验，吃了大亏。毛泽东在写给 地县社队小队6级的一篇《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中说：“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① 于是《人民日报》即据此连忙发社论，说这种耕作制度是将来定要实行的，在目前条件下不要急于推行云云。生产上追求高速度必然产生浮夸风，反过来，浮夸风又造成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虚假现象。对各地统计的高指标，当时毛泽东是很欣赏的。他认为，1958年如果能增加1000亿斤粮食，哪怕700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了过来了。当时，感觉到这里边有问题的人还是不少的，只是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一些人已被打成了右派，剥夺了发言权；另一些人看到几十万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都不寒而懔，干部和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使这一切荒唐事都得以通行无阻。当时报刊社论说，这场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大跃进”开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版）下册，第811页。

辟了道路，这倒是确切地说明了这二者的关系。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仍在“一边倒”，不能不学苏联。那时不仅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这种“一边倒”的学习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1956年论“十大关系”之后，特别是“大跃进”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就逐步构想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毛泽东决心独辟蹊径，寻找一条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① 为此，他想出来的不同于苏联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人民公社。1958年初，他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二三月间，同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将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公社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15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十分乐观满怀信心地说：在中国这张白纸上，“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②4月底在广东时，同刘少奇谈到公社问题。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大同书》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消灭私有财产。毛泽东认为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在“大跃进”时，他多次有过消灭家庭的想法。八大二次会议上，有人在发言时转述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谈到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3。
② 《红旗》1958年第1期。

民公社时的具体构想。他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1958年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刊载了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为纪念建党37周年而作的一篇讲话：《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第一次公布了毛泽东要建立人民公社的思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8月初，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时，看到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感触颇深地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随后，到山东时，他又一次说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①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民大国，强制地将生产关系变成为纯粹公有制，并通过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基层单位，靠这样的社会组织，实现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实质上不过是历史上乌托邦主义所描绘过的图景。毛泽东则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他青年时期受到康有为《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等的影响，曾为文谈到建立"新村"

① 《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农村》。

的设想，从中可以发现不少他后来的人民公社思想胚芽状态的东西。《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如：设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男女成年的，由政府指派分担农工等生产事业；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死则火葬，等等。毛泽东1919年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新村”的想法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中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工作之事项”规定有：“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等。① 这岂不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的有关大同世界设想，其中哪些可以实现，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幻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之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的年代，毛泽东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是一国之主，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会问题时，他还讲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地大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1958年12月，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将《张鲁传》

① 原载《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12月）。

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斗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很欣赏的，将这些东西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推到了顶点。会议对农业生产形势做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宣布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粮食总产量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棉花产量达到7000万担左右，农产品产量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按当时生产水平，全国每年至多只能增产粮食100亿斤，而达到上述数字，1958年应比上一年增长60%－90%，显然无法做到。基于粮食产量的这种荒唐估计，会议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根据冶金部的设想，大办“小土群”，大办小高炉、小转炉，宣布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为实现这一任务，提出了“全民大办钢铁”、“以钢为纲”的口号。一声令下，各行各业动员，9000万人上山，土法上马，耗费巨大资财，生产出大量不合格的生铁，就合格的钢而言，只完成计划指标的3/4。而且大砍林木，作为土法炼钢的燃料，倾刻之间，使全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大为减少，乃至名贵树木也砍伐一光，从而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9000万人上山，也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使得许多地方粮食丰产不能丰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

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① 到10月底，有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0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1.2亿多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于是一两个月内，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北戴河会议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各省的同志回去，还传达了毛泽东随口讲的一些话，如：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5－7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东西调不出来，要点强迫命令，等等。

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当年加速向"左"转的一个新高潮的顶点。会议期间多次讲话，都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大大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意气风发，争作贡献；而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于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他认为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说：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我们要带头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

当时，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中国社会

①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伴随着“三面红旗”的无所不在，人们日益陷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梦幻中。北戴河会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于是，不少地方争先恐后，急于进入共产主义。有的把过渡时间定为一年，有的定为两年，有的甚至连几月几日结束社会主义，几月几日进入共产主义，都定得一清二楚。1958 年 11 月 6 日，毛泽东看到山东范县上报的一个材料，该县 10 月 28 日召开了万人大会，会上县委书记宣布“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标准是粮食亩产两万斤。这位书记还形象地描述了进入共产主义后的图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后来陈伯达到范县去过，发现一些问题后，《红旗》杂志社再派人去调查，弄清了实情。（在庐山会议前期，陈伯达反映过范县浮夸情况，后来一批彭反右，陈又大为后悔，并反戈一击。）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不管主观愿望如何美好，理想社会的景象描绘得如何令人陶醉，这种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与实践，决不可能达到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反而会降低其发展水平，并造成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紧张与混乱，从而受到惩罚。三面红旗运动沸腾了半年，一大堆问题便接踵而至：国民经济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全面紧张，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严峻的现实同乌托邦的理想

发生了激烈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寻找解决问题的决策。1958年11月到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发现了“大跃进”中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等所引起的严重问题，于是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主题就是纠正那些明摆着的“左”的错误。如整顿了公社所有制，对群众退赔，削减一些过高指标，等等，以便放慢速度，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废除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上海会议时，他还鼓励人们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不怕犯上。可是，这并不说明毛泽东承认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试验的失败，此路不通。他对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依然采取他所惯用的形象估计：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仍然坚持“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这“三面红旗”是对马克思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决不容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不断加以纠正就是。毛泽东的认识，也是当时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而且有的负责干部头脑更热，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他花了大力气，才使那些头脑更热者稍稍冷静下来。当然，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也有不少同志头脑比较清醒，开始对运动产生疑问，也从理论上考虑一些问题，对纠正“左”倾错误做法要求更迫切一些。在这种背景下，1959年7、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中全会。历史的不幸是，庐山会议不仅没有达到继续纠“左”的预期目的，反而使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发展到更加错误的阶段。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不同意一些人不愿多谈缺点、深究错误根源的态度，力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上书，提出总路线、“大跃进”出现失误，原因在于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张闻天的长篇发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归结到关键问题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他批评过去一个时期，“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① 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正确意见，恰恰不能让毛泽东接受。经过康生、林彪和某些人的曲解挑拨，甚至居心叵测地推波助澜，上纲上线，更促使毛泽东认为，彭、张等人的意见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对“三面红旗”的“猖狂进攻”；是对他的领导的挑战。于是，转而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错误批判。

错误的实践又引导出了错误的理论。八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作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1 页。

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斗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① 由此，把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两大阶级对抗、两条道路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观点，直接引申到了党内，直到中央。毛泽东把彭德怀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批评，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庐山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国有三百八十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发展，斗争范围由党外转入党内，矛头日益对着党内领导层，最后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当年危害的后果，更直接表现在经济上。各地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舞下，1960年继续坚持盲目跃进，使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社会生

① 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

产力受到进一步破坏。因此，造成了1956－1961年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大跃进"三年中，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造成财政赤字大增，通货膨胀，人民必需消费品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以致许多地区浮肿病流行，发生大量饿死人的事情。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基建投资增加了近两倍，积累率从25%提高到40%，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农业总产值下降23%，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55%下降到33%。这几年农业年增降情况：1958年不过增长2.4%，1959年下降13.6%，1960年下降12.6%，1961年下降2.4%，1962年粮食产量降到1951年水平。重工业年增降情况：1958年增长78.8%，1959年增长48.1%，1960年增长25.9%，1961年突然下降46.5%，1962年再下降23.6%。

六、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对"三面红旗"导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毛泽东不是没有认识到的。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九中全会上，他反复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具体谈到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努力，在毛泽东的赞同下，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时间内，实行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从"全面大跃进"进入了调整阶段。实行这个方针的

初期，大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并没有能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切实可行的程度。经过1961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后，1962年1月，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切实贯彻“八字方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参加者有中央到省、地、县，以及各重要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这次大会比较好地贯彻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中，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由中央承担了责任。他号召大家讲老实话、当老实人，凡对中央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倒柜而出”。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了更正。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上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而放弃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他还说，“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而放弃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他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这些讲法表明，在口头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似乎比“大跃进”狂热时期的想法跟实际接近了一步，可惜，他并没有触及自己“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他把经济建设失误的原因，归结于缺少一

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方法，认为只要我们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取得胜利。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这一点。”[①] 对于“三面红旗”，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和地方的好些领导干部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公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委婉地表达了对坚持“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在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②] 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这种态度，得到中央和地方大多数负责人的支持。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肯定“三面红旗”前提下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毛泽东都根本听不进去，现在这样直接或间接之提出质疑，按理他更难容忍。可是，国民经济仍在严重困难时期，广大干部满肚子意见，大会又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中进行，于是，毛泽东对此保持了沉默。只有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别具用心，他反复强调，出了问题，造成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对林彪的这种“保护过关”，毛当然是极为满意的，他当时就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2、828、829、830－832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6页。

对在座的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这些你讲得出来吗！

这次大会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但可以说，推动了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保守”同冒进的冲突、理性同盲目的冲突。党内矛盾虽然被暂时掩盖起来，实际上却潜在地激化了。1967年，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曾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番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稿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不过那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还说到，自这次大会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我们党内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白说到：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警惕出修正主义，就是针对他们说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措施，充分估计到实际困难，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紧张局势。可以说，调整的成效客观上是对“三面红旗”，对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的实际批判，毛泽东对此却感到极为不安。这种靠“八字方针”而不是靠阶级斗争，靠经济措施而不是靠政治挂帅所取得的成绩，使他产生了某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用当时的语言 ，就是“党可能变修，

国可能变色”。加上当年中苏矛盾重新激化，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等等因素的出现，使得毛泽东对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有进一步的变化。相隔才半年，1962年八九月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就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又重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说，“阶级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我国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他甚至作出这样的估计：“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来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他认为刘少奇、陈云等不该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因而指责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黑暗之劲，鼓单干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反革命、党内的坏人就露头了。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前一阶段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并得到邓子恢等支持的，在某些地区农村开始实行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和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指责为“单干风”，进行严厉批判。把彭德怀为澄清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里通外国”等不实之词，于全会召开前写的长达八万字的申诉信，视作“翻案风”，进行批判。于是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构成

了其后导致“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反映在经他审定和改写的十中全会公报[①] 中，有如下两点：

第一，进一步更改过渡时期的下限，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都属于过渡时期。次年6月，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发展了“大过渡”的观点，进一步断言：“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②] 第二，认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据此，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号召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将以上内容确定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不久，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口号。这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断定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无不受阶级斗争支配。这说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更为系统化了。当

① 《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② 《人民日报》1963年6月17日。

然，错误的理论又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至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其区分与界限何在，这是没有说清也说不清楚的，以至于后来连农民打柴、捕鱼、卖鸡蛋、种自留地等，都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总之一切以“三面红旗”、兴无灭资为标准，违反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资派”。

回顾历史，这时，毛泽东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的摊牌，可说正在酝酿中。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和判断，于是十中全会决定开展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① 稍后，又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政治批判。这是根据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的这样一句话而引发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反过来又为错误的判断提供依据，使毛泽东晚年指导思想越来越脱离实际，对整个工作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从反右斗争开始，这种“左”的理论和“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可谓愈演愈烈，党内党外，步步升级，终至于控制全局，无法回头。下面可以排一个八届十中全会后，这种一步步升级的时间表：

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时，向全党提出：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

① 指在公社和生产队清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

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① 他在另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他认为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

1964年2月，他在一次谈话时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包产到户）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都抖落出来了。

同年7月，他修改定稿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中写道："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②

同年12月，他在一个指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

1965年1月，正式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中，令人注目地第一次出现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刘少奇曾反对这个提法），为一年以后揭幕的"文化大革命"准备好了指导理论。

同年6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

同年八九月间，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说：

---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② 《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0月10日，他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造反嘛。

1966年3月底，他同康生等人谈话时，号召"向中央进攻"。谈话要点5月间上了中共中央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毛泽东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干部）的分歧，是从1962年开始显现的。先是对"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看法上的分歧，随后是在中苏论战中，对修正主义没能作出准确的解释。他将庐山会议出现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叫作中国的修正主义，定性为对抗性的矛盾。后来又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主张，扣上所谓"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等帽子，当作修正主义去批判。正如《历史决议》指出的："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①

"文化大革命"前夕，阶级斗争的注意力和斗争矛头，已经愈益集中到党内和党中央领导层。在这以前，在开展"四清"运动之初，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认为，农村有1/3以上的政权已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有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

①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18页。

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找寻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后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话：“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们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① 由此可见，1962 年以来，刘少奇等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时的一些意见和做法，已经使毛由不安转为愤怒，决心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以保证中国沿着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1966 年 5 月，毛泽东终于发动和领导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

① 毛泽东：《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 年 4 月 28 日）。

七、“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最完全的体现

据前述60年代前期的国外形势，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他感到过去在农村、工厂、学校和文化界进行过的种种斗争，以及反右倾之后的社教运动（四清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一种更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的运动，来揭发党内党外各个方面存在的阴暗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思想认识上正本清源，“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样，他便逐渐将注意点集中到党中央内部，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方针路线，是反对“三面红旗”，搞修正主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他所执著追求、为之奋斗不已的，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并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实质上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只有不断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才能建设并巩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主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曾说：这样的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好多次。康生、陈伯达之流的理论家，将这种错误的“左”的理论和实践，尊之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为继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林彪则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达到如此严重程度，从理论上考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理解有误或奉为教条。首先，是对过渡时期理论作了错误的理解。马克思最早提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50年代初，党所设想的过渡时期不是很长的，随后15年改造3年完成，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之日就进入社会主义了。这就说明，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上有偏差。忽视了生产力的标准，不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而只考虑了生产关系一个方面，认为只要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就“进入社会主义了”。经过大跃进的巨大挫折之后，认识到经济建设之艰难，客观经济规律不可违抗，不能再随心所欲干下去，却又走到了另一面，感到过渡时期不是很短，而是很长了，而且越来越长，要一百年到几百年，乃至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样，仅仅属于过渡时期的矛盾和范畴，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所谓“小生产每时每刻地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等，统统搬入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公有制经济已占统治或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是，从1957年反右派之后，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化，直到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斗争的“文化大革命”出现。

其次，如前所述，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认为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因此，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为畏途，否定物质和利润效益原则，不断在城乡经济领域中开展阶级斗争，“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且，受到的抵制越多，就越向“左”转。把党内有关思想认识和方针路线不同意见的争论，

统统归之为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属于两个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的口号被用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最后，认定党内已经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在中苏论战导致的国际共运的分歧中，通过“九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左”倾纲领，把他在国内的一些做法加以理论化，要求国际共运接受。他以“反修防修”为口号，可是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提出一个准确的解释。按照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他把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60年代初所进行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如：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经济核算，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讲求经济效益，进行物质鼓励等，视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可以认为，那时他所说的“反修防修”，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点的表现。“九评”通过评赫鲁晓夫翻了“八大”的案。“八大”曾肯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九评”却断言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由于全盘否定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否定了反对个人崇拜，也就无形地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扼杀了任何对党的领袖批评的可能。既然，“反对个人迷信”成了识别修正主义的一个标志，这就给林彪钻了空子，大搞“句句是真理”的“红海洋”，宣扬对毛泽东光“信仰”还不够，还要“无限信仰”，直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为一个带有严重封建迷信和宗教色彩的造神运动。

毛泽东过去曾多次批评过斯大林，批评过斯大林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以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的“左”倾思想等。但到斥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后，又批评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见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就是说，斯大林不是“左”了而是右了。因此，康生就投机迎合，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还不够！最大错误是没有把赫鲁晓夫搞掉。因此，自然要防止再出赫鲁晓夫，一旦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林彪就高呼：“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为了找出这个莫须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惜一切代价，把全党全国引入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用“反修防修”的标准来找阶级敌人，按多年来政治运动的经验，首先还是所谓右倾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各界的知名人士或学术权威。因为，他们总喜欢说三道四，“制造舆论”。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反映来看，那些在“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鼓励下，讲了一些真话的人，都被认为是对“三面红旗”动摇和持反对意见者。除知识分子外，眼前最危险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上层（参见同斯诺的谈话）。于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部分人，自然成了主要革命对象。不过，同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撇开党委，直接“发动群众”闹革命。这样，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互为作用，两者本来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壤上扎根就特别深，因而，“造反有理”一声令下，千万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中华大地，一夜之间，恶浪翻滚，千千万万“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坠入史无前例的“群众专政”的无边苦海。

正如《历史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所依据的“左”的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两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当时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还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1967年上海发生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造反派全面夺权。毛泽东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从此夺权之风弥漫神州，各级党委荡然无存，无政府主义横行无忌。在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唇枪舌战的派性斗争发展为兵戎相见的大规模武斗，最终酿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动乱局面。1969年召开的“九大”，全面肯定了“文革”的“丰功伟绩”，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思想，说成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写入党章“总纲”。“九大”之后，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又引起新的混乱。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震惊，人们从革命狂热转入冷静思考，对“文革”怀疑和抵制的人越来越多，这本是结束这场荒唐“革命”的一个良好时机。但毛泽东仍坚持这场“大革命”是正确的，加以“四人帮”的干扰，“九大”的“左”倾路线得以延续下去。1971年9月，林彪事件之

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并加强经济管理，以扭转混乱局面。根据毛泽东当时说过的，“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周恩来同时在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可是，批“左”怎么能同“左”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的相容呢？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四人帮”大兴问罪之师，不久就传出，毛泽东说林彪是“形左实右”，当前任务主要是反对林彪的“极右”。“四人帮”将矛头对着周恩来，大反所谓“右倾回潮”，说批极“左”思潮，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此批林只能批右，不能批“左”。批“左”成为禁区。1973年10月，党的“十大”全面肯定了“九大”的路线，规定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在修改党章中，“左”的东西还有新的发展。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他多次提出“批孔”问题，以深挖林彪的思想根源。于是1974年，全国开展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目的在借此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以防止“右倾翻案”，出修正主义。“四人帮”乘机又煽风点火，搞所谓“儒法斗争”，批“现代大儒”，实则是：假批孔子，真批“周公”。当时周恩来病重，毛泽东阻止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邓小平于1973年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从1975年开始，由邓主持党的各项工作。邓小平提出，当时党的各项工作，要按毛泽东最近讲的三句话办事，即：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互相联系，

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这是又一次结束“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良好机会。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中，坚持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着手扭转“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对工业、交通、农业、科技、军事等各条战线，立即进行有效的整顿，首先是整顿陷入严重混乱的全国铁路交通秩序。他在一系列会议和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和理论：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用25年时间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国家大局。全面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建立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尽快解放老干部，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要定安团结，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抓规章制度建设；要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科技是生产力，科研落后会拖国民经济后腿。他还特别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掌握精神实质，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经过各条战线的整顿，全国形势尤其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出现了新的转机。

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又总是担心否定“文化大革命”，忧虑中国出修正主义。1974年12月26日，他同周恩来等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认为，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等等都不平等，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只是农民小生产会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在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而且“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些观点充分表明，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思想在经济方面还在继

续发展。1975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这场“左”的理论学习运动，再一次为“四人帮”的反扑提供了机会。他们反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鼓吹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经济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以此攻击周恩来、邓小平。这期间，毛泽东开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觉察到“四人帮”继续搞帮派活动。但是他仍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成绩还是主要的；认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衰年病重的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和混乱局面作全面整顿，他摆脱不了“四人帮”的挑拨，认为邓小平只抓经济这一“纲”，放弃了阶级斗争。随之“四人帮”传出了最高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于是“四人帮”加紧煽风点火，诬蔑全面整顿是“右倾翻案风”，是“复辟”，诬蔑恢复老干部工作为“还乡团”，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复辟派”、“投降派”；攻击进行四化建设是搞“资本主义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十年动乱时期最后一次“左”的错误思想掀起的全国性风浪，不过，它已是完全背离民心与党心的强弩之末了。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覆灭。在这之后，还曾出现“两个凡是”的主张；在对“四人帮”定性的问题上，也有“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一说（见华国锋1978年2月14

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一大”还重申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真理标准的讨论因此遇到重重阻碍。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因为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在此不作细说。从这里也可看出，尽管形势大变，“左”的东西依然阴魂不散，足见其何等根深蒂固。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中逐渐趋于完整的形态。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对这一理论不断进行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将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之中。概括地说，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1967年11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中，正式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

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它是“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① 这个一直贯穿于“文革”始终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然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尤其同社会制度稳定发展极不相容，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根本相悖。坚持这一理论，必然混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界限，混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界限，混淆修正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最终必然发展到认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因而必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荒谬地步，造成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企图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是毛泽东毕生执著追求的目标。“大跃进”时期，他企图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最是无情，终于惨遭失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程度他是清楚的，他自己也曾半年不沾肉食，也曾把野菜当粮食吃过。可是，这也没有动摇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向往。

---

① 《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他又一次把这个理想蓝图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1966 年 5 月 7 日，他给林彪的信中写道：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要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他在这封信中（当时人们称为《五·七指示》描绘的各行各业组织雏形和任务，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对公社的描绘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加上了“批判资产阶级”那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项，以补仅仅是“鼓足干劲”之不足，表明他决心以政治强力即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这也说明，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他根本不承认“三面红旗”有什么问题，反而以为真如林彪所言，“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办坏了，出了问题，是大家没有照着他的指示去办，是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受到干扰所致。因而一意孤行到底。可是，在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人民觉悟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臆想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

义大学校”，这实质上仍是一种向小农思想的回归，循此只能是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社会去。于是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从此中断，社会主义建设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发展的巅峰，也是它的尽头。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问题在于，保卫所追求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实质上是一个体现古代农民战争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结合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供给制生活实践经验的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闭关锁国的“乌托邦”。为了排除实现自己理想的障碍，20年来，从反右派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举世敬畏的权威、无比雄浑的气魄、浪漫主义的气质，发动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斗争锋芒所向，党内党外，城市农村，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各行各业，无不触及，造成一时所向披靡的形势。总之，他过分迷信革命，迷信阶级斗争，迷信群众运动，迷信过去的战争经验，以及迷信自己的魅力和控制力，以为可以以此扫荡一切前进中的障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异乎寻常的自信，“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发展到以是否忠于他本人作为分辨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进一步，更成为划分敌我乃至划分阶级的标准。可是，自从“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他的“一贯正确”了，他感受到的抵制越来越多，这就使他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恢复并加强党内外群众对自己的信赖，有必要树立并鼓励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同时这也就促使他越来越“左”，最终使得他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

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比较隐于内心深处的一方面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给毛泽东加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同“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相结合，似乎正好反映了中国古代圣人“君师合一”、“内圣外王”的身份，而这也正好迎合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一种追求。后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这四个太多了，愿意只保留“伟大的导师”一个称号。这就使人想起他早年在《讲堂录》中说的，“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百代帝王”可说是他一生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之外求诸于己的另一执著目标。林彪宣称毛泽东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这种讴歌曾持续十年不稍衰。“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当然为他始料所不及，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民主权利破坏殆尽，天下大乱做到了，天下大治却很渺茫。他本人晚年的威望也从辉煌的顶巅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低谷，从而为后人留下惨痛的经验教训。

1976年6月，毛泽东行将谢世之前，对身边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

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这番话，道出了他内心的一种真情，以及对晚年思想和实践的某种自省和忧虑，也可以说，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已经不那么自信了，悲观情绪溢于言表。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临终前，他也不认为是件大好事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这里面确实也存在着他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和他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可是理想世界追求的结果是酿成一场空前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就具有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了。

八、以阶级斗争达到理想模式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毛泽东一生的兴趣主要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这一点，初登革命舞台时的青年时代如此，在他的晚年表现得尤其突出，而且，他晚年的实践才能也比理论才能显现得更为充分。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起伏不定的经济建设中，他的过人的胆略和气魄，可说是随心所欲；而理论方面却不能这样说。1957 年以后，他基本上没有再写过严格意义的理论著作。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文字方面的依据多是他的一些片断零星的讲话、批示等。当然，更重 要的是从他晚年实践中，可以探寻出他思想的发展轨迹、基本轮廓和主要内容。

毛泽东晚年考虑得最多是两个问题，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上所述，前者的答案是

“五七”指示所描写的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而后者的答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的理论。

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核心。看来，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前面谈到，1958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就说了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还很短，苏联的问题很多，毛泽东决心走中国自己的路。他首先是设计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模式，他多次谈到过。在前面我们引述过的1958年他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那次谈话中，作了具体形象的描述。直到1966年5月，他给林彪的信中，展示的仍然是几年前所勾画的那幅图景。概括地说，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上大体平均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自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乐园。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并不丰富，但是分配平均；社会分工极为模糊，但是“公正”；所有制成分单一，但是“纯洁”。总之，平等、公正、纯洁，是毛泽东晚年执著追求的人类社会目标，至少是中国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他认为属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贯彻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但实际上，是他在1947年批评过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晚年设计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阶级斗争”。可以说，毛泽东不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55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由他定性的。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

就此事件草拟了一篇社论，毛泽东在审阅时加写了三段，其中有此一句，“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这表明他在政治上也接受了斯大林公式：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曾一度有所改变，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观点。这一改变反映在八大政治决议中，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1957年2月，他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认为，在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可是，时间只过去几个月，反右派斗争又一次改变了他的论断。到6月公开发表《讲话》时，加上了大家都熟知的那个十分重要的关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的“但书”。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在他看来就正是一场主要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到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仅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并且明确地说“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

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要“不断革命”。他认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级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

形而上学的。"[①] 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是它的领导层内）的确存在认识分歧，这种分歧也随着“三百红旗”的实践的发展而加深。问题在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这种分歧恰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所以，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界。”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终于导致连续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步步升级，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经过他的认可，更宣称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了。

早在1921年1月致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就说过：“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是为探索解决国家、社会和人生问题去寻找思想武器，从而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1920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后来他回忆说：从此“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和最后消灭阶级

①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

进入无阶级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研究社会和改造世界，无论革命和建设，没有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是不行的，办不好事的。问题在“采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而且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执著于这四个字，他的伟大功绩和晚年悲剧，都同这四个字分不开。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有一些曾被认为是无可非议或很少怀疑的命题，如“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只有农民战争才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等等。在什么范围之内说才正确，甚至并不正确？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内容是无比丰富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哲学、科学、技术、宗教、民族，等等，各有其自身特殊的内容和发展的规律，也各有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阶级斗争决不能将之全部包括或替代。如自然科学的创造和发展，同激烈的阶级斗争恐怕基本是成反比的，战争年代就严重影响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如此，它们都有赖于社会的稳定。何况有些问题，并不能用阶级斗争就能完全解释清楚，如民族、氏族、家庭问题，宗教、宗派、教派问题，整个国家利益、国家联明利益等问题（包括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就是如此。毛泽东善于抓事物的要害和本质，但是也往往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不顾或轻视事物的丰富性、多样性。我们过去理解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主要是局限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我们自己经历的历史也可得出这样的

结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基本上只在革命时期起主导作用，和平时期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阶级斗争，但决不能靠“阶级斗争为纲”来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社会前进。今后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在和平与发展的范围内，在和平竞争范围内，在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过去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说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夸大了革命年代的经验，也曲解了马克思、列宁的有关理论或者将它作了教条。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观点，在马恩列的原著中，也并不是前后一致或无可探讨之处的。

回顾这20年来发生的事变，理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者密不可分。前者是目标，后者是途径；前者是核心，后者是外壳。两个理论构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主体内容。围绕这两个理论，毛泽东晚年还有其他一系列有关的观点和思想值得重新研究，可举出如下各项：

1. 关于政治同经济、精神同物质、革命同生产、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长期艰苦的物质环境与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一个主要经验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最依靠政治觉悟、思想教育，引发高昂的革命热情、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江西如此，长征如此，延安如此，从而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这种政治力量、精神力量被认为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林彪手摇红宝书，称为精神原子弹）。这种思维习惯化成理论认识，当然也可以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已经不存在了。可是，

深厚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土壤实际上还存在，并没有随着土改完成而消失。毛泽东却简单地认为，中国人民内外敌人只剩下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将一切他认为同社会主义相抗衡的不利的因素，都归入这个范畴。因此，50年代以来，一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脱离历史与时代的具体情况，把劳动与剥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等等的对立，统统纳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打上阶级烙印”。这样一来，百家争鸣实际上不过是两家争鸣。而且总是认为，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似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不是经济，不是生产力，而是政治，是大公无私，是一心为革命；认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斗私批修”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作用在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服务、促进各项工作的，因而也是无所不在的，不可或缺的。可是，片面夸大政治思想的作用，甚至无限夸大，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比起发展生产力来，毛泽东对改变生产关系有更大的兴趣。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①从这种基本倾向出发，他总片面强调政治的作用，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他经常引用列宁的这段话：“政策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他认为，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他号召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

① 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

他还肯定了林彪提出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说法。1966年初，在全军政工会议文件中全面贯彻林彪“突出政治”的政策意见：“搞政治工作，搞革命化，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中央随即发出这个文件，说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荒谬口号，他都赞许过。他把重视生产力发展的主张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把包产到户、集市贸易、个人副业、长途贩运等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打击；经济利益、物质力量、经济规律，乃至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奖金制度等作用，被一再贬斥，完全不重视用经济手段去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此过分夸大政治对经济、精神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样用精神转化物质，用政治代替经济，用革命贬低科学，用形而上学偷换辩证法，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唯意志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客观规律是可以用人的意志来创造的，而不认为主观能动性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和被客观环境决定的。

2. 关于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平衡和不平衡、破与立、乱与治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它的

核心——“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这是须作专门研究的学术问题；这里只是就其在实践中造成重大影响的这几个观点，作些粗浅论述。

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早年就留下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动”与“斗”，是毛泽东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他直言不讳：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无所不在。这可说是其斗争哲学的核心。他认为世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没有对立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这样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从而导致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哲学概念中“综合”一词，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认为世界事物无不存在变化、存在斗争，只有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这样把斗争性绝对化之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同一性，以致最后实际否认同一性，只有斗争性了。毛泽东晚年常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八十高龄仍在说：“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口，不斗行么?”。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这也是产生于中国——封建主义历史悠久的农民大国的独特经验），为实践斗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只要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人多势众，力量大，见效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无坚不摧，攻无不克。而且认为政治运动是使人净化，达到灭个人（小我）、重集体（大我）的最好途径。从

而搞斗私批修，人人过关，洗脑筋，受教育。这也贯彻了他的实践哲学理论：唯有实践出真知。从除四害到反右派，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无不通过搞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来实行。所选择的这种最佳方式，从理论到实践，他认为这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大独创，既顺乎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开国以后，为什么运动一个一个接连不断。在对“无冲突论”等进行批判时，往往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理论著作中，作者并没有论述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何在。如果说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则应当是非对抗性的，以同一性为主。人类社会发展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不论何种社会、何种年代，斗争性与同一性总是共存的，不过随实际情况主次轻重不同而已。固然，所有的统一体内部都包含着斗争，没有毫无斗争性的同一性；可是同一性先于斗争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也就不会有斗争性了。我们在同内外不同政治主张打交道时，不是还常说“求同存异”吗。在斗争哲学的统治下，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

平衡与不平衡是对立的统一，二者互不可分。平衡反映一种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质的稳定性，否认相对静止和相对平衡，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生命运动，天体运动，无不如此，都必须保持平衡，都是平衡中的不断运动。社会经济活动也是如此。不同地区、部门、企业、企业内部之间，都互为条件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同其他部分脱离和独立发展，都必须平衡地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发展

中的平衡称之为“经常趋势”、甚至“自然规律”。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平衡，不是不平衡，必须力求经常达到平衡，否则经济活动就会不正常乃至遭到破坏。对待平衡与不平衡矛盾，毛泽东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① “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概念绝对化，以此来说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不平衡的，这是对辩证法的一种曲解。经济活动的规律总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循环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如新技术、新产业等不断产生，旧的平衡不断突破，自然要求建立新的平衡，否则国民经济就不能正常发展，甚至会遭到破坏。不顾客观实际，人为地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关系，只能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大跃进”的深刻教训。在“大跃进”时期，就曾以“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作为指导思想，主观臆造出所谓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把留有缺口的平衡说成是积极的平衡，以为缺口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大鼓干劲。于是，一时放弃了计划工作中的综合平衡。在80年代以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多次大起大落，都同这种人为地破坏平衡规律有密切关系，都同处理发展速度、各种比例关系（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生产、基建与生活等）中没有保持好平衡有密切关系。商品经济的不平衡，靠价值规律（市场）来调节，计划经济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律。

在破与立和乱与治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不破不立。

①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

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从而引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说。不仅用这种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也以此指导“大跃进”这样的经济活动。而且，不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生活各方面，统统持这种观点。总之，一切都处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些形而上学哲学思维，确使毛泽东特别重视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变动、不断革命和不断斗争，使得整个社会经常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过去老百姓常说，“共产党吃不得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就是这个意思。

3. 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曾说：“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这句话（及其后的一大段话）在后来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可以说，全国解放以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逐渐同两个概念联在一起，一是资产阶级，一是“右倾”。50年代曾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对陶行知、胡适、梁漱溟、马寅初，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风集团”的批判等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对知识分子政策一度出现转机。为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适应工农业更快发展的需要，1956年1月，党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关系，认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都有赖于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第一次提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尖锐地指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主要错误倾向是宗派主义，

低估了知识界的巨大进步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作用；还具体谈到对知识分子应当信任、支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提高他们的待遇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同年3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集中优秀科学家200多人，经过半年努力，制定了1956-1967年的12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同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的"双百方针"，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一时有"春天来了"之感。八大期间，他还说过，将来中央委员会要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原来的正确判断立即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整个知识界终于伤筋动骨。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妙语如珠，听者振奋。但到1963年正式发表时却断言："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 可见，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他看重知识分子又不放心知识分子，于是只有以频繁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有效的教育、改造手段，实际上以此代替了向科学进军。1957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9页。

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新的革命内容，要找到新的形式，“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① 用这种形式“可以避免出波匈事件”。这种办法随之同“大跃进”纠缠在一起，于是不断反右倾，反保守，拔白旗，批白专道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又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继1956年的报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新的说明，并嘱陈毅讲话时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这就是有名的“脱帽加冕”礼。可是又好景不长。毛泽东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开展的对修正主义的公开批判，加剧了对待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突出表现在对文艺和教育的估计上。1963年相继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解放后的教育制度质疑，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于是批文艺“黑八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浪潮迭起。从批《武训传》开始，一直到打开“文化大革命”缺口的批《海瑞罢官》，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批判，实际是为政治批判揭开序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公开宣称：这“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必须进行这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大革命，以“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千百

① 同上书第480页。

万群众“奋起”，许多群众创造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之时，毛泽东似乎越来越鄙薄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他曾多次讲到这一类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的；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贬知识和读书人。如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相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一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害死人。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也是就农业社会化的困难而言，但是并未采取过实际步骤。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而是发扬平均主义、唯上命是从的品质。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才有助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大跃进”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中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问题。从当时的提法看，所谓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一般并不把脑力劳动包括在内。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过去战争年代的好传统。但凡事过犹不及，问题是如何结

合今天的实际予以贯彻。如果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倒置，认为唯有体力劳动最为可贵，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这就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且是相对立的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属性的分析，毛泽东晚年更是走向极端。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如前所述，他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58年，他评断国内阶级情况时所分析的结论是：两个劳动阶级、两剥削阶级。其中，第二剥削阶级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视为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因此，全国解放以后，频繁发动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从党内到党外，从老一代到新一代，各行各业，无日得宁。在他的心目中，电影、戏剧、小说、史学、哲学、理论、经济、军事……无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都可以被利用影射反党，直到李秀成也难心幸免，最后宋江成了代表“投降派”的靶子。“文革”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据此得以肆意践踏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进得残酷的迫害，造成无比严重、不可弥补的令人痛心的损失。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4. 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从历史上考虑。毛泽东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表示过重视民主的意思。井冈山时期，尤其是在1929年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在军事建设上坚持贯彻民主精神。延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

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制度”的新中国而奋斗；发动整风运动也采用了发扬民主，以统一党内思想的提法。他历来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从在野的地位变成了执政的地位之后，他就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强调民主问题了，更从不提及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1957年7月，他曾希望通过整风反右，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 可是随着而来的泰山压顶的反右派斗争，这个美好的愿望就一直搁下来了，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亲手造成了与此目标完全对立的政治局面。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都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于有着同一信念、同一奋斗目标，而且每个成员都是自愿宣誓加入的党来说，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天经地义的。对于由具有不同信念的人组成的社会来说，民主集中制的适用性就值得考虑了。而且，毛泽东对这个原则的解释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点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既包括民主又包括集中，但集中是应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的，并非高于民主的东西。可是，人们常认为民主和集中是一对矛盾，而在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集中日益脱离民主而存在，首长负责制变为个人集权制，一言堂、一锤定音、鸦雀无声等等，成为生活的常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最后蜕变为个人独断专行。当然，长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与渊源久远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难以充分贯彻民主制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页。

的客观原因。延安整风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组织上也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策权：1943年3月20日，推定他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时，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① 这种规定自然同党内几十年的曲折发展有关，当年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由于预见到革命斗争复杂而艰巨的形势，中央其他领导人基于对毛泽东的信服，认为必要时他可以作决断。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个人决断之权，应当说，在客观上已失去其必要性。上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前后，有关三大改造尤其是农村合作化道路问题，直到1956年批"小脚女人"走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存在过原则性的不同看法，可是这种不同意见并没有很好展开民主讨论，而是由毛泽东个人作出决定，或者只是一个指示，全党就习惯地一致执行了。

从党同国家政权关系这个大范围说，党政不分，一元化领导，在战争环境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是这种经验用之于执政党领导建设的时期，也就不尽妥当了。随着强调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解决，在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时，毛泽东逐渐习惯于集中与专政。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②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③ 我

---

① 《中央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1943年3月20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③ 同上书，第323页。

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实质上类似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属于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遗产之一）：如“便民”、“利民”、“为民作主”、“民贵君轻”等，这些同权力归属的民主，其实并不相干。毛泽东晚年很欣赏“大民主”，这并不是表示他对民主感兴趣，而是说明他对法制不感兴趣。他对一切规范的东西，从政治、经济到教育，抵触似乎越来越大。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① 他是奉为圭臬的。他正是要这样做，并且用中国的民间谚语来表达这个思想，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并以此感到自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他谈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因此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多年来不仅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相反，1957 年反右派斗争后，批判“司法独立”是所谓资产阶级观点，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削弱了法院等作用。1960 年开始，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取消了公检法三者之间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也取消了各司法机构间的制衡作用。民主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甚至不能起到一种手段的作用，于是仅仅成为一种装饰品和宣传口号。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看到当时的形势，可能因感到党缺乏民主带来的后果，毛泽东专门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可是，紧接着在十中全会上，他又随意批判党内当时许多正确的作法，

① 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10 月第二版第 623 页。

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日益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日益严重的个人专断作风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相结合，民主其表，专制其实。于是，整人者不受监督和约束，被整者难以申诉和辩护。按法律程序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尚且以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更何况普通公民，哪还有最起码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可言！“文化大革命”是对民主和法制最彻底的破坏，乃至砸烂公检法，终于导致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无政府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泛滥。

5. 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商品经济问题。毛泽东一生向往平等，反对等级，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陷入了思想误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原则，同毛泽东晚年为之的所谓“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自然格格不入。他这时多次借用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来否定社会主义必须贯彻的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除分配关系以外，他还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他认为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以不平等态度待人，不是靠能力吃饭，而是靠权力，等等，以至于社会生活领域中一切不平等现象，一切不合理现象，几乎都是“资产阶级权利”。其实，这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里，“法权”一词的旧译是有缺点的，因为原文并未含有法权或法律规定的权利这种意思，后来改

为"资产阶级权利"，这仍然是不准确的译法。正确的译法应当是"市民权利"，它是同中世纪的"封建特权"相对应提出的一个范畴，也就是《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平等的权利"。而等级森严、居高临下等等，正好属于封建的等级观念，正是同"平等的权利"或"市民权利"相抵触的。而毛泽东却把所有这些东西，甚至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物质利益等等，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而加以限制或取消了。

对于官僚主义、以势压人等这些为群众所不满的现象，毛泽东极为厌恶和反对，应当说，他的初衷是好的。这也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和广大群众能迅速发动起来的一个原因。但是他提出采用"大民主"的办法，"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反有理"，这就适得其反，造成天下大乱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他曾一度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工资制是很大弊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这就是希望首先从分配和消费上来实现理想中的共产主义。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张春桥迎合这种思想，在上海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长文。毛泽东为之写了"编者按"，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转载于10月13日《人民日报》，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时，毛泽东还同意"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文革时期，他把对待"资产阶级权利"。即所谓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资金挂帅的态度，看成是识别"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一个重要依据。1974年，他再次提出："资产阶级权

利”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导致全国城乡不断地“割资产阶级尾巴”，彻底堵塞了繁荣经济、勤劳致富的道路。这种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还导致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认识，认为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这都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和温床。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加以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毛泽东还搬用列宁就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前的情况说的话，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也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并且还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基于这些错误认识，毛急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和“过渡”，对任何发展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都一律加以排斥，给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造成严重困难和行政管理障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无疑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

这里可以附带提一下，毛泽东晚年还有“穷则革命富则修”这样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教学科书》之后与人谈话时曾说：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而一旦富了，就一定会发生问题。他这种想法，不仅同观察西方革命渺茫有关，还鉴于当年东欧波匈等国农业合作化难以发展。可是，这个关于“究”与“富”的论断，岂不完全陷入了一种悖论么？革命的目的在发展生产力，变穷致富；然而，富了又走向修正主义！那么革命又到底为了什么呢？又如何自圆其说？总不

能说为革命而革命吧。这一论断同马克思主义可说毫无不相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目的在不断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以满足人们在这两方面不断增长的要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愈发展，生产力愈强大，社会主义因素便愈多，向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便愈成熟。毛泽东晚年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穷”与“富”这个相关联的判断上，同样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基本上脱离 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原理，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和实践道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不少，当然也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等等；还有些正确的思想与错误思想和实践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他的错误等同起来。这些就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了。

九、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形成之时，正是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进入空前的新的发展之时，时代也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发展，新的实践应该产生新的理论。

5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以计算机、航天技

术等为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这场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许多国家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酝酿着经济的起飞。整个旧世界的生产结构和市场服务，逐渐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级的结构也相应在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强大对手的挑战。可是囿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僵化体制的矛盾更为突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乃至发展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尽管在某些领域中，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但这常常是不顾高昂代价得到的，因而无法稳定持久地保持这种优势，结果是总体差距越来越大。尽管以下这种对比不一定完全合理，仍能借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 4.7%，1980 年下降为 2.5%；1960 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 1980 年只相当日本的 1/4，1985 年更下降到 1/5；1960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 4600 亿美元，而 1985 年超出 36800 亿美元。这是仅从经济实力来说，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论后两方面，我们同日本、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越来越大。这是过去 20 年"左"的思想和实践造成的极其痛心的严重后果。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 1200 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 5000 亿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 30 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 65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 4000—5000 亿元。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 6200 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 30 年

全部的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关于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的激增等，即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预言，由于资本主义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因此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的基础上，同资本主义相比，必然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使生产力得到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实践结果，却表明并非完全如此。现实曾迫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改革的道路。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这种改革趋势的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就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在固有矛盾。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国内外情况的估量，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对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并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想超英赶美。1958 年 1 月，他曾经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①1963 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还提出科学实验是人类三大社会主要矛盾和高于一切的任务时，这种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确实是历史的不幸，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在正确的思想发展轨道上坚持下去。如前所述，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我们在探讨这个

①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 年 1 月 31 日）

问题时，单纯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公正的、不科学的。应该看到，任何思想学说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都烙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穷本探源，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在落后的东方俄国和尤其落后的中国，先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一个客观物质基础即经济与文化先天不足的问题，这恐怕是苏联也是我们党历史上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一个基本的客观原因。穷则思变，越穷就越想快点富强，于是“穷”与“左”结下不解之缘；于是客观上越没有根据的东西，主观上对之反而是越坚定不移。以下从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一） 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

首先应当谈到国际形势即时代的影响。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1947 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对世界形势曾作过如此乐观的估计：“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从这样一个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出发，从而制定国内政策，这也是毛泽东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外部原因。这个论断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早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即判定了人类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重点放在后者。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当然更加夸大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已进一步加深。可是，时代的发展却出现了曲折变化，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并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反而社会主义阵营

中在1948年就发生了“南斯拉夫问题”。以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最早信号。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各国共产党开始从“斯大林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由改革引起的骚动。30多年之后回头来看，大约人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当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曾迫切要求突破苏联的控制和干涉，改革从苏联照搬的政治经济体制，克服党和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错误，从而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论后世史家如何评价，实际上，波匈事件是国际共运改革潮流中的涌起的第一个巨浪。

虽然对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毛泽东曾给予一定的赞许，但苏联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和波匈事件的发生，终于引起他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忧虑。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伤感地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共产党也批评苏联……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东欧正在起步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

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① 毛泽东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看得很严重，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② 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也同他对匈牙利事件的思考有关。他在1957年6月8日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党内指示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③ 从此以后，他错误地把社会上的一切可疑动向，都视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党内的一切跟他的意志相违背的分歧，也视内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国内阶级斗争视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于是，形成了用阶级斗争方式从事社会主义的认识基础。到了“文化大革命”，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达到不分青红皂白草木皆兵的程度。由此最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1—323页。
② 同上书，第334页。
③ 同上书，第432页。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

中国山多地少，交通阻隔，自古以来为单一的小农经济。群雄争霸，农民起义，实质上都是土地战争；有人有粮就有兵，积粮为称王的基础。历代帝王兴修水利，奖励生育，励行屯田，重农抑商，走以粮为纲的老路。这种经济结构，阻碍分工，抑制交流，毁草种粮，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土壤不断沙化碱化，几千年来，逃脱不了这种恶性循环。直到近代，社会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育的阶段，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据前述七届二中全会的估计，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乎占整个社会经济的90%；10%的近代工业多属具有浓厚超经济色彩的官僚买办资本。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阶级分化。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则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他们渴望改变贫穷处境，希望建立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寄托在自己所崇拜 的偶像身上，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反映农民的这种理想社会思想，中国近代史出现过太平天国、康有为和孙中山三次有同有异的理想社会思潮。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中国革命是一场东方独特的、新型的农民革命。但是暴力革命只能带来政权的突变，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突变。中国

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能同时在经济上、文化也立即翻身。事实说明，我们过去几十年，经过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以及后来的公社化）等三大改造，加上国家的财政援助，尽管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有这十多年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国策，才有望2000年时达到小康水平。从经济方面深加追究，也正是由于这种同封建主义结合的小农自然经济，只能产生以家庭和土地为依托、以自给自足为理想的凝固而封闭的经济结构思想；所谓互通有无、调刘余缺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加以客观上，过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们实行长期封锁，中苏关系的破裂（原来也主要是政府间的简单记帐贸易），使我国经济长期处在高度集中和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结构中，“文革”十年更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古今内外的影响，也使得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可能超越这种社会存在。我们不能苛求他的经济思想能同国际经济运动、开放发展的格局相协调相一致。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曾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倒是我们现在应当很好继承和发展的。

当然，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长期的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革命意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同农民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党员和干部大都出身于农民，农民固有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观念，在党内不能不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思想土壤。此外，白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以及共产国际和苏共高度集权的影响，也

使得党的民主生活难以健全，而容易形成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几次整风运动，也没能得到解决（在那样一种体制下，也不可能解决）。相反，战争年代必要的一元化领导经验，发展到“书记挂帅”，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大家习惯于以“人治”代“法治”。此外，在我们这个根本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最后促成毛泽东可以随意实行个人专断。可以说，这种中国特有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以及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势力（它们容易产生英雄崇拜和个人迷信），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三）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体制上曾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过于集权。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习苏联，我们沿袭了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照搬了苏联集中计划的产品经济体制，并建立起与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对外关系体制等。按照苏联模式，把国家所有制、指令性计划、统一调拨产品、轻视市场经济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等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对科技、文艺等领域实行的行政干预和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集中管

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内要求。这些日渐僵化的体制，一方面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文化艺术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干预着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党政各级缺乏制衡与调节的机制，这都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由实践发展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形成日益严重的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这里应当着重一提的是，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必须正确解决领袖同党的关系，这个问题对执政党尤其重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为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领袖同党对立起来的观点（所谓"领袖的党"、"群众的党"），有专门一章论述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文中强调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指明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里讲的是一般政党政治的原理，并没有论及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这方面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列宁着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党和阶级的一致性这一面；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高踞于党与群众之上，尤其是领袖也有可能犯错误，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列宁很注意贯彻民主的集中制（他强调民主前提下的集中制），以避免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他同马克思一样，很厌恶别人对他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他特别重视党政分工，防止党政机关犯官僚主义。可是，斯大林没能继承列宁的民主传统，却把列宁关于垄断权力的一些想法，发展到极端，逐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领袖终身制，高度集权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终于导致一系列严重

错误。关于领袖与党的关系，对我们党都曾长期发生过影响。我们又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皇权高度集中、习惯定于一尊的国家，正如《历史决议》中说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各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过去在长时期中，欠惯于把领袖说成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只说成是个人的智慧，不讲还有集体的贡献；把一切成就归于个人，不讲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神化，说成绝对正确，而不讲领袖也是凡人，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到毛泽东晚年时，尤其形成一个坏的习惯：在任何场合，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曾以为反封建的任务也已经完成。长时期中，我们只注意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同一切崇洋媚外的思想作斗争，却放弃了同时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种种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现象，自不是偶然的。1980 年 8 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方面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

要遭受损失。① 文中具体谈到过去在政治、思想和体制等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情况：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的、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② "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③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④ "从一九五八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8—28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289页。

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照搬了一段时间。”①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庚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③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搞特权，这是封建议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④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邓小平文选》第290—291页。
④ 同上，第292页。

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致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②

上面摘录这么多邓小平讲的话，是以其权威性来说明我们过去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之深，和肃清其残余影响之难。这个问题同前述“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是一回事，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中国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意识

① 同上，第293页
② 同上第294—295页。

残余影响，恐怕得几代人的努力。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

在1920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年毛泽东长时间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包括科举时代的必修课四书、五经、纲鉴等，也包括对他更有吸引力的小说、笔记、野史、杂集等。这两个方面都给了他很深的影响。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和内地长沙的毛泽东，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不多，只不过从梁启超、严复、杨昌济的转手的中有所涉猎，如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之类。他从这方面受到影响，就远不如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了。笔者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只能凭借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而以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为多。“大跃进”失败后，他才着意研究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新中国成立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他对身边人说过，《资治通鉴》读过7遍，这部书是常置案头的。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

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如在《毛泽东选集》中，除了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有处摘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之外，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引文，斯大林的引文稍多一点，而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总不下几百上千条，即此也可见中国旧籍对他浸润之深。不论是"显形"的官修典籍或"隐形"的民间传说，都是铸造毛泽东一生主要的思想原料，这话并不过分。我们说在毛泽东思想中，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往往有时会起消极作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虽然很难直接归咎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但若仔细探究，也不无渊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

从本性上看，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斗争"性格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是反传统的，对于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学，应当说是没有好感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对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便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认为要在中国进行革命，要打破政治上的强权，也必须打破思想上的强权。《湘江评论》上他的文章中还说过："像我们

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也一再提出反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儒学。每当要打破陈规，破除旧的秩序时，在思想领域内总是把孔学作靶子的。因孔学核心是维护既成秩序。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曾多次受到他的抨击。他也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调侃孔子，甚至把孔子的书同他所蔑视的蒋介石的书相提并论，认为读一些这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从反面教育人们懂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林批孔”时，他赠诗给郭沫若（批孔批郭）：“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之。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①

当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认为孔夫子的这一笔遗产还是应当继承的。那理由是：“剥削阶级当他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② 因此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要清楚地讲明他究竟认为孔孟有哪些“真理”，这是困难的，特别是晚年他已把孔孟当作没落奴隶阶级的代表。毛泽东对孔孟学说，更多地依据政治上的需要，随时摘取某些语言，古为今用，或赋予新的解释。比如，1939 年 2 月 20 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讲以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时，这样说：“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

① 汪澍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8 页。
②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5 页。

‘克服困难’……”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实际上，毛常常是利用前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极广，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无不在其视野之内；在当代领导人中，罕有其匹。但其基本办法，仍是“六经注我”，即利用或改造前人的思想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中作法就其好的一面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即在这种利用、类比之中，容易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一起继承了下来。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副作用。

比如，早年读的《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他晚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以怎么样也摆脱不了的简单粗糙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都是无可置疑的儒家的影响。与此类似，前述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军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又如，毛泽东不止一次地以刘邦、项羽作对比，批评项羽不能像刘邦那样从谏如流，结果最后垮台，闹到演出“别姬”一幕。就其本意，是教育干部要有民主作风，但今天社会主义需要的民主政治，远非古代用贤纳谏所能概括。如果领导人仍认为居高临下的“纳谏”便是民主，那么，民主不

过是恩赐，不过是点缀，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毛泽东自己，确实没有摆脱这种“君临”的思想意识，没有在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建设起现代意识的民主生活。

再如，毛泽东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赞扬这位古代暴君。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甚至说，要说“马克思加秦始皇。”① 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别；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他一生酷好读史，到老不衰。除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即使是专治史学的专家也未必人人通读过的《二十四史》，也基本读遍了。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熟悉之至。他认为读史可以知兴亡、明事理，“观往者得失之变”。《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未毕具，从中可以熟悉历史事件，吸取经验教训。看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史实，而不会是“臣光曰”所阐述的儒家政治哲学。他是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其中固然有智慧的一面，但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从《明史》中搬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此作为

① 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三线建设对付现代核战争的方针（三线曾耗资一千多亿）。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

毛泽东曾一再自称对佛学有兴趣有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像他真的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中的“劫”和道家发展观中的“循环论”。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有人可能以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泽东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甚至事实上做到了“砸烂公检法”，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这样就可以做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于下”。这不但不与法家思想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得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这正是中国法家（“圣人执要”即君主执

法）与西方法学（法即君主）不同之处。仔细把毛泽东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他推崇的“法家”，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言行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只是，毛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他早年读过申韩之书，或渊源于荀子、老子之书而形成的呢？还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印证，而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深入细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以为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自汉以后，儒法已很难分家。汉承秦制，虽说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杂霸道道王以用之，乃儒法合流。荀况引法入儒，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正是荀况的学生。法家为求法治，也必须引儒入法，吸收礼治，以补充法治。儒法合流盖因共同本质为“人治”：儒家提供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而法家则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策略与方术。“阳儒阴法”，儒法的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与行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以阶级斗争同蒋介石较量时，有理有利有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儒家的政治艺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时，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都是为君主便于驾驭臣下、统治万民而着想的，自可利用改造。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以法、术、势结合，君主执法行绝对专制统治。对照之下，多年来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归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

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应当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家、某派的影响，应当说，它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国内国外现实状况的错误判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

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心理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在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规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可见他是有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思想的。后来时过境迁，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谈到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有分别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全面否定。

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中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给毛泽东解除了某种精神束缚，使他的骄

傲情绪随之滋长起来。过去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对其人虽然并不佩服（同王明的斗争实质上是同斯大林的斗争），也只能“腹诽”。现在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从而也提出了重新评价苏联模式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城乡敲锣打鼓庆祝，全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些内外条件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最高明、最正确、最有本事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的苏共党内的地位，也确实需要中国党特别是毛泽东的个人威望的支持，在短时间里对毛作出了谦恭的姿态，也助长了毛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的骄傲心理。在对东欧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趋势抵触日益加深的同时，毛以“舍我其谁”的气慨，率领中国人民一再进行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类伟业。可是事与愿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且其起点比苏联更低，因此很自然地便跌入了类似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死谷。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不满于 1956 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业，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于是需要“政治挂帅”，于是需要“大权独揽”，于是需要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1958 年 3 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

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在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从而将拥护真理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此后，反对个人崇拜一直成为毛泽东十分忌讳的问题。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党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之风。“大跃进”时，柯庆施等人迎合邀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彪、康生等人更是极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尤其“文革”十年当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级。这一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三面红旗”的失败，一系列政策措施越来越不得人心，天下大治甚为渺茫，党内党外对他的依赖越来越少，疑虑却越来越多。为了维持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得不借助于“大树特树”。将必要的权威与个人崇拜混淆起来，这种人为培植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从大政方针到日常小事无不遵循“最高指示”，而且“传达不要过夜”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失误和灾难，从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个人崇拜必然助长个人专断。晚年的毛泽东是听不得任

何批评意见的。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他自以为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的模式和途径，因此，不管谁对“三面红旗”提出什么意见，他都予严厉驳斥；即令同中央集体发生严重分歧，他也固执己见，认为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或一个人手中。从八届二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批判；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实为批周），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驾凌于党中央集体之一，独断专行的结果。无情的历史说明，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是：领袖犯了错误，必然导致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再思三思的。

（六）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将战争经验套用于和平建设的论断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不仅搞阶级斗争如此，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等等，毛泽东也习惯于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政治上伤害干部和群众，经济上劳民伤财，给民族留下累累伤痕。在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是的，在22年无比艰难的条件下，革命军队由小到大，小米加步

枪，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了中国，最后终于消灭了由美国武装的八百万国民党军。这种战绩与经验，可说是史无前例的。难道到了1958年，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把经济速度加快一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可他恰恰忘记了古人之言："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他也忘记了，他的这些伟大胜利并不仅仅是靠着军事力量取得的，在他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军队只是三大法宝之一。他似乎也忘记了，对于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尤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必然规律，还是很不熟悉的，远没有认识清楚的，还是"不自由的"。这层意思，他在执政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说过，后来却忘记了。可是，"大跃进"时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先提出有谐音之趣的口号"以钢为纲"；接着又辅以"以粮为纲"，直到出现许多军事术语及其作法，如"元帅升帐"（钢铁、煤炭、粮食三大元帅）、"两个先行官"（电力和铁道）、"一马当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及"大兵团作战"、"挑灯夜战"之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毛泽东对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过的军事共产主义十分留恋。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他多次谈到，我们党是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家长式的），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他曾多次表示，要逐渐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他还企图把各种社会组织都变成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认为通过这种组织可以创造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向

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建立人民公社和后来的“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五七工厂”等等，就是尝试。战争年代被敌人分割封锁，各根据地必须自力更生、各自为政。引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于是不论农村、工厂，一县、一省，都提倡“小而全”、“大而全”，万事不求人。这种封闭式的经济，自然同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毫不相干，背道而驰。

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顾条件的变化，到处照搬照用，必然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此路不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狭隘经验主义色彩。

晚年毛泽东对待马恩列斯的理论，常以对他有用否为取舍的标准，这样就不免误解和误用。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至理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成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时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这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而且在书中明确指出，他这里所提出的是带有旧社会痕迹，仍然存在市民阶级权利的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实际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也许把这个过渡阶段看得较短，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提出的过渡时期，理解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曾一时看得过短，一时又看得很长很长，由此在政治上产生一系列“左”的过渡。前面已经谈到，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观点，以及列宁提出的小生产自发倾向的论断，也都特别重视，借以为自己新的阶级斗争理论作说明。在表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他把“资产阶级权利”从本意的分

配领域扩大到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并把抽象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同旧制度下有实际含义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由此得出他所需要的结论：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温床。撇开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具体情况，在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补充下，更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毛泽东人实用角度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话，直到临终前，他还要求全党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误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造成令人极其痛心的历史悲剧；曾同“左”的教条主义作过长期坚决斗争取得革命胜利，而受到全党全民爱戴的领袖，晚年也陷入“左”的教条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给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灾难性的后果是违背他的主观愿望的。

从这个历史教训来说，我们后人应当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何等重要的历史责任！

十、结束语

本文有关部分已经说过，为了对自己实践中的每项措施和对策作出解释，毛泽东使他的晚年错误思想逐步具备了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态。其主要部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概括地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

“理论”发展到极端，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文化大革命”。下面再简单概述一下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的问题后不久，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一个最大原因。当时的一些论者，包括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把他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其实这并不是斯大林独有的现象，不善于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人，尤其手中有权的政治家，一般都很难避开权力的腐蚀作用。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必须受到民主和法制的制约，否则，权力能使人冲昏头脑，骄纵放肆，智力衰退。一个西方学者说得好，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利绝对腐蚀人。不幸的是，这一现象在新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避免，斯大林的专制行为引起了特殊的震动，毛泽东的晚年也终于出现了类似的悲剧。1959年庐山会议时，受批判的几个人中曾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当时只不过是对未来事态的一种隐忧，不幸的是隐忧终于变成了事实。

同权力的腐蚀伴生的是骄傲。在1949年以前漫长的28年中，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尤其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那时毛泽东从不轻敌，何等谦虚谨慎，因而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在军事上，他从不轻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过于强大，还有斯大林的干预，等等这些决不容忽视的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新中国成

立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打出了威风，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似乎客观失去任何制约，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尤其党与个人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客观的迷信与主观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确实有了骄傲的本钱。使得毛泽东不再谦虚谨慎了。日渐高傲而随心所欲了。

从历史上考察，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很注意党的民主生活，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民主传统。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都宣称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 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之后，民主生活就不正常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尤其在反右运动中，普遍推行了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定阶级成分的方法。从此，阶级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可以随掌权者的好恶而改变（这方面也有法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邓小平认为，1957年大体是毛泽东进入其晚年错误思想的界标。1957年起，从理论到实践，毛泽东开始同民主思想告别，同时也为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运动准备好了舞台。这时知识分子不是箝口结舌，便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了。对“大跃进”、“吃饭不要钱”，不是没有人议论，但只能窃窃私议，有些议论的人早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敌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晚年

错误思想一块新的重要里程碑，从此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内部。这也就是党内存在“走资派”、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的伏笔。通向“文化大革命”的大门打开了。

任何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总是长处和短处并存的，问题在关键时刻，何者处于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夺取战争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驾驭矛盾，指挥若定，是何等游刃有余；可是领导现代经济活动却相形见绌，这些陌生规律过于复杂，非其所长。如果他有足够的民主作风，党内和国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认输，不怕下“罪已诏”，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气概，应当说，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是不难纠正失误的。不幸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蚀了他的智慧，谦虚谨慎变为刚愎自用，不但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反而继续想用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抓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这是他本人也是全党的轻车熟路。大家都在行得很，定个百分比，谁都有辫子可抓，根本不要学，不要读书，也不要抽查，而且“一抓就灵”。直到“文革”时期，关于经济生活，他仍只能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方针，走不出“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迷宫。

马克思说过，历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对历史的发展常起某种作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序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本文只是简要地探讨了一下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并且侧重在同政治实践有关的思想，而没有涉及他的性格和气质等问题。其实

性格与气质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有关系的，有时甚至是大有关系的。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诗词作品足以方驾古人。他喜欢屈原，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可说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和非心天赋的人。“安得倚天抽剑，把汝裁为三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些诗句读来真令人神往叹服。应该说，伟大的革命家，不论马克思或者列宁，也都有着浪漫主义的气质。不然怎么能睥睨一世，在旧世界看见了新世界，并且为创建世界而奋斗呢？浪漫主义气质同革命事业可以相容，有时会相得益彰的。一首“北国风光”的《沁园春》，曾经风靡重庆，在大后方多少高人雅士乃至宫宦名流中引起振动。可是，在从事经济建设活动中，却容不得多少浪漫主义。“高峡出平湖”是好诗，但当年如果把这诗句当作必须立即贯彻落实的建设计划，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开头即提到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这就是说，凡自己认定了的目标，必不畏任何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的伟大人物必备的品质，毛泽东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但不容拂逆变为一意孤行，那就成大问题了。这种问题自随自主人公的地位、权力和作用而造成不同的后果。在“在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心动魄的事态，饿死那么多人，大乱到那种程序，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死于非命，难道他都无动于衷？这似乎只以从他自己所说的虎气和猴气中找到解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千钧棒之下误伤难免，可是玉宇却混乱不堪了。毛泽东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这样几句话：“吾惟发展吾一身，使吾

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这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这是不是可以作理解毛泽东晚年悲剧的一把钥匙呢?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心态也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他喜欢读三赋:《恨赋》、《别赋》和《枯树赋》，从中是否可以讨到一些消息呢?

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该忘记问题的另一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漫长而艰巨的中国革命，曾经走过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从胜利到失败，又从失败到胜利，即他在延安常讲的，中国革命走了一个个“之”字路。他本人身上，是不是也可说走了一“之”字路呢?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初一些年月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很少失误（如有失误很快就纠正)。可是到了1956年的，特别是1957年之后，他一生事业达到辉煌顶峰之时，这个“之”字却逐渐曲折地走向下坡。反右派，“大跃进”，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时进时退终于步步下滑走到了他的终年。到了1975年、1976年，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希望有所更张，可是这时已积重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他已经无力走上这个“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这个任务就留给他的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历

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

从1957年开始，在近20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以他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逐渐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无不留下深深的“左”的印记。毛泽东辞世已经16年，可是“左”的影响，并未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到1987年，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地反‘左’，‘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① 这种“左”的习惯势力至今还是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大障碍。近年有些“理论家”，还经常在报刊上、讲坛上散布这样一些“左；的论点：如改革开放引进来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国建设，等等。这些都囿于过去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观点，将实践已经证明了的谬误，还当作真理。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第27页。

因此，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能不再一次发出“主要是防止‘左’”的警告，要求我们把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提高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难道我们能够再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吗？要真正纠“左的习惯，就有必要认真清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因为“根深蒂固”的根子主要在这里。这样才能端正思想路线，从历史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与拨乱反正的关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得来何等不易，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深刻理解，我们才不会重犯“左”的错误，才会对“左”的东西具有辨别力和免疫力。

在最后结束本文时，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① 历史是最公正的。百年千年后的历史，必须会同我们现在一样，公正地景仰地看待毛泽东，像后人对待古圣先贤一样，从他身上，从他的言行中（不论正确与错误）吸收养料，推动历史前进。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就有助于避免重蹈覆辙，可以使我们党和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6页。

当前世界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命运正经历着最严重的考验，同时也碰上了一个百年难逢的良好机遇。我们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我们应该抓紧时机，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往前发展。毛泽东终其一生，究古今之变，通中外之学，探治乱之源，求大同之境；他曾经唤醒民族，同国内外敌人浴血奋斗，终于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使神州大地走上社会主义大道。他的许多思想遗教，他常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将启迪后世；他晚年来源于“左”的教条和主观盲动的错误，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无法为之掩饰，正好引为鉴戒。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两次在哈佛大学论中国革命与毛泽东

中国革命的回顾①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经历28年的艰难曲折取得胜利。内外敌人强大，最大的困难在于战胜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要是王明（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毛泽东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完整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划分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个历史范畴。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形势，这一切决定中国的历史任务必须分为两步来完成：

① *1989年1月23日下午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讲稿（提纲）

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第二步：条件成熟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革命转变，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轨道。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谈到党的一般纲领时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为什么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呢？毛泽东回答，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说，"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1940年1月，张闻天（那时他还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在延安作的一个报告中说，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对于"民主的"一项还作了如下的解释："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

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①] 毛泽东没有单独提出"民主的"这一项，只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将"民主的"并入"大众的"之中。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解放战争转入进攻时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缺少的部分。"

1949的3月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鼓励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他说："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

① 《张闻天选集》第252页。

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他说：“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当时中国全国工业产值占10%左右，农业占90%左右，只有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才能为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物资条件。刘少奇天津讲话，说中国还是资本主义太少，剥削有功。这些都是毛泽东表示同意了的。

1949年政协会上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有人主张在总纲中明确写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周恩来说，十年至二十年之内不急于转变，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之时，才能实现这个转变。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谈到当时16个城市有万家商店歇业的情况，“望国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他说：“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改善同他们（指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单一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期。”（《哥达纲领批判》）彻底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单一所有制。（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是适当的）对于目前中国这个东方农民大国，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单一所有制是不恰当的。要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不可逾越。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认识到，经历了20多年痛苦过程。必须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渡时期总路线，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他说：“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他还批评了“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认为“四大自由”（邓子恢，农村工作部：土地经营自由、雇工自由、信贷自由、贸易自由）乃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不及社会主义），行好小惠，难矣哉。”（“文革”中林彪批刘少奇天津讲话为修正主义。）

刘天津讲话3条要点；

1. 走新民主义义，不是旧资本主义。公私兼顾。社会主义是几十年之后的事。

资本主义剥削的进步性。联合资本家发展。必要限制。是朋友不是敌人。剥削有功。工人的痛苦在于无人剥削他们。资本家有本事剥削，于国于民有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有功。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

3. 雇工单干应放任自流，都有三匹马一张犁（东北、山西反映：富农发展，互助组解散。老区不革命，影响了毛泽东。）不要过早限制单干。农民喜欢发财。伤害私人资本工业家、个体户积极性，乃破坏作用。

土改完成后，主要矛盾，并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阻碍了向社会主义转变，首先是：

（1）落后生产力，并非资产阶级私有制。

（2）“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论人民民主专政》）1953 年的前 3 年中，私营工业比重已由 63%降到 39%。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左右国民经济的发展。

（3）落后国家须要首先发展大工业，概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三大改造过快过急过粗。原设想十五年才三年即完成了。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理论上的失误（毛泽东修改，中央批准）：

当时颁发的“宣传提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

的社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亦改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经济基础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总路线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必须清楚。"

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立：

(1) 错误地将新民主主义社会同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立起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已认识到当年苏俄的错误) 二中全会。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非同步转变，先实行第一个转变。刘少奇的"八大"报告，用毛泽东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只承认根据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上的重大变动。

(2) 离开国情，急于消灭资本主义与一切私有经济。"八大"宣布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来是对的。可是不久毛泽东即急遽转变，重新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

(3) 工作重点转移。反右派斗争以后，中间经过"大跃进"的失败，逐渐转变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以发展生产力

为中心。理论上对主要矛盾判断错误，离开国情，越走越远。经济上又急于求成。

（三）

列宁的弯路：余粮收集制。指令性计划生产、分配。新经济政策（小企业、租让制、外资合营、接受外资）。布哈林——初级阶段。只有四年，结束太早。

斯大林模式：

（1）工业化是对的。打下了二次大战胜利的基础。但长期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两种工业化道路，批右倾投降。

（2）农业集体化。快速消灭富农。整村整州，单一模式。大饥荒，饿死800万人；集体劳动，统一分配。

（3）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大规模肃反。肉体消灭党内反对派。思想禁锢，日丹诺夫一套。

（4）急于求成。过高估计发展阶段。1936年宣布已建成社会主义。

《联共党史》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从延安起教育了几代人。

苏联模式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在1949年以后，最初注意结合本国情况，农村政策，合作化，粮食增产；和平改造资本主义。

问题在1953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矛盾认识错误。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理论上的失误，斯大林影响。1955年过

快实行农业合作化，错误地批“小脚女人”。

1956—1957年。《论十大关系》（1956.4），曾想克服苏联模式影响，走自己的路。

“八大”文献：“以苏为鉴”。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调整重、轻、农关系。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苏联出兵匈牙利。整风运动急剧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超英赶美，急于求成，“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走上更“左”的道路。

（一）“左”倾理论和“左”的实践恶性循环

政治上，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毛泽东以反右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宣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判断错误导致实践错误，错误的实践又概括出错误的理论，步步升级。

经济上，“大跃进”的错误实践，“主要矛盾”又贯穿其中。庐山会议。“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阶级斗争导入党内。并非不重视生产力，只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等）的反作用。哲学思想。持续“大跃进”，导致三年困难。七千人大会后搞调整。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已怀疑三面红旗的正确性。林彪的说法不同，七千人会上保护毛泽东过关。刘、周、陈、邓都认识到农村所有制改变过快，影响农民积极性。刘支持自由市场。三个商业系统。直到1965年6月，还支持个体经济。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包产到户。责任田。企业联合。托拉斯。公司集团。(当时毛泽东对这一套极为不满，最初曾隐而不发。)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终于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关于阶级斗争事例，下面有反映）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下面各级许多人接受。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五反、四清。1964年底毛泽东提出：官僚主义阶级乃斗争对象。1965年1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提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提出了理论根据。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文革”的思想准备。

（二）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恶性循环

权力逐渐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领袖的能力。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改组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书记，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实现了一元化领导。对于取得战争胜利有积极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八大批评了个人崇拜。八大通过的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高度集权制也是国际共运中组织方面一种历史特征（残酷的地下斗争环境，战争环境，在未取得政权

以前有其必要性。“一切服从战争”)。后遗症：不同程度党决定一切，统管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以政代企。制度本身的缺陷，取得全国政权后更有所发展，一般一把手较强，资格老，加以中国人几千年封建主义养成的等级观念，定于一尊，习以为常。集权体制同个人“最后决定权”结合，造成了领袖独断专行的条件。领袖个人素质，包括性格这种偶然性。1957年尤其南宁会议之后越来越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凌驾于组织这上，日益骄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专断，日益严重。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

个人崇拜加剧的原因：(1) 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产物。漫长的封建主义的腐朽遗产。小农经济小生产，千百万的习惯势力。领袖说成是一个人，一切成就归于一个人。(2) 广大群众自发的对领袖的热爱（农民需要别人代表)。(3) 本人的默许乃至提倡。(如柯庆施以工于个人崇拜而成为政治局委员。1958年成都会议。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 (4) 林彪、四人帮等野心家的推波助澜。康生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是最高最后的标准。林彪的红宝书，谁反毛泽东的路线，“全党共诛之”。“理解与否都要执行”。毛泽东为路线代表人。路线对一切都对，错一切都错。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林怀特教授提出：1943年即开始。此说似嫌过早)

过去维护党的团结与毛泽东的威信（最宝贵的财富)，出自心愿。庐山都作违心检讨。

(三)“文革”与毛泽东晚年政治思考

主观认为是“反修防修”。何谓修正主义，谁也说不清。

毛以为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1963年在国际上反修，发表“九评”，以赫鲁晓夫的改革、与美国和平共处为修正主义。国内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毛泽东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他的对策，开展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干部下放劳动，防修。1965年10月他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怎么办？1966年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刘、彭不听话）“赫鲁晓夫就睡在身边”。以“左”的观点来看苏联的一些政治经济改革。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中国反党分子要打倒党和他本人，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在群众运动中培养接班人。纯系主观臆断。

公社——五七指示。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

“文革”夺权问题。炮打司令部，一月风暴。“权力斗争”似乎如此。实际上中国党无一人（林彪也许在外）敢做“彼可取而代之”的梦，决无一人敢违反众意夺毛泽东之权。反问：如果毛泽东真认为大权旁落，他能力排众议（抛开政治局）发动“文革”？（“二月逆流”）

普林斯顿大学林怀特教授《论文革的社会根源》：“文革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也是权力斗争的工具。”（麦克法夸尔也注重毛、刘之争。）西方不深刻了解中国。（为什么至今不放

弃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一分为二，功第一位过第二位。）

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彻底改变现状：如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无差别。所有制变了。要“洗刷几百万”，天下大乱到大治。大破大立。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样板第三个里程碑。“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

既有追求新的理想主义，又有重新分配权力、政治斗争的一面。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个班上不满意，要彻底改造这个班子。

既有憎恶、粉碎官僚机器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的一面。既有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反修防修）一面，又有做“君师合一”的导师、领袖的一面。

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混在一起。

（费正清认为：1965年，毛泽东指控其同僚在搞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对党感到失望。求助于军队。借军力。甚至利用《解放军报》做喉舌。江青受林彪委托的座谈会。1965年11月以后，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费认为“文革”有偶然性。

（苏联马林诺夫斯基，1964年11月7日宴会上，同中国人谈：“把毛泽东搞下去”。也有刺激作用）”

毛泽东晚年悲剧及其原因①

一、毛泽东的成功有赖于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共产国际、斯大林）。20世纪空前绝后。创造《新民主主义论》，科学的实践与理论（军事斗争为主，打出来的）。不照搬斯大林公式。教条主义是党的大敌，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

曾要求吸收西方一切优秀文化与经验。对国情、世界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正确认识。党内绝对领导地位。50年代威信高涨。

二、毛泽东晚年悲剧及其原因

急于建成社会主义，但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者都走入歧途。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本意（生产力标准，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基础）。陷入空想。贫穷的、平均主义的、小农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包括一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左”始反右终。陷入“左”（误解）里面无以自拔。自己立的教条主义。失去制约。“文革”走到绝境尚不回头：七八年再来一次。遗言中说一生办了两件大事。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资本主义总危机、总崩溃的时代。赫鲁

① 1993年6月8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讲话大纲。

晓夫批评斯大林之后，反“修正主义”（一切不合己意者）。

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文化（包括《大同书》），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农民得到土地并不能同时在经济、文化上翻身。马克思（斯大林），秦始皇。《圣经》：“帝王之心有不可测者”。

古代家国——党国（一元化领导，党政企不分）。战争年代经验之延续。发动群众政治运动。家长制。一言堂。权力集中于个人。书记挂帅。一把手。无法无天没解决执政党问题。

权力腐蚀人。以权谋私。——当前的腐败。属前资本主义，离真正民主与法治尚远。

在美国加州大学的演讲与尖锐对话[①]

这个题目太大，漫谈可以，作一个报告比较麻烦，题目太大。今年是毛泽东100岁，1991年12月国内出版了我的一本书：《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今年香港也会出版。书的三分之二篇幅在晚年，最后一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长达8万字。大家知道，1980年中国共产党曾组织了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建国以后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主要是讨论毛泽东晚年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决议》。在座不少人可能读过。我是在这个《决议》的基本精神下写这篇文章的。这本书看来老中青三代都还能接受。

我今天讲的就非常简单，先谈一下毛泽东的一生。假如分作三个阶段，早年、中年与晚年，那么他的中年是到了一个顶点。因为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在他和他的理论——毛泽东思想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的。到1956年，中国宣布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他本

① 199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讲话

人来讲，这是一个顶点，一个高峰。尤其是苏联、东欧变化之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处于低谷。可是，中国还在进行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的成功方面很多，他的一生，关键的中年主要是军事斗争，发动群众，形成新式的农民战争。这两个方面是非常独特的。许多人都这样理解，我更强调这一点。作为革命品质来讲，毛泽东的实践家的品质高于理论家的品质，他从来来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他从来不将自己束缚在书本理论里面。他年轻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念过五年半书，几次想退学，他很讨厌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他从是一个独立思考想到就要做到的人。毛泽东最难能可贵的是，抵制了以斯大林代表的共产国际的“左”的教条主义领导。不克服这个巨大困难，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当时党内以王明为代表，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支部必须服从上级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1934年10月长征之前，本来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已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最多在全国有30万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书生造反，上山打游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暴力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都是城市工人暴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而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长期受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怀疑。所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情况过去一般知道的比较少，现在各种各样的书都出来了。

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受过多次处分，包括撤销中央委员，到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撤销了他的军事领导职务，最后只剩下一个空头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头衔。他那时没办法，由于赋闲，做了很多农村调查。直到

遵义会议才改变了局面。敌人是非常强大的。蒋介石有800万军队，有你们美国人的支持（听众笑）。在延安叫小米加步枪，坦克飞机见都没见过。毛泽东的威望，个人的威望到1949年，无论在党内，在全国，在东方，甚至全世界，不晓得你们美国人那时感觉怎么样，反正是到了很高的顶点。特别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内部情况的人，知道胜利是何等来之不易。你看，东欧没有一个党是完全独立的。只有铁托不听斯大林指挥，但原南斯拉夫毕竟也分裂了，民族问题没搞好。因此，毛泽东领导中国走了自己的革命道路，是非常非常难的。他本来的理论、本来的思想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为代表的。1942年整风运动的时候，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讲"左"的教条主义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大敌。五四运动打倒了中国封建的旧的教条主义，但后来中国的革命长期受到洋教条的影响，甚至写文章也是洋八股。经过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他的威信，在党内达到了很高的地位。开国时唱"东方红"，人人都愿意唱。

从早年一直到晚年，从1920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所读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写的《阶级斗争》、还有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毛泽东自己多次讲过，我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的就是四个字"阶级斗争"。这个从他早年参加革命，一直到晚年犯错误，他的胜利从这里来，错误也是从这里来的。我刚才讲了，他把"左"的教条主义当成中国革命和人民的大敌。革命胜利之后，按照原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90%的农民，工业为不到10%。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只有资本主义

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到它的社会内部不能容纳其生产力了，社会革命才会到来，才需要变革社会的生产关系。本来是这样一种理论、一种认识。但是到了1949年后，这种认识逐渐起了变化，主要问题在急于进入社会主义。1949年政协通过《共同纲领》，本来没提 社会主义。到了1953—1956年之间，社会主义在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工商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仓促完成，工商业者是敲锣打鼓在天安门开会，资本家都公私合营了。农业合作化很快进入了高级社，认为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是非常高的。毛泽东根据下面送上来的报喜材料，编了一部书《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为之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书中的材料说，有的合作社垮了，可是一开会，一讲道理，农民觉悟了，合作社又恢复了。这些实践都证明他原来的认识，中国群众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农民的革命精神、奉献精神是非常之高的。连西方的工人阶级也比不上的。大家知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连工人、知识分子都要下乡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本来按照原来的设想，即《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的论述，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应该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存在，特别是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这样来弥补另这样一个几千年小农经济生产社会化之不足。因为小农经济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原来准备用15年完成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计划，3年便匆匆完成之后，于是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到来了。这个时候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影响，毛泽东总在考虑中国走自己的独特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走一条新的道路，比苏联不同一些，而且快一些。

记得“大跃进”时，我跟陶铸比较熟，陶跟我谈过一件事。毛泽东有一次跟陶闲谈，世界上的伟大人物他见过两具，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斯大林。他说，这两个都是不要群众的。为什么呢？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孙中山就靠帮会等势力，去世前经共产党帮助才搞三大政策。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另外一套，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他认为还有什么困难能超过战争中遇到的困难，特别是中国，只有小米加步枪。因此，经济建设难道比打仗还困难吗？所以，毛想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于是，1956 年写了《论十大关系》其中一半讲政治，一半讲经济，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一定会快一些。《论十大关系》中，还提到了要向西方学习各种有用的东西。斯大林的问题出现之后，毛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随即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八大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八大还提出了要健全党的民主生活，讲到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不好，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八大的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反复审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度感到有了宽松的环境，感到春天终于到来了。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提出党内整风。但随着发生了波兰事件，特别是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对匈牙利事件，中国是赞成苏联出兵的，认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匈牙利要推翻党的领导，向社会主义阵

营开火。这是一个国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党的整风运动，很快转变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这是一个转折点，是当代中国政治，也是毛泽东的一生从高峰往下滑一个转折点。首先是政治上判断的错误，认为民办革命、中国革命处在一个交叉点上，不采取剧烈的阶级斗争办法，不消灭社会上的、包括党内的“阶级敌人”，革命不能前进。关于阶级划分，本来是按照人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来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是反右派斗争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一个人如怀有所谓“敌对思想”，就是反动阶级了。以思想意识划分阶级成分。顽固不化，花岗岩脑袋，等等语言都出来了。全国打55万右派，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多。应该说，这些人是比较有头脑的，比较想问题的。也是比较敢于讲话的，不少人是社会精英，包括民主党派中许多有名望的进步人士。还有一些人莫名其妙就打成了右派。这就大大伤了知识界元气，导致人们不敢讲话了。

当时，还有一个反冒进的问题。1956年经济上确有过热的倾向，引起财政、物资等紧张，是冒进了。党内周恩来、陈云等，实际上刘少奇也在内，都认为1956年经济有些冒进，需要降温。这本来是工作中的正常现象。事实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执行得比较好的。这个时候，所谓右派的一些头面人物，他们的言论中也曾有过冒进了的说法。毛泽东对这种反冒进很不满意，认为违背了原来经济快速发展的设想。于是从1957年三中全会开始，就不断提出反对反冒进的思想，认为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这三件标志跃进的措施，而且提到阶级斗争

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将八大路线搁置一边。于是党内形势逐渐紧张起来。1958年1月毛泽东召开了南宁会议，参加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中央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还有两广、两湖和各大区的负责人。会上毛泽东将反冒进的问题正式提了出来，周恩来、陈云挨批评，而且措辞非常之尖锐，认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公尺了。总之，反冒进就是右倾，就是资产阶级路线，政治上提的很高。

南宁会议上的泽东提出修三峡的问题。在座的都知道，去年人大通过了三峡工程应该上马，现在作施工准备。这个问题5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负责三峡的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早在1953、1954年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直接接触，关于修三峡的种种好处，毛泽东被他说动了。毛泽东除了是一个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之外，他还是一个诗人。他有很多浪漫的想法（他说过，我一生的志愿就是骑着马从黄河之源走下来），因此，1956年写了那首“高峡出平湖”著名的词，会上提到三峡问题时，薄一波说，三峡有个反对派李锐。当年我在电力部负责水电建设，关于三峡问题同林一山早有公开争论。于是，在会议的末期，将林一山和我找了去，当面辩论，每人还为此各写了一篇长文。

这场辩论的结果，在座的可能有人知道，是我得到胜利：当年三峡工程还提不到日程上来，从经济建设来说这是长远之事。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在2000万千瓦左右（1958年时全国电力容量还不到600万千瓦），何时需要，还难以说清楚。（附带说一下，直到去世前，尽管水利部门多次催促上马，毛泽东对三峡没有点过头）这件

事说明，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尤其是小人物的反对意见，还是能够接受的。就我个人来说，虽然三峡的争论结束了，可是一种“百年难遇”的“幸运”，却降临到我身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辩论结束之后，毛泽东以“秀才”的名义嘉奖于我，要我当他的秘书。我以工作繁忙作推辞，结果还是要我作兼职秘书。我预感到会出麻烦，回到北京跟熟人说：我会碰鬼的。因为毛泽东的某些性格我知道一点。他的专职秘书田家英是我的老朋友，同我谈过“不好伺候”等情况。古人有言：“伴君如伴虎”。果然，我自己的担心不幸言中，这是后话了。

于是 1958、1959 两年间，差不多历次中央会议我都参加了。“大跃进”期间，大家知道，做了许多荒唐事，许多光凭主观愿望想入非非之事。如钢铁翻一番。搞工业的人知道一吨钢怎样才能得到。打麻将可以翻番，两翻、三翻、满贯都可以。（听众笑）但是搞工业怎么翻？大家不要笑，那个时候人真的像疯了一样。粮食高产放卫星，报纸上一个劲报告，导致各地相互竞争比赛。小麦亩产从河南的 2105 斤，到河北的 3650 斤，又到河南 7320 斤。水稻更是从一万斤到几万斤，最后到广西环江的 13 万斤。就这么翻上去。你们还看到过这个照片吧，有的小孩站在稻子上，稻子可以长得这么紧密，小孩站在上面可以不掉下来（听众大笑）。报纸上真是登过这个照片，一点不假。当然这都是肥皂泡，后来大家渐渐清醒了。包括毛泽东本人。

最后说到正题，就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 1949 年以后经常思考的问题。有苏联的模式，先发展重工来，而且把希勒打败了。苏联的这一

段历史不能抹杀。没有苏联在那边打，美国参战也很困难。你怎么打败希特勒？是不是这个道理？（听众大笑）苏联搞社会主义，大办集体农庄，但是我们过去不大知道集体农庄出过那么多问题。庐山会议后，1960年我被流放了，流放到黑龙江虎林县农垦农场管辖的村子。劳动的时候，发现对面的村子很远有两个白俄老太婆也在劳动。我就问庄子里的人，他们告诉我，这是从乌苏里江对面集体农庄当年逃过来的，嫁给了中国人。肖洛霍夫所写《被开垦的处女地》那个时候，曾饿死很多人。苏联从斯在林时期一直到赫鲁晓夫时，农业总产值没有超过沙皇时代。苏联只有两亿多人，土地广袤，但对农民过重剥削也是不行的。我们当然想走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就是刚才讲的“十大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什么的东西呢？怎样走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呢？毛泽东从中国经济的实际，从中国战争的经验，也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出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写过这个问题。毛泽东一辈子没有到过西方，他两次去苏联，跑的地方也不是很多。他一天以晚喜欢读的书大都是线装书。他的家我去过，当秘书以后，晚上叫去谈过话。他睡个很宽的床，木板床，只睡一边，另一边全部堆的是线装书。房中有一面墙全部是线装书。所以，他的思维、文化知识、接触的东西，他的斗争经验，以及总结世界和中国的革命经验，等等，不能不受到许多局限，尤其不能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正面与反面的影响。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任何感性认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可以这样说，他不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即必须有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到极大了，才能谈到其他如生产关系的最终变革。

从急于求成出发，于是三面红旗，搞“大跃进”，总路线，办人民公社。公社搞供给制，引起刮共产风。办公共食堂被认为是一种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不晓得在座的人吃过食堂没有？我1958年下去也看过食堂，四川、贵州的公共食堂。农民对这种食堂并没有积极性。可是，当时“吃饭不要钱”，以为这就是一种共产主义生活了。毛泽东当时还引经据典，《张鲁传》中记载过，即汉朝五斗米道“置义舍”，就是吃饭不要钱。康有为的《大同书》也讲过公共食堂。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认为五年就赶上英国了，十年、八年可以赶上美国了，几年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那时有个标本——徐水，县委书记是个乱吹牛的人。这个县已经准备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去看过。一时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后来清华大学的教授去看了，每个农民每月发一块至三块钱。教授说，这种共产主义咱们不想要。那时中央下去的领导干部，有的给下边带两本书，一本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本康有为的《大同书》。毛泽东早年有过空想的东西，那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也相当盛行。早年除开《大同书》外，他还接触过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这些我在《早年毛泽东》这本书中谈到过。在一篇文章中我还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在晚年又引起某种怀旧之情。在北戴河会议上他曾正式讲过：古人、西方那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恐怕我们要予以实行。对“大跃进”，特别是那种大炼钢铁，挑灯夜战，毛非常感兴趣，认为有了群众的这种冲天干劲，就可以更快建设好社会主义并进入共产主义了。人海战术，9000万人上山搞铁，影响到很多地方粮食的收割，只有妇女儿童下地，以及刮“共产风”等等的乱

子，引起许多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人很快也就知道了。随后就开了一系列会议，采取措施纠正这些过“左”的东西。1958年11月郑州会议，12月的武昌会议，1959年1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4月的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前朝，都是在清算五风：“共产风”、高指标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除了两次郑州会议，我都参加了。那几次会议主要是初步引导正公社化运动中那些过于混乱的错误，调整1959年的钢铁等高指示。那时不过是做一些“量”的工作，没有认识到“三面红旗”的“质”的问题所在。其实“量”的认识也还存在严重问题。如确认1958年的钢铁翻了一番，其实炼的铁很多都是豆腐渣，根本不能用。武昌会议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7000亿斤，后来查清不到4000亿斤。所以就导致大量饿死人的问题。在一这年多中，作为兼职秘书，我向毛泽东反映过一些情况，提过一些意见，曾给他写过三封信。如说1959年调整后的钢铁指标，也肯定完不成的，不能这样搞“大跃进”，主要从工业方面讲。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粮食亩产万斤已成画饼了。毛找我谈过一次话。我问他，你是农村出来的，自己也种过地，一亩地能打那么多粮食？一万斤、几万斤，你怎么能够相信呢？他说到某科学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太阳能只要利用了多少，打几万斤毫无问题。毛泽东说，我相信科学家的话。这位科学家是从美国回去的。（听众大笑）当然这位科学家是非常好的科学家，很有本事的；但在这件事上，似乎也不那么科学，你不搞农业，完全没有必要去讲这个话嘛。那个时候，说明多少人都头脑发热，不仅农民发热，没有文化的人发热，领导干部发热，连最好的科学家，从美国回去

的也都发热。(听众笑)普遍都发热，这就没有办法了。后来大家都比较冷静下来了，我写给他的第二、三封信还是起了作用的。上海会议是 1959 年 4 月开的，大概在 3 月初，我写的信上说，1959 年 2000 万吨钢的指标，是绝对不能完成的。这个指标不降下来，就会乱套，其他的事情都不好办。信最后写了八个字："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八个字是列宁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我的意见毛泽东听进去了。上海会议讲话时，还大大表扬了我一下。

6月，接着上庐山开会。我写的书《庐山会议实录》，关于会议情况写得很详细。会议前期确实是"神仙会"(这个词恐难翻成英语)，大家都情绪轻松。毛泽东第一次找我们三个人谈话，另外两人是湖南一二把手周小舟（已去世）和周惠。周小舟硬是讲了这么句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就说这些乱子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他听了仍笑容满面。我谈到钢铁翻番，冶金部长王鹤寿很大责任，国家计委听王的话。毛泽东说，这个事情也不能净怪王鹤寿，我也有责任，我也胡思乱想。不然就变成蒋干了，蒋回去要讲，曹营的事情难办得很呀。毛一讲完，四个人一起哄堂大笑，非常愉快。这至少说明，我们这些"小人物"当面给他提意见，他是听得进去的，不会出什么大麻烦。但是彭德怀一封信就惹出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彭是大人物，过去他们两人间，可能有些历史上的疙瘩没有全解开，这也有关系。当然，还同当时会议的形势很大关系。像柯庆施、康生、李井泉等人，是"大跃进"中的兴风作浪者，他们听不进反面意见，要保护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在毛泽东那里说三道四，添油加醋，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

他们要保护毛主席高举的“三面红旗”。由于这种种复杂的因素，庐山会议从开初的继续反“左”，突然转向反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了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当时有人问我对形势的估计怎么样。我说我估计两边都批评，一边各打50大板，“左”也好，“右”也好，都批评。我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写了这样一件具体事情，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性，但是这个偶然性起了很不好的作用。那天晚上，我们听了毛泽东这个讲话感到很不愉快，我同周小舟、周惠仍一起发牢骚。小舟说，毛泽东这个突然的变化，180度转弯，怎么一回事。于是周小舟想去找黄克诚谈谈。黄克诚不让我们去，小舟一定要去。去了后，黄劝导我们不要激动。小舟谈到了斯大林晚年问题。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这件事情随即传出来了，就被误会为我们有小组活动。因为彭德怀和黄克诚在庐山是住在隔壁房间，于是“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就这样被传出来了。过了几天，毛泽东就发出话来，不仅要对事，而且还要对人。林彪上庐山，对批彭定调起了很大作用。最后庐山的结论是什么呢？这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场阶级斗争还要斗30年到50年，还得长期斗下去。我在《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的序言中讲到：“庐山剧变，使得阶级斗争引入党内而且引入党的最高层，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上台。林彪上台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使得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林彪发表过一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认为世界革命也要农村包围城市，那就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西欧和

北美，最后埋葬帝国主义。他认为毛泽东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林彪名堂多了，“顶峰”论、“老三篇”、“四个第一”，等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比你们基督教都厉害。“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大家都是清楚的。犯“左”倾错误20年，最后经济到崩溃的边缘。1960年，中国的总产值占世界的2.4%，以后降到1%。50年代的日本还不如中国。问题在那样一个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的人，那样一个独立思考、遇事何等清醒的人，创造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为什么后来变得那样糊涂，那样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还树立了新的教条主义，原因到底何在？我认为原因是非常之复杂的，有内部的原因，有外部的原因。外部的原因，主要有对世界形势发展错误的判断，从而急于求成建设那种自己认定的社会主义；有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理解、教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00多年前。马克思是1883年去世的《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是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一生有40年在写《资本论》，全面而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的前途。30年代美国发生总危机的时候，西方也有经济学家、理论家认为，苏联计划经济是好东西，社会主义是必然的。最近西方也有经济学家预言，到21世纪的50年代，现在的资本主义可能不再存在，某一种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因为现在的资本主义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有了很大变化，比如出现了所谓白领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有了新的发

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的影响起决定性作用了。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世界上的钢只有3000万吨，也没有汽车，刚开始有电。1880年到1930年这50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总产值增长了10倍；1937年到1987年这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增长50倍。资本主义的发展，内部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变化，三大差别的缩小等，所有这些变化，特别是有了电脑，科学技术是最大的生产力，马克思是不能设想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原来的有些内容，现在也要做新的说明和补充。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预见今天世界的变化，他对社会主义讲的非常之简单，只是一种设想，如《哥达纲领批判》他生前并没有准备发表。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他就有些新的观点，如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可以有暴力与和平两种；也提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有许多东西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的；他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党。

到底社会主义前途如何？苏联、东欧倒台了，他们前途变化又怎样？中国走了二十来年“左”的弯路，“文化大革命”走上了一条绝路，脑袋碰在墙上，非拔乱反正不可。怎样拔乱反正？头一个觉悟就是改革开放。到了十四大，就把这一张纸捅破了：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到了社会主义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尤其是1992年南方谈话后，我们已经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在许多方面首先是经济上有了新的发展，有了新的理解。我们在走自己的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景应当是乐观的。8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一直持续较高速的发展，“三资”企业、个体

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尤其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占整个总产值接近一半了。国营企业也在改革之中，目前大概三分之一赢利，三分之一亏损，还有三分之一中间状态。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办法之一是股份制。现在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发展得很大的，很多大公司大老板股分占的很少，股份是相当分散的，经营管理权多在专家手中。这个股份制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讲过的。股份制即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结果，可不可以说，这实际上也是旧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异化、一种扬弃。整个资本主义今后怎样发展，前途如何，我没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是股份制引起的变化，马克思是注意到了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生长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也是谈到了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起量的变化，资本主义何时起质的变化，是“和平生长 ”还是“暴力埋葬”，这是待历史的发展来解决来证明。21 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这是所有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西方与东方的共识。人类必须争取这样的前途。

我们谈毛泽东晚年错误，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当代的历史问题，一种历史现象。20 世纪中，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上坡路到下坡路。但苏联不管怎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希特勒起了决定性作用。虽然东欧变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一度走了二十来年弯路，但是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至少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各种变化，或者说是不断“完善”吧，也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需要很好地理解，接受教训。我这个人 17 岁进大学学工科，今年 76 岁，一辈子在革命队伍中，这中间有 20 年流放劳动、坐牢。我

今天终于能坐在这个地方，向大家谈古说今，臧否人物，这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好事——坏事——好事的一种变化。我认为这是一种向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同中国同步的。虽然在座不少同我的观点不一定一致，但是我还是要说这句话，要让我选择的话，我选择社会主义，我不选择资本主义。（听众大笑，长时间的笑声）因为这是一个人类发展的问题，是科学的问题，不是由哪个人的感情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这是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是不能由任何人的意志随意转移或改变的。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犯错误呢？我在我写的书里曾经总结了6个原因：

第一，是国际的影响，国际共产主义整体运动的影响。

第二，是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这种封闭经济社会的影响。

第三，是我们这种国家体制、党的体制是高度集权的影响。地下党，有共产国际的渊源，根据列宁的精神，是集权的。打仗，司令员发命令，在军事条例上，参谋长对司令员只能提两次意见，第三次再提意见，就是非法的。这种战争年代的经验遗传，尤其党的一元化领导最后演变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毛泽东本人晚年形成的独断专行。

第四，就是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民主这个东西，美国人是非常熟悉的。三权分立维护你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这是西方和美国的历史发展形成的。美国这个民主制度，搬到我们中国去行不行？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国家不同，社会不同，历史发展不同。应当说，自古以来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孔夫子也有“民主思想”，是民本主义；“民

为贵，君为轻”，孟子说的。这跟现在的民主是两码事。现代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特别要尊重反对的意见。办事做学问，反对的意见不怕多，集思广益，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曾长期不习惯。有很多所谓“民运”分子，到美国来了。最近我听说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老干部王若望也来了，我们是老熟人，听说也卷进去了，这么几个人的民主都搞不好嘛。（听众大笑）是啊，这个民主也很麻烦，总之是非常麻烦。王若望老兄我们过去在延安一起呆过的，几年前我对他说过，你是满头辫子被人抓着，他确有点喜欢哗众取宠。（听众笑）当着面，他来了，我也要这样讲他的。他那一套在中国是不行的。邓小平说过，没有高度的民主，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虽然还没有很好解决，但是我是乐观的。为什么？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竞争，要求自由，要求民主；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平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只要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坚持下去，国家必然要相应建立一套民主的制度。民主与法制是并行不悖的。

第五，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身上的一种负作用。这方面我也写过不少文章。他自己就讲过这种话：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听众笑）毛泽东确实喜欢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也喜欢曹操，对朱元璋也感兴趣。他们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过作用。他没有太称赞过唐太宗。大家知道，唐太宗有个很好的夫人长孙皇后。宰相魏征，原来同李世民作对；后来李世民得了天下，魏征过来了。魏征就喜欢发表意见。一次，唐太宗回到宫里对皇后讲，魏征这个老家伙可恶得委

很，要除掉他。长孙皇后就加以规劝，说魏征的好话。唐太宗终于听进去了。不过唐太宗的晚年，还是听不进反面意见，独断专行的。魏征这样总结过开国之君的教训："善始者实繁，克终者实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千年前封建统治者之言，似乎也是对毛泽东说的。历史竟然如此之无情！

专制制度与专制作风，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问题，沉重的历史包袱。民主这个东西，用急躁的办法，用"六四"天安门的办法，不能解决。你们美国老用那个人权来压中国，也是不行的，起逆反作用。你们跟克林顿反映一下行不行？（听众笑）不要这样搞，没有好处。（听众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有极大的好处，但是那些封建的东西又有很多负作用。历史很不幸，在毛泽东身上就发生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时还搞了一场"儒法斗争"的闹剧。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问题，这是东方国家的历史遗产。毛泽东自己就讲过，西方绝对不会搞这个东西。"文化大革命"西方绝对不会产生。但是也有希特勒。（听众大笑）德国已经彻底总结了希特勒的教训。可是日本没有总结军国主义的教训，还值得我们警惕。恩格斯讲得非常好，任何一个人都要受三种限制，即时代的限制，个人知识经验和思维能力的限制。马克思也受时代的限制，他不能预见到资本主义有现在这种发展。列宁《帝国主义论》讲垂死的资本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会受国际垄断资本的限制，科学技术在垄断资本下不能发展。任何一个人不能逃过这三条。西方难以搞个人崇拜，这非常好，使人羡慕。

第六，刚才讲了，也有教条主义，而且还有狭隘的经验主义，把战争年代的经验、发动群众的经验，都用来搞经济建设，搞“大鸣大放”，人海战术。同时老整人，老搞运动，以为这个东西可以推动社会前进。回想起来，真是非常难受的。现在应该说，基本上转变过来了。中国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希望今后是一级公路，最好是几股道的高速公路。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说“千万别再扭秧歌”。扭秧歌，进一步，退一步这么扭着前进，希望不要再扭秧歌，顺顺当当前进。在国外的留学生对此都有责任。我的话完了。(鼓掌)

主持人：下边是否可以提些问题?

答：按你们的规矩吧。

问：你对周恩来的个人品质怎么看? 共产党自己的前途如何?

答：周恩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人里来讲，与毛泽东是同一辈人。他是从法国回来的。中国党的总书记都出过问题，一代一代都出过问题。周恩来同每一届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一直到去世，都在位。举一个例子。1931 年的上海四中全会，是王明夺权。四中全会开了一天，王明、米夫从“左”的观点出发，批判瞿秋白的所谓右的“调和路线”。米夫是苏联人，同王明的关系很密切，“代表国际”发言用俄话。目的是把中央的权从瞿秋白的手中夺过来，交给王明一伙。很多地方党，如北方党听说中央变了，出了个王明，大家非常怀疑。但听说周恩来还在，于是相信这个中央。所以，周恩来在党里起这么一个作用。可以这么讲，同林彪比，毛泽东对周恩来是不喜欢的，认为他过去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还有经验主义。但是党和国家离不开周恩来这样的

领导人，没有人管家，没有人管吃饭总是不行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起着一种特殊的维护局面、维持运转的作用。比如我自己，当时流放在安徽大别山里一个小水电站，在那里当文化教员。1967 年 8 月，中央的专案组来外调材料。我就问这个专案组谁负责？他们告诉我周恩来负责，我就相信了。那好，我就问他们向我调查什么呢？向我调查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三人。“他们三个在庐山会议都谈过一些什么?”我说，在毛主席身边，他们三个不是危险的，我说危险人物是陈伯达。陈伯达那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正红的发紫。于是我谈了对陈伯达的一些看法（他们不能带揭发陈的材料)。我这个人糟就糟在这个地方。(听众笑）我说那我给总理写封信，我就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过了两个月，他们把信退给我，说这个信不能转。我知道问题就麻烦了。我这个人平生坐过两次专机，一次是开南宁会议，一次就是 1967 年 11 月 11 日被捕。这一次，是把我从安徽直接载到秦城关起来。(听众笑）我是一个普通干部、普通党员，对周恩来就是有这么一种信任，知道他是不会这么乱来的。但是你们读过邓小平的文章没有？文章中也说道：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讲过违心的话，办过违心的事情。这个没有办法，周恩来不是彭德怀。我个人认为，周恩来大概是中外古今最难当的一个“宰相”，他当到这个程度已经是了不起了。“文革”中他保护了很多人。仍以我自己为例。1970 年，那个葛洲坝工程开工后不久，马上出问题，地质出问题，停工两年。附带说一下，为什么要修葛洲坝呢？有了三峡才需要葛洲坝。为了利于航运，需要修一个反调节水库，因此，从开发程序上来说，颠倒了。

葛洲坝是1970年12月26日开工的。那一天正是毛泽东的生日。毛有个"最高指示":"赞成修建此坝,现在修建是一回事情,将来在修建过程中出了困难,要修改设计,是另一回事。"这个指示违反了基建程序。开了工,怎么能够修改设计呢?这是胡来嘛!这件事也是周恩来经手的。停工后,他主持讨论,开了几天会。出这种不应当出的事故,他很生气。有一次在会上,他问:李锐在哪里呀,他早就讲过,长江不要干流先动手嘛,先开发支流嘛。有人讲,李锐被关起来了。周说,放出来也好嘛,提点意见也算劳动嘛!但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具体管。我1975年才离开秦城,那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的事。讲这个例子,说明周恩来对人非常关心。当年他没有可能挡住"文革"潮流。这个问题就这样回答,好不好?

有人提:共产党腐败问题。

答:昨天我在洛杉矶分校谈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站起来,非常慷慨激昂,讲了很多,他说共产党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私无公的党。(听众笑)我说我是共产党员,你的话我不同意。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这些人大部分还是在共产党里。当然你们之中有些人不愿意入党。从电力部退下来以后,1982年到1984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管干部"四化",管年轻干部的选拔。中组部工作三年的情况,都反映在我的《起用一代新人》这本书中。几年中青年干部局共选拔了约1000名合乎"四化"标准的年轻干部,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这么多年来,证明这1000人中90%以上是好的,称职的,都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我们只能说,共产党员中有腐败分子。公安系统、警察中,

也有违法乱纪的，执法犯法的也有。可是，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也是没有办法的。好事不出门，丑闻传千里。昨天我说，你们一定听到了某某干部怎么样腐败了。我就对那个发言的朋友讲，你把名字告诉我，材料告诉我，我回去一定转告江泽民总书记。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因为我确实不了解情况。如果讲错了，你们这个地方法律很厉害，要办诬告罪。(听众笑)

问：你讲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就想到一句中国古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答：对！我觉得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有一个发展过程，到了发动“文革”，达到登峰造极。我写的一本书《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谈到这个问题。希望你们有机会能翻翻这本书。我不赞成俄国现在的做法，把斯大林甚至把列宁说得一无是处，这不是历史的态度，对历史不能感情用事。

问：50年代末期，中央是不是有人在有计划地取代毛泽东？

答：没有！绝对没有！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大跃进”时，我亲耳听刘少奇在小组会上讲：“我们比毛主席差一大截。一大截，不是一小截。”在上海会议上，听邓小平讲过，“毛泽东可学而不可及”。

问：京夫子写的书你觉得怎么样？

答：我见到过这本书，没有通看，只翻过一下，其中有许多胡说八道。他还写到我，有的事实都写错了。作者我知道，是湖南的作家，“文革”后，出过一本小说，编成电影，很受欢迎。我向他提过建议：你熟悉农村，应当写中国的农村，把40年中国农村的变化写出来，像肖洛霍夫，写三部

曲、四部曲都可以。他不懂外文。大概因为家庭关系（跟妻子离婚），到了加拿大。写这样的书，是否为了赚钱！我的书不赚钱。（听众大笑）出版这种书，至少是对历史不负责。（插问：你的书在国内发行怎样?）《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印了5万本，一下卖光了。所以我很乐观，老、中、青三代都爱读《庐山会议实录》和这本书。

问：你是水电专家，你对三峡工程怎么看?

答：我反对，一向反对，反对到底！（听众笑）我也有专门的书《论三峡工程》，李锐著。（听众笑）怎么样，完了吧?

主持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问：请问李老师，“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从毛泽东个人角度、社会角度来讲。

答：简单地说，我这样认为，毛泽东当年对国际形势作了这样的估计：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到底什么叫修正主义？也讲不清。大概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向美国投降，世界革命没有希望了。认为国内，也有很多人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农村基层组织，还有工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上。到最后，搞“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认为党内、党中央存在资产阶级。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文化大革命”才发动起来。

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响应他?

答：你在国内也会响应的。他（指主持人，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J. W. Esherick）也是红卫兵，他当年是美国的红卫兵啊！（听众大笑）

在国际研讨会上谈中国革命与“党国”

关于中国革命的若干看法①

一

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而开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红军得以胜利完成长征。

毛泽东上井冈山以后，克服种种困难，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建立了强大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毛在中央苏区时的弱点，用人唯亲，如用李韶九打AB团；脾气不

① 1993年5月31日至6月5日，在美国克罗拉多大学召开一个命题为《1936—1965中国的党与国家的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and State Sociaclsm in China 1936—1965）的国际研讨会。有来自美、法、德、英、荷、俄、澳、日、中国和台湾10个国家和地区的32名汉学家和著名学者参加，该大学和所在地的一些教授和社会活动家列席了会议。与会都交有论文。这是会议第一天我简短讲话的提纲。

好，使人疏远（黄克诚谈）。

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和理论。毛泽东在反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中起了决定作用。同各种“左”的错误与“左”倾教条主义（由国际斯大林控制的），斗争极其不易。

王明路线在军事方面的影响（米夫、博古），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损失90%。（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认识，在变化中。）导致长征。长征中的争论。毛泽东争取张闻天、王稼祥，导致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结束，到达陕北。

（遵义会议前三人小组领导一切）。

二

陕北苏区的作用和西安事变的影响。

落脚点与出发点。这部分红军得以保存（很危险了）。特殊的地理位置（抗日前线）。延安为中心：革命圣地（全国革命青年来归）。

西安事变（西北军、东北军中长期有党的作用。杨虎城、张学良的爱国、开明＝容共）。两大作用：蒋被迫抗日；红军得以保存发展。

三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地位完全确立，思想统一，党的一元化领导。

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首先军事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其全国影响。辩证法。哲学思想。

同国民党的斗争。统一战线。有理有利有节。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实践论》、《矛盾论》，也是以总结战争经验为主。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

《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决定中国走什么道路。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二步。

整风运动批判、总结王明路线的错误，提高和团结全党。(抢救运动的错误说明什么?) 一般干部受到阶级教育。

党的一元化领导，导致全国解放胜利。毛泽东的个人决定权始于 1943 年 3 月的决议。毛泽东与党的无上权威，党政军民不分，一切统一于党领导，战争年代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否则革命无从获得胜利。

四

国民党的崩溃。战争的胜利。

日本投降前后的美蒋关系。苏蒋关系，斯大林的态度。

和平谈判。当时并无全国到手的雄心，只提出争取东北，扩大华北。

美国政策（?）和平溶共，同共斗争——支持蒋。白皮书。

蒋的错误。毛终于“和清一色”（原来是“平和”——打麻将的比喻。）

五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一）马恩列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党领导一切，高于一切。A. 列斯对世界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世界革命的方针。（苏联第一。输出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总崩溃的时代。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等）。以及共产国际“左”的传统、专制传统的影响。（秘密党的条件）。B. 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影响，历代“明君圣主”的统治权术和经验，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C. 本人经验。主要是战争的经验和发动群众（群众运动）的经验。根据地

的一元化领导。延安经验也影响到建国以后的党政不分。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D. 中国土壤。封建社会与自然经济。中国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特点，对专制主义的纵容与容忍。

毛泽东在接受马恩列斯的旧教条之外，又补充了自己的新教条：A. 消灭一切私有制，所有制关系决定论；B. 发展的高速度（三年灾难）；“大跃进”。C. 古今中外的空想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临终前说他办了两件大事。

执政党地位，仍强调“一元化”。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天下大乱”做到了，“天下大治”则有待后人。

党内在重大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中央或地方领导人与毛泽东相左时，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权威受到挑战。不论从客观上看或主观上看都是如此。不赞成西方所说的：权力之争。当然，毛泽东担心也不愿意中国出赫鲁晓夫，死后有人做秘密报告。

毛泽东意见常变化，不好侍候。

毛泽东好用极端手段处事治人。不到黄河心不死。像关于原子弹的说法。

向毛反映意见，关于材料准确性问题，提供材料的人关系甚大。

六

林彪的作用。

1958年5月到7月，军委错误地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毛泽江说：苏联经验有好的、不好的、坏的三种，不要因反教条主义而否定一切。

庐山会议后，林彪到一线，主持军委。根据毛泽东“以我为主”方针，林推行了一整套“左”的东西：“捷径”与“顶峰论”——只学毛泽东，不必学马列，学毛泽东著作“一本万利”。“第三个里程碑”。“马克思没有写过什么哲学著作，列宁不过几篇小文章。”导师中毛泽东最伟大。“肚子里可以开飞机”。要服从、崇拜领袖。“要背警句，带着问题学。”背几十句就差不多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老三篇”。罗瑞卿、谭政反对。1961年4月30日罗在一个会议上说：带着问题学，那就是找现成答案。这句话不好，要学精神实质。这是庸俗化，简单化。(林首先整罗。)

紧跟。高举。1963年提出21个字方针。

“四个第一”(1961年9月12日)：

人的因素第一（人同武器)。

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同其他关系)。

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同事务性工作)。

活的思想第一（书本与活思想)。

“三八作用”。总强调突出政治、狠抓思想（思想一闪念)。

精神原子弹。精神第一。

推动党的“左”倾错误，林彪起了很大作用，尤其在军队。为发动“文革”打好了思想、个人绝对服从的基础。

林彪：正确与不正确的东西，你不攻它，它即攻你；你

不造它的反，它即造你的反。

关于“党国”的几点看法①

两天来参加会，学到许多东西。外国朋友如此关心中国问题。原不大理解 Party - state 一词，现在理解了。

探讨历史、历史观点：尊重事实，追本溯源。政治家也应当是历史家，不懂历史无法谈政治。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

一、中国的“党”源于“家国”

人类起源：氏族、家族。母系、父系。中国有历史即有家族观念。部落、诸侯→家天下，一姓治国：父传子（嫡子，长子）。历史意义：免于动乱，天下稳定。

“天地君亲师位”（旧社会立于家家户户的堂屋中）。天坛、地坛、太庙、文庙。君子务本，本固邦宁。孔子思想“礼”与“仁”。儒教被推崇为礼教。“礼”的中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臣关系即父子关系。三从四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汉

① 这是 1993 年 6 月 2 日下午在《1936—1965 中国的党与国家建设》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文帝以孝治天下。蒋介石私淑曾国藩。国民党徽下即写“礼义廉耻”四字。

几千年封建统治：小家经济基础（不同于游牧民族）与儒教利用（孔子学说经过历代发展。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仁与礼（仁爱，上下尊卑，三从四德）。洪秀全失败（拜上帝教），曾国藩胜利（维护礼教）。毛泽东青年时曾说“独服曾文正”，曾国藩讲“大本大源”：哲学思想。对青年毛泽东也有影响。

二、中国近现代革命——国民党

孙中山辛亥革命——同盟会（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中华革命党（按指印，服从总理。不算帝国主义旧帐）。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后，国民党靠共产党帮助，才在全国发展起来（除广东）。苏联援助北伐。蒋介石叛变革命。蒋介石阶级立场坚定。

蒋介石反共、媚外，导致国难，华北自治。

我们这一代人亲自感受：1927年我10岁，长沙欢迎蒋，童子团头头。中学时代，读左翼小说，受鲁迅影响。响往共产党，对蒋绝望（新生活运动）。

抗日战争——国民党宣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

以党治国。蒋两手抓：军队与党（中常会主席——李登辉）。

安内攘外。"国无两党"，"宁错杀一千，不放走一个"。我的家乡平江县人口减少一半（绝大部分死于国民党的烧杀政策。有姓名烈士达七万人。）

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终于胜利。

秘密党（共产国际、苏联把着手教）——白区、单线联系，对上级绝对服从。列宁斯大林党的传统。中国党是共产国际一支部，绝对服从。

列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沙皇与战争，形成集中制、党专政领袖专政理论。落后，暴力，资本主义包围。列宁特别强调领袖作用。

斯大林的发展。党的领导作用最高表现为"专政"。国家机构与群众组织等皆党的工具。对斯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大规模清党。

中国在战争中建立的党（毛泽东为首）——离不开群众（农民），离不开军队。党军合一，毛泽东称"武装团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铁的纪律、组织观念（无此，一切谈不上）。

毛泽东突出的地位。不仅会找仗。正确的军事路线与政治路线。对富家、工商业的正确政策。（江西吃不到盐。长期吃包包饭）毛泽东战胜了斯大林（国际）"左"（右）教条主义。（这是最大困难，难而又难）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和理论。

遵义会议后领导地位确定（张闻天、王稼祥的作用。张

是“开明君主”)。

延安的作用：落脚点与出发点。整风运动（统一思想，确立毛泽东的权威)。(抢救运动。打AB团等经验未全部很好总结。但一个不杀，九条方针。康生后患）毛泽东系统读书，理论形成《新民主主义论》。

西安事变的意义：逼蒋抗日，红军休整发展。

毛泽东的威信：理论与事功。1943年的决议授予毛泽东个人决定权。

四、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是战争年代根据地的必然产物，有其合理性。党政军民不分。党政合一。党指挥枪。党领导一切组织。2%脱产人员。没有这个制度，战争、革命不能取得胜利。根据地分散，领导与政策必须统一，克服山头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革命必须有一个领袖。苏联经验。孙中山、蒋介石经验。中国党自己经验。

延安时期（整风加深，组织上固定，党政军合一）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是硬封，他的历史功绩与思想正确，自然形成。军、政、思、哲学家）历史证明其正确与合理。

1947年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蒋自取灭亡，违反了美国政策。毛泽东的“平和”，联合政府，原非“清一色”。

美国政策（白皮书）。扶蒋溶共（溶共，政治、经济慢慢来）。

天下归心——民主党派，国民党将领与高层人士，广大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城市工人。农民是天然同盟者。一首“北国风光”，风靡重庆。

五、胜利后急于求成。晚年悲剧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逐渐走入歧途。

1949年《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蓝图，未提社会主义。民主人士要求写上。周恩来答：这是五十年后的事。

农民大国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距离太远。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市场经济。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马恩加列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后来发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党领导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三大改造三年完成（认为农民先进，越穷越落后建设社会主义越容易，积极性越高）国家垄断一切包揽一切。计划经济的功与过。

受国际环境影响（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第三世界革命形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两个世界市场。苏联卫星上天等等）。

急于求成。改变走苏联道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整风——波匈事件。反右——反反冒进——“大跃进”。1957年推翻“八大”路线。

自立新教条：可以高速度。人民公社（空想社会主义）。“三面红旗”——走自己的道路。

不服输：庐山会议导致“文革”。国际反修，两条道路斗争。

“抓革命，促生产”，两败俱伤。

“走资派”就在党内。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社教、“四清”——“文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林彪作用：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最高峰。“顶峰”论。紧跟论。“老三篇”。“活学活用”论。立竿见影。“四个第一”。第三座“里程碑”。世界革命领袖。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影响。国际影响。对毛泽东本人的影响。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论。

马克思+秦始皇（斯大林+秦始皇）。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党的悲剧——中国历史发展的悲剧。

毛泽东悲剧的六个原因。（见《毛泽东晚年悲剧细说》）

六、中国前途。Party State 前途

老中青三代在思想解放中。以我的两本书作例。一系列反“左”书的出版。市场经济结果，与思想解放、国家体制改革的关系。

中国将来必有变化，现在在变化中，首先变向市场经济，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变化不能从外部。

只能从内部（民主化，体制改革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变个人专断）。1980年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如何一一落实。

邓拓自杀前遗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吴晗的遗言亦相似。“知遇之恩”。

梁漱溟、胡风至死不反毛泽东，不反共。

我自己：自动投入，找党。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76岁，八分之一时间在监牢，至今不悔。

历史地看毛泽东，历史地看党。

目前乡镇企业已占50%。经济基础的变化必影响到上层建筑。多元经济，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引进外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留学生。市场经济必引起政治及其体制的变化。

国有企业的改革，公有制基础，共同富裕的基础。今后历史再不可能出现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人物。

稳定——政治改革的前提。

中外研究毛泽东之新况[①]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他的一生，曾影响甚至主宰过中国的命运；他的一生，不论胜利和失败，贡献和错误，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即立志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终生奋斗目标，未尝一日稍懈。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习惯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曾长期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因此，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国外已经发表的有关论著数以千计，近年尤注重研究毛泽东的晚年实践及晚期思想。

在毛泽东生前，国内出版过若干种写他的书，其中多数很难说是科学的研究，陈伯达在延安写的几种论著，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曾发生过较大影响。萧三的一本，提供了一些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传记材料。我在50年代写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曾影响过一代青年，也是政治价值高

① 此文是1988年11月为《晚年毛泽东》一书的序言。原载1989年2月2日《光明日报》

于学术价值；1980年再版本是增补改写过的，其影响似乎在国外大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时出现了许多宣传毛泽东事迹的印刷品，还出现了几种民间版本的文集和语录。这些更谈不上研究，大抵不过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宣传品罢了。只是在民间版的文集中，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若干不易见到的未经核实的材料。

对毛泽东研究的真正突破，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毛译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现在不仅有全国性的组织，还有好些地方组织，出版了多种期刊，专家学者定期集会，有关论著每年几百篇，出现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呈现出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局面。毛泽东本人对历史和党史的研究，从来主张百家争鸣（他曾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试想一下，如果没有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没有随后理论务虚会的讨论，如果没有《决议》起草期间全国4000人的讨论，能够写出并通过这样好的《决议》吗？《决议》通过之后，八年来，对毛泽东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本书就是近年国内报刊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论文的一个选集（也收入了少量尚未发表过的文章），它反映了学术界所达到的新的水平。

在毛泽东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最重要的，而且

是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一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的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关于毛泽东尤其是他晚年，国外有许多学者在进行研究（他们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比国内还要早一些)。敌视中国共产党和抱有成见的人的那些简单谴责或恶意诅咒，当然谈不上什么科学的研究。许多严肃的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表了许多学术价值的论著。如多次来华的施拉姆教授，他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政治传记《毛泽东》(现已翻译出版)，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有的学者在论著中，也常不免带有某些片面性，或强调个人责任，或着眼于高层权力之争，或从气质、性格方面探求，或所据资料不够确切而影响立论。不过这些著作都有某些可取之处，能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深入研讨，对比之下，我们确有某种惭愧之感：对于这位巨人的研究，难道我们反而落在外国人的后面吗?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的研究，国内近年已有了新的开展。如有的高等学校已为此开设了选修课程；中央党史研究室已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大量论文不仅见于党史刊物，也见于其他刊物，还出版了有关的专著。这一情况自同改革、开放深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来自昨天、昨天影响今天。人们认识到必须对历史进行反思，重新认识过去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从中汲取教训，求得借鉴，这样我们才能轻装前进。当前许多新学科、新知

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当代哲学等为人所重，重新学习，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为热点等等，也都有助于这一研究的开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关于毛泽东研究青黄不接的装况已经有所改变，现在已涌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是这方面的主力军。这本书的作者除开黎澍和李泽厚是著名的老年和中年学者以外，就都较年轻，他们的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本集子里的二十几篇论文，把毛泽东晚期思想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环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不但能够看出他是中之非，而且还能看出他非中之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黎澍同记者的对话说：看来是对身后之事不放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所凭借的，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有了这两条，人们就疯狂地“反修”，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起于60年代初的“反修”，是教条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就更是什么都是资产阶级，简直使人坐立不安。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极端僵化的斯大林教条。为什么产生教条主义？由于愚昧。愚昧来自贫穷。文水平、理论水平都很低，不知世界之大，只守着这么一点东西。教条主义只有拚命“左”倾，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就是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甚至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实际上搞成愚民政策。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佳土壤，这与中国的小农经济联在一起：有人要人崇拜，有人要去崇拜。个人崇拜的萌芽，就在个人专断，也就是家长制，封建社会派生的人身依附。黎澍认为，个人专断

与家长制这一现象，至今还值得注意。李泽厚的文章提出：在毛泽东那里，本来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的唯物史观范畴，逐渐变成了超时代的道德伦理范畴；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超时代的政治内容。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而这种道德主义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中，有其深厚基础。“文化大革命”，便是由新的术语装点，植根于小生产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沉扬的论文也分析了毛泽东对待社会发展的伦理态度，指出它高扬的，不是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风貌。这种伦理态度，又是同小生产的中国社会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道德观难以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天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弊病出现了。可是他却想运用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制度基础的矛盾。他想用超经济的力量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萧延中认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主导，是人为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想以专断实现民主。毛泽东感到人民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但不愿“继续革命”的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只有他自己率领“造反有理”的广大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他晚年堕入多层的思维陷阱，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宰性，把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看成单纯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的派生物（“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人际关系上，将“统治”与“管理”相混淆，将复杂、多样的交往关系简化为“你死我活的

阶级斗争”；把“救世主”的“自我”意志，自觉或不自觉地当成全民族力量的发源与中心。“相信群众”实际上只是“相信自己”的代名词，从而走上靠个人专断以实现人民民主的迷途。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同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经济基础与民族心理等密切相关，否则就难以解释他的即兴之语，竟能在亿万人民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毛泽是“民族大我”个“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郑谦认为毛译东正确地指出了斯大林否认矛盾的存在的片面性，但又走上了另一极端，老强调斗争性，忽视同一性，以致最后把斗争绝对化为否认同一性的斗争性。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直到“文革”时“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形成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斗争哲学。石仲泉和王禄林的文章，细致地分析了毛泽东由于误解了马克思的一些提法，而导致实践上的失误，我以为这些见解都很深刻。我曾经参加当年4000人对《决议》草稿的议论，大家对毛泽东晚年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发表过许多意见和看法，我也对毛泽东伟大的一生（“功劳第一，错误第二”）作过概括性的发言。回想起来，讨论中似乎没有听过上述这样的讨论。有的意思接近，但还没有这样明晰。书中值得重视的好意见还多，就些文章见诸报刊后，在读者中已引起广泛反响，这里就不再列举。当然，不能说，这些文章的内容和论点都很确切，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

我很同意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这一概述：“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

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化系。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应加上一句：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某些正确的思想，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等等。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同毛泽东思想有严格的区别；但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也不能等同起来。”据我所知，当前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关于“个人崇拜”形成及发展社会基础；毛泽东前后期思想的比较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同马列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晚期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许多中青年学者希望，这种研究需要分门别类作许多专题研究，也要走向整体研究；不要述而不作，要由描述性研究走向高层次的分析；要重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有关理论；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认为，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题目。我们当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之时，要从旧轨道转入新轨道，问题丛生，我们面临世界性的新挑战，我们要解决的新问题多极了。我们的口号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似乎不应当老纠

缠旧帐，回顾过去，以免分散精力，或者如通常说的，不要影响安定团结。然而破旧立新，两者是紧密相联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既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同我们今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文化背景、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改革的历史负担，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毛泽东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不论是研究他早期、中期或晚期的思想，都应当看作是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在中国实行改革，不研究中国，不研究当代中国，岂非笑话。在这方面是不应该有什么禁区的——只要它是科学的研究。我们相信，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其“左”的错误思想）研究的开展，必将在指导理论方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书编者命我作序，我没有推辞，一则表示我对这一工作的赞同，一则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于是草草翻阅了集子中一部分文章，记下一点读后感，加上一点我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就算是序。

毛泽东与儒墨道佛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①]

在纪念毛泽东 90 诞辰的文章中，我曾推荐过汪澍白主撰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那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天上接回人间：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现实冲突中作具体的历史考察，又研究他早期哲学思想形成和转变的双重渊源。时隔四年，又读到作者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出版）。这部新作虽是单篇论著的保集，但涉及的领域更广，时间跨度更大，融历史叙述、具体考订、思想探索与理论概括于各篇之中，言多有中，新见迭出，其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即如书名，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时下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时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大多只溯源马列，不详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亦不深研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问

① 此文是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写的书评。原载 1988 年 3 月 28 日《人民日报》。

题。而有些热衷于文化讨论者，又往往避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毛泽东思想的演变，以至彼此如参商之难以相接。我一向认为，两者之间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不揣谫陋，为揭示此种联系，开始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的实践和创造。那么，究竟“中国化”、“中国环境”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显然，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并非空白，但多限于从文史角度的语句索源之类，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只是在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所论述。像汪澍白这样将两者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论者多远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之争，近及当前的改革与开放，对“五四”至“文革”这一大段的复杂演变则很少论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这一大段正是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和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建党以后特别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思想从萌芽、生长到成熟；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 1957 年以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前进中发生曲折演变，终于导致晚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会从不同的角度穷本探源，纵横比较，来进行评价。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

对待当前或瞻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选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大跃进”失败以后，他才着意研读政治经济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深且巨。全国解放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尽管运用观点，不必引证，但以下情况也决非偶然：通观《毛泽东选集》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能批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尤其《资治通鉴》是常置案头的，跟人说过，他读过七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一般来说，儒墨道佛尤其儒学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些传统通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如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的，吸取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其间的吻合、差异、背离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学术界继续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有人将“社会主义”译为“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等等现象，足以说明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

系，是何等重要。

从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灵魂。在《实事求是与儒家文化传统》一文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而且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即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向“内圣”“外王”两途发展。以后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援释入儒，一意讲求“内圣”修养；而陈亮、叶适则致力于事功之学，至顾炎武、颜习斋更提倡“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蔚为“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喜好此种学风，身体力行；参加革命后，更加重视实地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将斯大林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创举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的表现，攻击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他们可笑地提出，“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作者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偶比：“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那么，毛泽东所创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作者还考察了晚清及近代湘学传统的重要特征，理出从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影响到毛

泽东这样一条“实学”发展的脉络，尤其对“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为学治事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早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了切实的论证。在延安发动整风学习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报告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作了新的科学解释，用它来清算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和新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者指出：“实事求是”本是儒家实用理性的表现，它凝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个古老命题加以改造，就把中国这条革命巨龙点活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是在新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继承了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那么，他的矛盾观则从道家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作者溯源《易经》和《道德经》，说明毛肯定了古代的两点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并以老子祸福倚伏之说解释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经常讲的“一分为二”也是宋儒从《周易》转化而来。当然，毛摒弃了道家在矛盾面前消极无为的守雌观点，而代之以革命精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管内外矛盾何等错综复杂，毛泽东总是尽力创造条件来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同时，作者也指出道家社会发展观中的“循环论模式”给予毛的消极影响：从早年“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的“治乱迭乘”的认识，到50年代和60年代初，将辩证法思想“一分为二”绝对化，否定合二为一，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直到1966

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竟这样提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作者痛惜地说道：“他甚至得出由治到乱，由乱到治，七八年来一次的可怕结论，远远地离开了辩证法，倒退到循环论。”由此也可从正反两面显示出“文化传统”的启迪意义与惰性作用的互相交织，古为今用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但十分重视分析中国国情和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曾主张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问题是在当时所处的农村环境中，实际上很难贯彻这一方针。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一贯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长期忽视肃清封建遗毒的严峻任务，以致封建思想文化的阴魂长期附着于社会主义的躯体，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附加了许多错误观点。同时由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发展，昧于所谓国际形势的两极对立，以所谓“反修、防修”为国策，为评定一切言行的准绳。一个曾经同斯大林教条主义作过胜利斗争的人，又为斯大林教条所束缚，走向主观意志的极端，推动一次又一次向“左”转的运动，终至出现十年“文革”的巨大悲剧，也造成他个人的巨大悲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如不经过彻底的清算与批判，要使之同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断生长出新的花朵，是极为困难的。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从正反两面说明了这个道理。作者回顾这段历史时着意提出，如“大跃进”、“文革”这些严重错误，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几

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曲折历史密切相关的。这样就更能启发读者一道反思。

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形”“隐形”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流行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感情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周恩来说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作者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论及。如毛泽东早期思想，“企望和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这当然是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到神拳义和团的符咒词语，从早期改良主义的艰苦寻求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从章太炎的“五无”圣境到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自由，无不具有此种特色。正如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的毛泽东，终于也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例如，中国农民对“士”——读书人既尊又辱的心态，也反射到“士”本身。毛泽东早年曾经师法的颜习斋，批判宋儒也有过头之处：“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读书人便

愚，多读更愚”。这不仅轻视理性认识的意义，且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作者就此谈到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如 1964 年 2 月 13 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了。毛泽东好读历史人物传记和笔记小说，尤其《红楼》《水浒》《聊斋》《三国》常读不厌，（很少读外国小说，只看京剧不看话剧），把它们当作历史当作阶级斗争史来读，从中了解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中关注中国农民“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曲折历史，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形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

这本书大体上由两组文章组成。后面一组是继续《探源》的工作，对毛泽东的早期政治、美学、教育思想以及早期历史观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作者从第一手材料的翔实考证和精密分析，引出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前面三篇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同中国文化传统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进行宏观探讨。同后面一组相比，这三篇是写意大笔，粗线条的轮廓勾勒，不像对早期思想研究那样工笔细描，铢分毫析。很希望作者能如《探原》一样，继续将中期、晚期思想深入钻研下去，撰写出一系列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论来。这件工

作，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说，也可以启发人们从文化的更深层次来进行历史的反思。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①

就毛泽东和党史研究来说，我是一个“个体户”。50年代初接触了毛泽东的早年，80年代以后也可以说研究了毛的晚年。早年也好，晚年也好，我都是凭一种责任感来接触这个问题的。在坐的像我这年纪的人不少。可以说，这个世纪的沧桑我们大体上都经过了。那么，我们活了一辈子，总不要活得糊里糊涂，也不应当让后来的人也糊里糊涂下去才好。

从经济形势国民生产总值比较：1960年时，我们同日本相等；到1980年，只等于日本的1/4；到1985年，只等于日本的1/5了。1960年时，我们比美国只少4600亿美元；到1985年，美国超过我们36800亿美元。应当弄清楚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这确实跟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分不开。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学活用即也常讲的“古为今用”，是分不开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我们现在界定为三个：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群众路线，三是独立主。这方面现在有很多专文专著了，我写的书也谈到这个问题。譬如“独立自自主，自力

① 1993年12月10日，在武汉召开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更生”，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独行其道”。“反求诸已，舍我其谁”。“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就是独立自主奋斗，终于创造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同王明的教条主义作斗争，实际上是同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作斗争。这也是一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然不仅仅只是接受中国经典的传统文化，他也接受了许多民间的、特别是农民战争的，就像《水浒传》之类的东西。封建割据嘛，占山为王嘛，土匪能够在边界上的山林中站得住，那么革命队伍应当更能够站得住。中国文化传统很讲人伦关系，尊卑长幼。毛泽东就很讲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司令部同政治部关系，等等。

革命胜利，夺得全国政权，进行建设，作为执政党应该有另外的一套做法了。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讲到这个问题。可是，事实说明，还是习惯用战争年代的经验，阶级斗争、敌我斗争的经验，而且有新的发展。战争年代多么讲“实事求是”，发展到最后，走向了反面，完全不依据国情，凭主观意志，把精神动力无限夸大，最后走到个人专断。又如“群众路线”，不断地群众运动，用群众运动来解决一切，结果是变成了“运动群众”，八次接见红卫兵。这都是一种错误的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后变成了“小而全，大而全”，三线建设，类似庄园经济的东西。办大企业乃至办大学，也是办庄园经济，都是小社会。最后走到一条封闭的道路，闭关锁国。当这条路成了绝路，再也走不下去时，我们才回过头来，另辟大道，实行改革命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当然，过去也有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

题。100多年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许多东西不能照搬，何况马克思当年也免不了某些空想，如《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些想法。接受时有变形，也有理解错误（甚至有翻译错误），比如"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大家都清楚，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自己说的主要是四个字——"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造反有理"。这个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历代农民战争，中国的农民战争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他认为世界是变动的，要不断斗争，才能变化这个世界，所以要斗。斗与变，这是贯穿他的一生的，一直到他去世。最后叫做"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不斗则退，斗则进"。斗就是"你死我活"。

毛泽东历来注重思想改造。延安的整风运动，反掉王明的"左"的教条主义，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全国解放初期，强调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有其历史意义，但也存在过头之处尤其是后来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研究，尤其批判胡风同镇反肃反结合，问题就大了。后来发展到反右派斗争。思想改造最后形成个什么形势呢？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制造"伪君子"，制造"投机分子"，制造"风派人物"，制造"口是心非"的人。尤其知识分子的人格被扭曲，在"文革"中那是最严重的，读巴金的《随想录》，多么沉痛！

这种搞运动的形势，搞敌我斗争的形势，同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相结合；林彪提倡读"老三篇"，摇小红书，搞"四个伟大"。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中，讲他只赞成伟大导师，接受这个称号。导师也是古已有之的。他年轻时讲过，君王是一代帝王，只有圣贤才是百代帝王。他自己追求的是

百代帝王，是君师合一。“文化大革命”时，这种个人权威、个人崇拜真到了一种无限的程度。最后自己讲：“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马克思的很多东西没有弄通，这就是悲剧所在。

刚才发言的一位教授，谈到毛泽东是诗人。他的诗确是非常好的，可以方驾古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诗人是自由的，政治家是不自由的。政治家要管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都要管。以诗人的精神、诗人的浪漫气质来治理国家，是绝对不行的。毛泽东喜欢李白，李白决不能当宰相。

我服膺恩格斯讲的话：“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恩格斯晚年还有一段话：“我们差不多还处在人类的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一些传统文化中被毛泽东发扬的，古为今用做得好的东西，我们定要继承发展；但是他晚年的错误导致了中国二十年的停滞和灾难，那些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做得不好的，我们应当加以清理，避免重蹈覆辙。

我们今天讲到重视文化的问题。过去老搞政治第一，今天是经济第一；两个文明相结合，这个没有问题。但经济是第一，要时时刻刻抓得紧紧的。当然，拜金主义不行，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不能引入。传统文化中应当继承和发展的东西，必须同经济、政治结合，结合得好，相得益彰。如政治讲道义，文化讲道义，经济也要讲道义。名牌货就是讲道义

的结果。

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讲有三个来源。实际上有四个来源，要加上欧洲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来源。讲人的个性，个性的自由发展，个人的价值等等。这是马克思非常之强调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讲法，过去我们有很多不太清楚的东西，只是从《共产党宣言》等理解："消灭一切私有制"，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等等。其实，关于共产主义，马克思有这么一段很重要的话，被我们所忽略："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的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是他自己做出这种解答。"马克思非常之强调个人价值，而我们呢？过去只讲"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当螺丝钉"，等等；把"个人主义"，作一种绝对曲解，骂得体无完肤。(其惩罚就是前述培养"伪君子"，培养风派人物）其实，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都讲了个人价值，个性解放的必要。不知大家看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最后一本，即第七卷《当代的哲学》没有。他对毛泽东的总结是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公社等是空想的，"文化大革命"是荒谬的。《论联合政府》有这样一段话："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完

全是空想的。”这是1945年讲的话，非常正确，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非常可惜，真是历史的不幸，后来没有这样做。毛泽东是一个伟大人物，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尤其晚年的情况更是非常复杂的。弄清他晚年的错误，对马克思主义获得正确的理解，从而建立我们现代文化的观念。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这是一点不假的。电脑、电视、还有卫星转播，信息高速公路，全球联网等等，这个地球很小了。老实讲，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都是缠过脚的，我们都是“小脚女人”。过去紧箍咒很多。我们现在都放了脚，但难以放成天足。今天真正天足的，大体是40岁左右的人，更年轻的当然更是天足。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多框框条条的束缚。做个现代社会的人，离不开电脑。我是电脑盲，我自认赶不上这个时代。现在很多人包括年纪大的人，能用电脑写文章，我们没有这个野心了。今天的世界，是这么一个发展的世界，各方面讲全球观念，世界经济接轨，讲融合统一的世界，我们许多旧的观念不变化是不行的。今后的世界是个科学技术万能的世界。地球很多东西一体化，如波音公司的飞机的门、尾巴，是在西安做的。哪个地方的经济效益好，资本家就到哪个地方去，可不可以说，资本无祖国。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人，应当把我们过去经历的事情弄清楚。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人剩下的主要责任。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是在工业革命以前一百年讲的。西方同中国、东方的不同，就是西方有科学传统。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科学的传统。我们的《尔雅》、我们的类书，动物、植物、矿物都是分不清楚的。明清以来，自然科学仍是不发达的。有许多观念、许多问题，我们应当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

来面目，我们要重新认识，要彻底弄清楚。比如上述个人的价值，关于自由的观念。

我们要走向的现代化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类走向哪里去？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究竟应当有哪些最具体的基本内容？怎样才能达到？要多长时间，过程如何？今天的世界是多元的，各个社会也是多元的，世界要不要一元化？能否一元化？如何一元化？这不能搞幻想，必须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是多元的，以公有制为主，将存在很多年，这个国策，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又重新确定的。多元中如何共同发展？如何走向共同富裕，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过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旧教条观念很多。改革开放以来，冲破了好些教条，这是邓小平的功劳。有些人搞社教运动，非常在行；但是真正把经济搞好，把大中型企业搞活，就不在行了。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轻装前进。回顾一下，从十二到十三大到十四大，到现在确立市场经济，这是个多么艰难的过程。邓小平思想最伟大处即在于此。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之一，还是封建遗毒作怪。没有 1992 年他的南方谈话，这个问题还难以解决。毛泽东从传统文化里面，活用了很多封建的东西，但最后又钻到个人崇拜、独断专行里面去了。封建社会是讲究上下高卑，定于一尊的；旧三纲也可化为新三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问题就在这里。我写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长文中，将邓小平 1980 年写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文章中，有关论述封建主义的东西几乎都抄上去了。文中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

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权力分过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民，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影响至深且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人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要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的作风，就根本谈不上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讲过：“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大家知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搞特权，这是封建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一个重要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批评打击，但滋长的土壤存在，于是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不幸在他自己晚年没有接受这个教训。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的尊卑观念，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这些东西是存在的。而公民权利、义务的观念淡薄。教育和科学为立国之

本，社会进步之基，没有发达的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这一认识并没有深入人心。相反，文化领域中还存在专制主义作风，总是强求舆论一律，害怕反对的声音。邓小平 1980 年在政治局作的这篇重要报告，现在 13 年过去了，这些话听起来还是入耳的，因为问题没有解决。民主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市场经济要有自由、平等和民主作基础，才能健康发展。否则，权力社会、官本位、靠等级制度就必然导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行贿受贿，腐败之风盛行。

我拉拉杂杂讲这么些话，就是说，归根到底，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好的坏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他身上都有反映。中国古代文化曾是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中国文化 17 世纪曾经震动过欧洲。但是近一二百年间，我们落后了，原因就在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缺乏欧洲文艺复兴、民主主义那种传统。个性发展、个人价值、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观念，在儒家传统中很少。民本同民主是两回事情。譬如，我们过去有句口头禅："要让人家讲话嘛!"这不是真正民主思想，这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恩赐观点，乃至主张宽容、宽松、宽厚等等，也同恩赐有关。所以民主的问题不解决，党内民主不解决，党也搞不好，政治、文化、经济也都搞不好，社会主义也就搞不好。还有科学的问题，科学也是需要民主来发展的，尤其是社会科学。过去几十年，包括"文革"时期，自然科学还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还有所发展。社会科学遭的灾难就大了，如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心理学，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大学课堂上取消了。我们回顾过去，研究毛泽东

的一生，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了他很好的养料，使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胜利。但是，传统文化中负面的东西，乃至一些不当的发展，又促使他犯了晚年的错误。

总之，刚刚过去的二三十年，四五十年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历史过程，尤其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确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哪些东西是在今后的实践、今后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应当继承和发展的，哪些是应当批判扬弃的，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确实应该予以总结，惩前毖后，继往开来。至少譬如刚才讲的个人价值、个人自由这些问题，要弄清楚，有个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有爱国主义传统，讲个人奋斗精神，这都是好的一面。过去几十年倡导的同群众结合，深入实际，这些仍应继承和发展。人都要有自主的精神，尤段自律的精神，要讲究自己把自己管束好。市场经济中，不能够见利忘义，必须义利并举，利己与利人应该是统一的。这些问题，曾经被毛泽东发扬过的很好的传统文化精神，今后怎么能够在我们新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作用，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今后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题目，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结为一体。

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①]

关于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在会议的即席发言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文化的20世纪回顾和21世纪展望。20世纪中国的最大事件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经过毛泽东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取得了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用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不能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比如"左"倾教条主义生搬硬套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的那套理论，从城市革命开始夺取政权，这在中国是明显地走不通的。

毛泽东可以说从青年时代起，对中国的国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不仅仅是儒家，还有法家、道家、墨家等，他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而且有的问题研究是比较深的。在青年的时候，他的老师和朋友在这方面都是造诣很深的。老师杨昌济可以说是当时的新儒学代表，毕生探讨如何把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毛泽东跟中共党内同一代其他领导人相比，更理解中国，更能够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相结全，所以他能够产生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有两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对内，必须战胜从斯大林那里来的也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的教条主义；对外，必须战胜强大的

① 这是1994年11月24日在杭州参加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接受《学习与思考》杂志和浙江有线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的谈话，据录音整理。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庞大军事政治力量。蒋介石也是学曾国藩的，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也不是平庸之辈，他也有他的能量。所以尽管毛泽东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如果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传统文化包括了孔孟之道，发展中的孔孟之道，有宋明理学，也有明清时期的顾王学说，一直到曾国藩，这些对毛泽东都有很大影响。毛泽东在年轻时对曾国藩很佩服，因为曾国藩确实有一套东西，他从湖南出发时只有两万人，太平天国有三四十万人，最后曾国藩可以说是把太平天国消灭掉了，他就是很好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中国共产党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中国化，那绝对是不行的。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产生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在20世纪的一件大事。

我们现在总结毛泽东思想有三条：第一条是实事求是，第二条是群众路线，第三条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它是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同时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属于精华的东西。根据客观规律办事，这一直是传统文化里很突出的思想。实事求是这几个字是汉代出现的，但它一直流传下来，直到曾国藩，都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当然，毛泽东使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时，不仅仅是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还运用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把两者融合了。这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产生等都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

现说群众路线，儒家一直有民本思想——民为贵，君为轻。毛泽东则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依靠群众进

行革命与建设。为什么毛泽东的这条行之有效的路线在1957年之后走下坡路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也还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的进化也好，资本主义的发展好，社会主义的出现也好，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光靠生产关系的变化或道德力量凝聚可以改变社会，使社会进步的。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是这么认为，中国的实事求是也是这么看待的。整个人类的进步是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的，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毛泽东晚年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背离了他自己总结得很好的实事求是这条路线，所以导致了"大跃进"的失败。"大跃进"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胡闹么。至于人民公社，那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东西。康有为曾写过《大同书》，毛泽东曾对这本书有过很大的兴趣，大同思想是儒家的东西。毛泽东把这些空想的东西变成了人民公社化，这肯定要失败的。现在我们经过了这么大的一个曲折之后，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本来的轨道，也可以说是回到取得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中国的实际问题还在于经济，如果经济搞不好，老百姓不干。所以这15年，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本来实事求是的传统，重新抓住马克思主义最精髓的东西，并加以发展，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这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的，也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死守教条。我们讲民主的法制，这同市场经济是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它们同我们党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最后一条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也是根据中国的实

际情况提出来的。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不需要提独立自主之类的东西，它要把自己的一套推广到全世界去。而我们却要坚持自己的特色，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尚且不是采用照搬照抄、全盘接受的方针，今天更是这样。我们只是把西方有用的东西拿过来，我们的独立自主表现在这种地方。而独立自主精神的本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传统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像“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等等，这方面学者们已经谈得很多了，我就不展开了。

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

由于夏喘痼疾发作，七月即住进医院，没能见到《十五大报告》（征求意见稿）。近来从报上看到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报导及有关文章，似涉及了防“左”的问题。这确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的一个大难题，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否则今后还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

离职十多年来，主管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从一大到十三大）的编纂工作（省地县三级已出版，中央卷近期也将面世）；同时自己也写了一些五十年代的经历和有关研究毛泽东的书。因此，回顾历史，感想颇多。古人说得好：“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伙鉴可明得失。”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中顾委撤销后，很少讲话的场合，趁这次列席十五大的机会，本知无不言之旨（却难言尽），就回顾历史谈一点感想和意见。我今年已满八十，来日无多，以后这样的机会恐也难得了。

（一）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该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

王明的"左"的倾路线，从1931年开始，经过遵义会议，到1941年延安整风，整整十年，才做了全面总结；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通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认识，取得革命胜利。但一些根据地的"肃托事件"，1942年审干抢救运动，解放战争期间的土改，仍出现过严重的"左"。

建国头七年，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等方面，成线很大，但也有改造过快等"左"的东西。1957至1978二十来年，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1978年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走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但直到现在，"左"的阴魂从未散去。有鉴于些，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特别讲了"左"是根深蒂固的问题。最近流传的几个《万言书》和某些署名意见书，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或即将复辟，实质上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版。可以说，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狠抓一个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和理论，近二十年来，相对的种种"左"的干扰始终没有停止过。

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江西时期从富田事变前后开始"肃反"，批"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

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个地区共杀了四万五千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

延安抢救运动，康生执行，说“特务如毛”。幸有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才没有再开杀戒，但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可是《唐纵日记》1942年8月23日写到：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唐纵是戴笠的二把手，当年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1950年在长沙时，我翻过全部日记原件。(《日记》现已出版)。

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作伤及三百八十万人。“四清”运动，认为有多数基层组织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1978年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是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左”王、“左”爷们时有表演。如借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整得周扬抑郁而死；后来还演化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搞了28天，才被制止。

为什么反复出现上述历史情况？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

革命时期，“左”的教条主义盛行，同共产国际、斯大

林有关，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认识有偏差，包括肃反政策也受苏共影响。七大前总结历史教训的第一个《决议》，讨论时虽顾平反了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但是从富田事变开始的“肃反”运动，并没有做全面彻底的总结。审干抢救运动，也没有认真总结教训。康生这个“肃反大师”一直身居高位，“文革”期间同“四人帮”结合，在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全国各地，制造了千千万万冤假错案。

建国初期，土改完成，认为封建主义已经解决。开始建设，争取苏联援助，沿用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想摆脱苏联某些影响，走自己的道路，但总的方向仍是列宁那里来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时刻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今后的斗争对象与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且又急于求成，反右结合“反冒进”，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三年“大跃进”，超英赶美，一度幻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仍然不接受教训，转而从经济运动完全转向政治运动：认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为整个过渡时期，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清除“身边的赫鲁晓夫”，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乱”。

回顾1945年《论联合政府》蝇讲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真是不胜感慨。

上述情况同当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关系。争相输出革命，两大阵营对抗竞赛，东风压倒了西风，资本主义已到

垂死阶段，帝国主义日落西山。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盖子的后果，导致我们长期的反修防修，同国内“左”的路线紧密结合。

总之，如小平同志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尽管近二十年来，我们从实践中解决了一个中心，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经济多元化，发展三资企业等等。同过去路线相比，可说“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步履蹒跚，迟迟未能突破，导致几次失业高峰。这方面从实践到理论都有待新的发展——前无古人的发展，必须突破马恩列斯毛不适于当今世界实际的违时或失效的论述。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当年毛泽东的气概：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

（二）发生以上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长期“左”的错误，其根本原因何在?

前面已经提到，首先是理论和认识问题。说得简单一点，两个时期都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长期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框框。马恩的学说产生于 19 世纪的西欧，他们根据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得出来的结论，怎么可能适用于一百多年后的东方与全世界呢？马克思自己就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发展的，是不能停滞的(弄虚作假理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有同有异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要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自己。

何况我们并没有遵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可是十年“文革”我们全部颠倒了。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理想提出来的。西方早期社会主义者囿于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只能从道德上抨击初期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无法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物质基础。马恩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社会公正的价值观，根据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工为的发展与社会两级分化，看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力量所在，从而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一切私有制”。他们对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公有制，不可能作具体设想。列宁急于消灭私有制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是长期的过程。斯大林没有继承列宁的路线，反而批判布哈林，从理论到实践，认为只有采取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完全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几次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可是历史证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还在经济的失败（现在还有40%的国有制），民心不满首在商品的匮乏。国有制经济并非社会主义的特色，西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都有各种教训。

我们经过长期的痛苦的弯路，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最大

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级分化（追求社会公正），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邓注理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过去我们讲惯了“兴无灭资”，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只能永远斗下去，只能是“你死我活”。近二十年的对外开放，来往交流，终于提出“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相信马克思活着也会这样说的）。因为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制度的崩溃，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诞生，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全球市场的统一，冷战的结束，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资本与市场，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蓝领”缩小，“白领”扩大）。总之，生产力在变化，生产关系也在变化，更不要说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的走向健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并没有固定下来，还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更是如此。他们两者之间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否可以找到某种共性与交叉之处呢？（西方有一种“趋同论”，我们理论界有人批判过。）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包括股份制）发展，就包含有社会主义因素。暴力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马恩也说过）。我们从来反对“改良主义”，能够逐渐改良，用和平的手段发展、变化，究竟有什么不好呢？苏联“和平演变”了，究竟是他自己之过，还是人家“演变”的呢？应该弄个清楚。立场只应当一个：走共同富裕道路，手段各自为之。

除开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外，根本原因还有一个体制问题，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做得很好，

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

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儒家命根三纲六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

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党政不分顺理成章。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的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因为敌人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人，于是阶级斗争更转入思想意识领域。毛泽东毫不讳言：“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不过坑了四五百个儒生，我们打了几十万。一个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志的共产党，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极其重要的讲话。讲话着重讲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

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早、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须要犯各种错误，必须要损害各级澡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届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当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向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

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搞特权，这审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牡才能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摘引这么多的《讲话》的原文，是以其正确性来说明，经过十七年之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中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很不受重视，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很好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须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迟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2 个问题中有 4 个问题同上述《讲话》是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

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稻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这些《生活准则》写得多么好。可是十八年来，这些《准则》实行得如何？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多年来，似乎很少听到人们谈论这个《准则》了。

正确路线的制定与执行，党及其领导威信的建立，国家各方面事业的正常发展，除开要解决民主化的问题外，还必须解决科学化、知识化和法制化的问题，这四化也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党几十年来，领导革命与建设尤其后者，这四化的建设与贯彻，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历史教训我们，没有这四化的保证，我们的事业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三）应当开始总结这二十年来（1978—1998）的经验教训。

本世纪前彻底弄清楚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世界整体发展的趋势。总结最主要的成功经验，更要记住最关系的错误教训，避免再走弯路，21 世纪走上康庄大道。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当然，什么时候办这件大事，要由时机成熟而定。但这件事是非办不可的。要允许个人思考，也要让学术机构研究；是自发进行，还是有组织领导？是内部“动态参考”，还是允许报刊讨论？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前两个《历史决议》当年都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尤其第二个《历史决议》，全国四千人参加，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去掉一切个人恩怨，以党和国家的前途为重，指导思想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相信这件事终能办好。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二十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

粗粗想了一下，有些问题不能回避讨论：

——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这二十年“左”的表现，今后如何防“左”？如果说这二十年有右，“右”又在何处”？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是否即引进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或存在严重复辟的危险？在我们社会主义政权领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其发展同西方是

否会有同有异？革命时期就有“红色”资本定帮我们的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资本家、企业家是否会多少带些“红色”？

——固有企业与公有企业的区别或关系，如何以公有企业为主？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异何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具体定性，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理论三个方面，以及同历史上人家（苏东）与自己（1978年前）及马恩列理论的同异何在？初级阶段将经历多长时间？几代人，几十年，一百年？还是更长或说不清楚？

——邓小平南巡前后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四）中国今后的危险是什么？

从保证党今后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使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更加顺利发展，考虑我们有哪些存在和潜在的危险，这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粗粗想来，是否有这样几个问题？

1. 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是否在各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存在？家长制、搞特权、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等等，情况如何：最近看到一份《1996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报告》，一共26起，多逼得农民服毒身亡，也有爆炸死人，也有打死人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县、乡干部共135人。其中山东10件，湖南6件。

2. 人们都议论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失去民心，情况究竟如何，怎样界定？过去骂蒋 介石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毛主席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

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恐怕从来是实情。记得反右前，毛主席说过，要鼓励民主党派同我们唱对台戏。随后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当时可能真是这个念头。无奈波匈事件，“右派鸣放”，整个历史就走入弯道了。我们党如何进一步健全民主和法制？除了任期制、选举制、民主生活制度，还应有什么制度？自己是能以很好地监督自己的。中纪委（监察部）如何加强权力，发挥作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管什么？国际歌唱“没有救世主”。多党制，轮流执政，当然变不上；但如何能保证党不犯错误？过去我们是吃尽这方面苦头的。党是受人控制的，人又是必须受到三种限制的（恩格斯说三条：历史时代、知识经验、思维能力。还应当加一条：个人品德。）

3. 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左右社会力量的阶级的出现？如何防止这个阶级对社会生活发生严重的副作用，国家如何从政策等方面加以控制。公私各种经济成分如何服从“三个有利于”，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如何相得益彰？

4. 国外威胁问题。对国际形势及世界走向的看法。“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是一种怎样的理解与认识，如何对付。苏联的外部教训何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联的崩溃起了哪些作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搞过“反对和平演变”，应当怎样认识和估计这一举措。

5. 香港和台湾问题。要充分认识香港尤其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争取香港民心也真正回归。目前香港总产值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人均已超过英国；向内地的投资占全国外来投资的 60%。如何发挥香港的正面作用？香港对我们有

无危险，危险在何处？大陆、港、台经济能否做到“一体化”？如何分化台独，争到民心。解决台湾问题关键何在？台湾对我们的危险何在？

6. 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已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导致洪水灾害的原因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坏事？有关系统应该总结治水的经验教训。三峡工程木将成舟。我只建议，要接受三门峡教训，要准备后事，即水库形成后，将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

7. 教育乃立国之本。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又素质不高，社会无序（犯法人多）。人口太多如何消化，已经出现过三次失业高峰。普及义务教育，如何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世界今后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即是人才的竞争。关于提高素的教育，人的素质靠什么保证？我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之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还使我想起鲁迅说的一段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1997年9月8日于北京医院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李锐文集 （卷二）毛泽东的晚年悲剧
作者=李锐著
页数=447
SS号=10326479
出版日期=1999年1月第1版